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1期(总第223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毛昭晰

主任 叶菁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编 褚树青

副主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辑部

编辑 李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价 22元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1-10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23年第1期(总第223期)

■ 公共文化	
居民文化参与的资本禀赋与激励结构的实证研究*	魏 勇 燕婷婷 5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徐嘉弈 董广伟 15
公共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研究*	
——以六安市图书馆为例	严贝妮 张子珺 刘亚东 23
■ 探索与创新	
基于改进DEMATEL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武文丽 31
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田一斐 39
■ 工作研究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中乐谱文献分类的优化*	刘 莹 44
公共图书馆IP培育研究	
——以宁波图书馆“甬图君”品牌为例	应 珂 50
“十四五”初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总结及展望	杨 婷 56

同行评议期刊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 异域采风

靶向、扎根与嵌入：2008—2018年美国选民对于图书馆认知与资助意愿的转变

及启示* 朱华顺 62

公共图书馆播客品牌构建与营销策略研究

——以多伦多公共图书馆Shelve Under播客品牌为例 曾 婕 68

■ 图书馆学史

单不庵与图书馆事业* 周余姣 73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工作研究 葛文娴 79

■ 文献学研究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稿本及其价值考论* 曹天晓 87

旧山志补正《全宋文》《全元文》的版本价值*

——以明《罗浮志》为例 董存斌 93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1 2023 (Serial No.223) Monthl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apital Endowment and Incentive Structure of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Wei Yong Yan Tingting	5
A Study on the Paths of China's Folk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Xu Jiayi Dong Guangwei	15
Research on the Whole-Library Entrusted Operation Mode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Lu 'an Library as an Example	Yan Beini Zhang Zijun Liu Yadong	23
Identification of Key Influences on Data Literac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Improved DEMATEL	Wu Wenli	31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cademic Journals Based on Prospect Theory and Power Heronian Operator	Tian Yifei	39
Optimiz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usical Score Literature in the <i>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5th edition)</i>	Liu Ying	44
Research on IP Cultiv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Ningbo Library's "Yongtujian" Brand as an Example	Ying Ke	50
Summary and Prospect of Public Library Research Hotspo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Yang Ting	56
Targeting, Rooting and Embedding: the Change and Inspiration of American Voters' Perception of Librari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Fund Libraries from 2008 to 2018	Zhu Huashun	62
Research on the Brand Construc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y of Podcast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the <i>Shelve Under</i> Podcast Brand of Toronto Public Library as an Example	Zeng Jie	68
Shan Bu'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Zhou Yujiao	73
Research on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Work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6)	Ge Wenxian	79
A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Anonymous <i>Diary in Nanjing Library</i>	Cao Tianxiao	87
The Edition Value of Ancient Mountain Records in Supplementing the Four Articles in <i>Quan Song Wen</i> and <i>Quan Yuan Wen</i> : Taking <i>Luo Fu Zhi</i> as an Example	Dong Cunbin	93

· 公共文化 ·

居民文化参与的资本禀赋与激励结构的实证研究*

魏 勇^{1,2} 燕婷婷¹

(1.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 要: 文章运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统合个体文化参与动因, 并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系数集束化方法实证比较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复杂影响和结构差异。研究表明: 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类型丰富、层次分明, 但总体水平不高, 城乡差异较大; 除收入、教育因素外, 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对居民各类型、各层次文化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与父亲受教育程度相比, 配偶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影响更为全面; 文化资本对个体文化参与起主导作用, 社会资本对于视听和活动参与影响较大, 经济资本对个性参与的影响较强。研究结论揭示了当前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 赋予了公共文化政策应答域新的意涵。

关键词: 文化参与; 布迪厄“资本观”; 激励结构; 有序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识码: 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apital Endowment and Incentive Structure of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bstract The article applies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to unify the motives of individu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empirically compares the complex effects and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Ordered-Probit model and coefficient clustering method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re are rich types and levels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ut the overall level is not high and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ddition to income and education factors,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action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t all types and levels. The spouse's education level has a more comprehens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compared to the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Cultural capital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individual cultural participation, social capital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audiovisual and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nd economic capital has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personality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current capital incentive structure of cultural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give a new meaning to the public cultural policy response domain.

Key word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incentive structure; Ordered-Probit model

1 引言

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 也是国家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126次提到了文化、11次提及公共文化服务、7次提及文化产业, 根本目的是提高

* 本文系西南大学2019年中央高校创新团队项目“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项目编号: SWU190901)的成果之一。

群众文化参与水平、更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公众文化参与是实现和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前提,是推进文化事业和产业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增强政府文化治理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文化参与的内涵丰富而模糊,它涵盖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与特定文化形态及其相关的产品、服务、活动、制度等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囊括了人们对各种形态的文化信息、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接收、利用、加工和传播,通常以主体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认知能力为前提,同时带有浓厚的社会分层特征^[1]。定义既是研究活动的目标,也是研究活动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参与的代表性定义中,布迪厄认为文化参与是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积累和垄断稀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来最大化生活机会的一种手段,而且社会阶层和文化消费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不同阶层居民利用自身文化品位和文化活动实现阶层区分和聚类,并进行文化、经济、政治权利的再生产^[2]。在他的资本理论中反复出现的家庭背景、教育禀赋、社会关系等概念同样出现在文化参与的微观研究中,不仅暗示了个体资本结构与文化行为内在的理论关系,而且为文化参与动因检验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将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出发,理论统合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在对文化参与现实样态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实证比较资本动因的作用关系和方向差异,为行为文化政策提供有益洞见。

2 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

个体资本的结构和分配代表了社会整体的内在结构,对资本的多种形式的理解将有助于阐明社会结构和功能,并由此理解个体文化行为的意义与差异。布迪厄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引入各种形式资本概念,目的是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功能。他利用经济学隐喻来定义了在无私的交换形式中大多数物质类型的资本可以通过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根据资本可能在某个领域发挥作用,并以或多或少的成本转换为代价(这是其在相关领域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布迪厄将资本分成三种基本形式:(1)经济资本,它可直接兑换成货币,并可能以产权形式制度化;(2)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社会联系)组成,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

以以贵族头衔的形式制度化;(3)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以学历形式制度化^[3]。他进一步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类:具身文化资本是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客观文化资本即资本的物化状态,具体的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制度文化资本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布迪厄对资本的非经济学解读意味着资本在交易系统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个词涵盖了所有不论是物质性的或是象征性的商品。无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它们都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为主体或群体所占有进而划分出社会阶级,对文化参与的行动者而言,资本水平或者说镌刻其上的阶级符号既体现了文化生活的资源和权力结构,也成为决定文化竞争不平等的起点^[2]。

2.1 经济资本:文化参与的行动能力

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立即和直接转换成货币,并可以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物质资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可以用来获得或保持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首先,文化参与是人们对各类文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欣赏、改造、利用、交换、享受的需要。它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人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虽然它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但其不是无条件产生的,如个体的文化消费当然直接耗费金钱成本,即便参与政府主导的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也需要参与者承担一定的经济和机会成本,经济资本无疑为居民支付文化参与的各种成本提供了基本条件^[4]。其次,需求层次有高低之分。英格尔哈特(1977年)在论述代际价值观转变时提出了“匮乏假设”,即几乎所有人都渴求自由和民主,但是人们都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的价值。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直接与生存相关,一旦这些东西匮乏,人们就会将这些“物质主义”目标放在首位。但是在富裕条件下,人们则更可能强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知识需求之类的“后物质主义”目标^[5]。研究表明,相对我国高收入群体而言,中低收入群体的文化参与水平普遍较低,文化参与造成的金钱、时间等边际成本高企是造

成该群体主体性较弱的重要原因^[6]。再者,文化参与是一种审美活动,与个人认知能力紧密相关。多项研究表明受教育更多的人拥有更广泛的文化实践体系,包括更多的阅读和博物馆参观等^[7-8]。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资本水平会显著影响其受教育机会和质量^[9],现实中“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热议和近年来教育部针对重点高校招生贫困生的各类专项计划均为此做了注脚。

2.2 社会资本:文化参与的地位信号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拥有一个由相互认识和承认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换句话说,与一个团体的成员资格有关。该团体为每个成员提供集体所有资本的支持,一种“凭证”,使他们有权从不同的意义上获得信用。首先,社会地位影响文化品位。据文化再生产理论,人们参与文化生活主要是作为其社会地位的表达。通过展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地位群体的成员证实了现有的社会分化和排名。布迪厄的观点也被称为“同源论”(Homology Thesis),它得出的结论是特定的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当代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文化实践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高雅”文化和知识的偏好,对于那些保持或达到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产。布迪厄看到了文化偏好或“品味”与个人的阶级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社会阶级和文化消费以复杂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用他们对文化品味和实践的选择来区分开来^[10]。因此,社会精英的成员(如专业人士、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消费合法的“高雅”文化,而且比其他成员更频繁^[2]。其次,社会网络塑形文化圈层。社会网络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真正建立、维持和加强的。文化生活中,个人的社会网络维持其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结构性交换,在物理(地理)空间甚至经济社会空间中也不可避免地还原为邻近性关系。社会网络创造出各种场合(集会、巡游、狩猎、聚会、招待会等)、场所(智能社区、精选学校、俱乐部等)或实践(智能体育、室内游戏、文化仪式等),个体以文化行为而非经济活动在网络中尽可能保持生活的同质化,以促进形成个人稳定的圈层空间。再次,社会互动促进文化交融。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受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还受到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因此个体的文化

生活充斥着与周围环境的调适、迎合、塑造,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文化生活经验和偏好”^[11]。在社会互动中,上层阶级不仅是单向的引领者角色,事实上他们长期保持着“文化杂食者”倾向,他们通过接触“中端”甚至“大众”的品位(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爵士乐开始在美国南方白人阶级中流行),使文化的“合法性”减弱、“等级性”模糊^[12]。社会资本事实上也助推了社会各阶层文化交流碰撞,为个体实现文化参与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互动接口。

2.3 文化资本:文化参与的表征空间

布迪厄突破了文化本质主义观点——文化的无功利性——来认识文化实践,他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同源(homology)中^[13]。因此,文化资本和人们的精神追求、礼仪教化、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等日常生活各方面休戚相关。它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是人们文化参与过程中感知与想象相结合的表征空间。

首先,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艺术即生活,无论文化程度或受教育水平如何,每个人都有审美本能,但是人们识别“美”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集中体现为对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理解、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差异。“解码过程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14],个体的文化参与不是被动接收编码意义,而是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做出意义诠释。因此一个人的文化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资本反映的审美眼光。这种眼光是一种“合法”能力,它包括一整套审美趣味、技巧和话语^[15]。当然,文化能力不仅与原生家庭中艺术的早期社会化水平相联,也与新生家庭文化资本相关^[16]。其次,文化资本与文化惯习。文化能动性在实践中表现为文化选择性,对于人们喜欢读哪家的报纸、偏爱去怎样的餐馆、是常去球场看比赛还是喜欢去剧院听歌剧,布迪厄引入了“惯习”概念来区隔这些行为意义。

“惯习”是欣赏艺术作品所必需的一种可转移的认知和实践倾向系统^[17]。在每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惯习从具身资本中习得、在客体资本中累积、在文化生活中释放表达,但它与经济和社会资本不同,不能通过赠与、遗赠、购买或交换等方式瞬间传递,而是以传承、培养、教化的形式,预设了一个由家人和自身不断进行时间投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塑造出内在

于个人的观念和鉴赏力,并重复着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内在体验和主动建构,并最终体现在不同的文化行为上^[18]。最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分层。文化资本是包含了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关系。它的累积性决定了文化参与是一种“成长型”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催生新一轮更强烈的参与需要^[19]。这是出现“积极观众”(active audience)^①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分层的重要根源。文化分层带来的“差异”可以导致一种消费主义前提下的社会等级: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表现出嗜好、品位的差异,反映并巩固了他们在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20]。

3 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检验

3.1 模型设定

3.1.1 有序Probit模型

本文因变量居民文化参与水平(包括类型变量和层次变量)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此时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并不适用。因此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是Probit模型的扩展,专门处理因变量是排序数据的情况。模型设定如下:

$$y_i = \alpha_i EC_i + \beta_i SC_i + \gamma_i CC_i + \thet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y 是因变量,包括居民各类型、各层次以及平均参与水平,EC是经济资本水平,SC是社会资本水平,CC是文化资本水平, X 是反映性别、年龄、健康、户口等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 $F(\cdot)$ 为某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为:

$$F(y_i^*) = \begin{cases} 1 & y_i^* < \mu_1 \\ 2 & \mu_1 < y_i^* < \mu_2, \\ \dots & \dots \\ J & y_i^* > \mu_{J-1} \end{cases} \quad (2)$$

其中, y^* 是 y 背后存在的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称为潜变量,满足:

$$y_i^* = \alpha_i EC_i + \beta_i SC_i + \gamma_i CC_i + \thet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mu_1 < \mu_2 < \mu_3 < \dots < \mu_{J-1}$ 称为切点,均为待估参数。

有序Probit模型的参数含义不直观,我们仅能从回归结果中得到显著度和符号方向等有限的信息。因

此,进一步计算得出各个解释变量对居民文化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可表示为下式:

$$\frac{\partial P(y=i|x)}{\partial x_j} \Big|_{x=\bar{x}} \quad (i=1,2,3,4,5) \quad (4)$$

其中, x 代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中的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公式(4)的含义为当其他变量处于其均值处且保持固定不变时, x_j 变化一单位导致因变量取 $i=1,2,3,4,5$ 的概率的变化。

3.1.2 系数集束化

上述三类资本变量都包含了一系列具体观测指标。为了能够系统比较三类资本的效应大小,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引入集束系数(sheaf coefficients)技术。假定同时存在一个表示经济资本的潜变量(η_a)、表示社会资本的潜变量(η_b)和表示文化资本的潜变量(η_c),它们分别是与EC、SC、CC相关的一系列自变量 X 的结果变量:

$$\eta_a = c_1 + \sum_i^I Z_i X_i \quad (5)$$

$$\eta_b = c_2 + \sum_j^J Z_j X_j \quad (6)$$

$$\eta_c = c_3 + \sum_k^K Z_k X_k \quad (7)$$

公式(3)可写为:

$$y_i^* = \alpha + \lambda_1 \eta_a + \lambda_2 \eta_b + \lambda_3 \eta_c + \theta_i X_i + \varepsilon_i \quad (8)$$

事实上,公式(8)只是对公式(3)的一种替代性呈现,对它的估计是在拟合公式(3)之后完成的。后估计的目标在于同时选择三套参数 Z_i 、 Z_j 、 Z_k ,使 η_a 、 η_b 、 η_c 的标准差均为1,从而使这三个集束变量的效应(即 λ_1 、 λ_2 、 λ_3)之间具有可比性,以估计各个潜变量的重要程度差异^[21]。由于Probit模型回归系数仅仅反映概率密度函数的变化情况,而有序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虽然在回归系数和切点估计上有所差别,但通常二者在预测因变量变化概率结果方面很接近,关键是前者可以从胜率的角度对系数解释从而赋予其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在有序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系数集束化方法,以比较个体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三类资本水平对于其文化参与的效应大小。

3.2 变量操作化

3.2.1 因变量操作化

文化参与的核心是对文化信息、意义的解读、

理解、欣赏,进而增加自己的“文化行装(cultural baggage)”^[22]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满足。本文依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政策和法规精神,使用类型学方法划分居民文化参与的类型和层次。其一,文化参与的类型划分是基于文化信息属性及其传播特征,可将文化参与分为阅读、视听和活动三种类型。阅读参与指居民对书刊、报纸、杂志等为载体的静态文本信息的接收利用情况;视听参与主要指居民对电视、电影、音乐等为媒体的图像和声音信息的接收利用情况;活动参与主要指居民对展览、演出、体育赛事、民俗节庆等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在场参与情况。如果说前两类参与体现文化信息的单向传递,那么活动参与是文化主客体的即时互动,体现个体文化生活与公共文化事件的共在性特征。其二,文化参与的层次划分是基于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差异,按照从基础到高级的程度分为基础参与和个性参与。前者指居民参与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活动和内容,包括读书看报和广播电视,参与过程带有经济成本较低、内容选择面窄、活动自由度小和自主性弱等特征;后者指的是看电影、听音乐、上网或参加其他经济成本较高、内容选择面宽、活动自由度大和自主性强的文化项目。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年公开数据描述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结构特征。平均参与水平包括CGSS2017年居民调查问卷中的A30题项中的第1、2、4、5以及8—12题,阅读参与为其中第4题,视听参与为其中第1、2、8、12题四题,活动参与为其中第5、9、10、11题四题;基础参与为其中第1、4、9题三题,个性参与为其中第

2、5、8、10、11和12题共六题。各因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2.2 自变量操作化

(1)经济资本。不同于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布迪厄对经济资本的理解更接近社会学中的生计资本(living capital)概念,这当中既包括以物质形式存在的资本,也包括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资本。衡量经济资本主要是看个体拥有的货币以及可以直接转换成货币并可以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物质资产,包括流动性质的居民工资收入、投资盈利以及固定性质的房产、汽车等。考虑到家庭是居民基本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单元,本文选择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拥有的房产和汽车数量等指标来反映其经济资本水平,对应问卷中的A62、A63、A65和A66四个题项。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反映个人社会网络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活动特征,强调其对于个人的目的性行动的功用,通常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三个维度^[23]。社会网络反映“弱关系强度”(strength of weak ties)^[24],指的是家庭和亲密朋友圈子之外的间接影响的力量,选取受访者对身边各种职业身份关系人的提名来衡量个体与弱关系网络成员关系的紧密性(C1题项)。其次考虑个体社会互动水平,它不仅构成了社会网络的行为基础,而且对居民文化生活方式和质量均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文化生活中受访者与身边主要社会关系的互动水平反映其社交活跃度(A31题项)。最后,文化活动的多方主体存在复杂社会关系(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关系、文化商品的买卖关系等),社会信任对于这些关系的维持和改进具有显著作用。对社会信任衡量采用居民个体自评的社会信任程度(C11题项)。

(3)文化资本。本文对文化资本的测量主要通过两个维度:个人文化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前者主

表1 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构划分		特征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平均参与水平		所有项目上文化参与水平的平均值	2.591	0.661
按类型分	阅读参与	居民读书看报的参与水平	2.163	1.411
	视听参与	看电视电影、听音乐等视听参与水平	2.731	0.808
	活动参与	参观博物馆、现场观看表演、健身锻炼、做手工等活动参与水平	1.727	0.783
按层次分	基础参与	阅读、看电视、锻炼等成本较低、自由度小、自主性弱的文化参与	2.939	1.029
	个性参与	看电影、听音乐、上网、文体赛事等成本较高、自由度大、自主性强的文化参与	2.367	1.118

注:以上调查结果均由五点李克特量表收集,按参与水平从低到高排序,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样本数量为2 488。

要是通过学历文凭或教育证书,反映一个人的文化实践、技能和凭证,观测指标是个体受教育程度(A7a题项)。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现有研究多从原生家庭出发观测家庭中有型的文化物件和无形的文化氛围,但忽略了新生家庭对文化参与的影响。大多数人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工作或娱乐,家庭单元在个体文化偏好和行为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理应包含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25]。本文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包括父亲受教育程度(A89b题项)和配偶受教育程度(A72题项)两个指标。各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类型/名称		变量含义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经济资本	收入水平	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EC1	9.687	1.136
	房产	家庭房产数量	EC2	1.092	0.602
	汽车	0=无汽车,1=有汽车	EC3	0.291	0.454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各种社会关系强度平均值 ^②	SC1	1.969	0.910
	社会互动	各类社交活跃度的平均值 ^③	SC2	2.671	0.784
	社会信任	受访者自评社会信任程度	SC3	3.097	1.200
文化资本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的最高学历 ^④	CC1	3.274	1.465
	父亲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父亲的最高学历	CC2	2.080	1.176
	配偶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配偶的最高学历	CC3	3.154	1.387
控制变量	性别	0=男,1=女	GEN	0.506	0.500
	年龄	受访者年龄	AGE	49.868	16.452
	年龄平方项	受访者年龄的平方项	AGE2	2 757.3	1 685.8
	健康	自评健康水平	HEL	3.508	1.092
	户口	0=农村户口,1=城镇户口	HUK	0.370	0.483

3.3 结果分析

3.3.1 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表3显示了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个人和家庭文化资本等因素对居民文化参与平均水平有显著积极作用。控制变量户口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居民文化参与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实际上表3中所有模型的户口

系数都显著为正,即无论是参与类型还是参与层次,城乡居民都存在明显差距。

分类型看:男性阅读参与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女性视听和活动参与明显较男性积极。影响阅读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自己和配偶受教育程度。影响视听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收入水平、个体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父亲和配偶受教育程度。除收入影响外,拥有汽车对于文化活动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除了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系数显著为正外,社会信任作为活动参与中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自己的、父亲的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均对提高个体文化活动参与有显著影响。

分层次看:基础参与方面,分析证实了个体收入水平是居民文化生活的的基本前提,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构成是居民参与的基础条件,自己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个性参与方面,收入和汽车为各种成本较高、自由度大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行动力,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形成了个性化文化参与的社会场域,但社会信任系数显著为负,即信任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个性化文化参与,表明个性参与背后可能存在区隔化或疏离化动机,即当一个人不再相信周围人群和社会关系,甚至认为可能从中受损的时候,他会选择成本较高、自主性大、私密性强的文化生活方式,要么为了彰显优势地位,要么实现自我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个性参与水平,充分体现原生家庭文化资本或称之为“文化惯习”对成年后个体文化生活偏好的持久影响,结果侧面印证了个性参与和文化区隔的联系,也反映出伴随原生家庭获得的具身文化资本是自我定义和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

表4给出了平均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这里以EC1为例解读。当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处于均值时,居民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文化参与平均水平落入“非常低”的概率下降0.004,落入“比较低”的概率下降0.039,为“一般”的概率上升0.027,为“比较高”的概率上升0.016,为“非常高”的概率保持不变。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文化参与水平越高。这反映了文化参与以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客观现实,也符合需求层次发展规律。个体社会网络、社会交往以及自身、父亲和配偶的文化水平边际效应结果与收入水平类似,而其中仅有父亲教育程

表3 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

变量	平均参与	阅读参与	视听参与	活动参与	基础参与	个性参与
EC1	0.150***	0.139***	0.107***	0.154***	0.132***	0.223***
	(0.029)	(0.028)	(0.026)	(0.028)	(0.026)	(0.028)
EC2	0.023	0.005	0.014	0.011	-0.007	-0.046
	(0.043)	(0.041)	(0.040)	(0.041)	(0.039)	(0.041)
EC3	0.045	0.082	0.055	0.013**	0.014	0.139***
	(0.060)	(0.057)	(0.055)	(0.007)	(0.054)	(0.056)
SC1	0.203***	0.118***	0.114***	0.152***	0.081***	0.176***
	(0.031)	(0.029)	(0.029)	(0.029)	(0.028)	(0.030)
SC2	0.318***	0.189***	0.229***	0.249***	0.230***	0.226***
	(0.033)	(0.032)	(0.030)	(0.031)	(0.029)	(0.031)
SC3	-0.030	-0.013	-0.010	0.035**	0.020	-0.045***
	(0.020)	(0.020)	(0.019)	(0.019)	(0.018)	(0.019)
CC1	0.203***	0.269***	0.063*	0.109***	0.193***	0.164***
	(0.029)	(0.028)	(0.026)	(0.027)	(0.026)	(0.027)
CC2	0.067***	0.012	0.043**	0.050***	0.006	0.120***
	(0.026)	(0.024)	(0.024)	(0.024)	(0.023)	(0.024)
CC3	0.133***	0.104***	0.082***	0.056***	0.078***	0.102***
	(0.028)	(0.027)	(0.025)	(0.026)	(0.025)	(0.027)
GEN	0.052	-0.146***	0.099***	0.156***	-0.037	0.027
	(0.052)	(0.050)	(0.047)	(0.049)	(0.046)	(0.049)
AGE	-0.008	-0.001	-0.046***	0.018	0.034***	-0.079***
	(0.011)	(0.011)	(0.010)	(0.011)	(0.010)	(0.011)
AGE2	0.000	0.002**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EL	0.043*	0.034	0.021	0.047*	0.079***	0.026
	(0.025)	(0.024)	(0.022)	(0.024)	(0.022)	(0.024)
HUK	0.387***	0.260***	0.213***	0.244***	0.323***	0.340***
	(0.063)	(0.058)	(0.058)	(0.059)	(0.056)	(0.059)
Pseudo R2	0.238	0.135	0.095	0.108	0.113	0.274

注：*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内为回归系数标准差。

度对因变量为“非常高”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显示边际效应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网络、社会互动、自己受教育程度、收入、配偶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受教育程度。

表5和表6显示了边际效应由高到低前三位因素排序，阅读参与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自己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视听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收入水平；活动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收入水平和社会互动。分层次看，基础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自己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个性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自己受教育程度。

表4 平均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

自变量	非常低	比较低	一般	比较高	非常高
EC1	-0.004***	-0.039***	0.027***	0.016***	0.000*
SC1	-0.009***	-0.082***	0.057***	0.033***	0.001*
SC2	-0.006***	-0.052***	0.036***	0.021***	0.001*
CC1	-0.006***	-0.052***	0.036***	0.021***	0.001***
CC2	-0.002*	-0.017***	0.012***	0.007***	0.000
CC3	-0.004***	-0.034***	0.024***	0.014***	0.000

注：限于篇幅略去标准误并删除了参数不显著的自变量。*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3.3.2 系数集束化估计结果

系数集束化的卡方检验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

表 5 不同参与类型的边际效应

参与类型	自变量	非常低	比较低	一般	比较高	非常高
阅读	SC1	-0.060***	0.007***	0.011***	0.014***	0.028***
	SC2	-0.037***	0.004***	0.007***	0.009***	0.017***
	CC1	-0.085***	0.010***	0.015***	0.020***	0.039***
视听	EC1	-0.008***	-0.029***	0.012***	0.024***	0.001**
	SC1	-0.016***	-0.062***	0.025***	0.052***	0.001**
	SC2	-0.008***	-0.031***	0.012***	0.026***	0.001**
活动	EC1	-0.053**	0.021**	0.025**	0.007**	0.000**
	SC1	-0.085***	0.033***	0.040***	0.011***	0.001
	SC2	-0.052***	0.020***	0.024***	0.007***	0.000

注：限于篇幅略去标准误，*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表 6 不同参与层次的边际效应

参与类型	自变量	非常低	比较低	一般	比较高	非常高
基础参与	EC1	-0.010***	-0.033***	0.005***	0.022***	0.016***
	SC1	-0.018***	-0.057***	0.008***	0.039***	0.027***
	CC1	-0.015***	-0.048***	0.007***	0.033***	0.023***
个性参与	EC1	-0.053***	-0.004***	0.019***	0.037***	0.001**
	SC1	-0.052***	-0.004***	0.019***	0.036***	0.001**
	CC1	-0.039***	-0.003***	0.014***	0.027***	0.001**

注：限于篇幅略去标准误，*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显著，表明三类资本变量回归系数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了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在促进个体化文化参与上存在水平差异，也可理解为不同类型的资本对于不同类型文化参与的影响存在结构差异。具体来说，文化资本对于居民平均文化参与度(0.477)、阅读参与度(0.493)、基础参与度(0.356)和个性参与度(0.432)的促进最大，充分印证了三类资本中文化资本在居民个体文化参与领域的主导作用。社会资本对于居民视听参与度(0.226)和活动参与度(0.272)的影响最强，这也符合视听和活动相对阅读而言对个体

的认知水平要求较低而社交能力要求较高的特点。虽然经济资本在诸多领域都是影响最小的因素，但在个性参与中的影响仅次于文化资本而大于社会资本的影响(0.271>0.267)如表7所示。文化行动力是个体享受多元文化生活基本前提的假设未曾动摇。

4 讨论

与传统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运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对既有文化研究中的各类动因进行了理论统

表 7 系数集束化估计结果

变量	平均参与	阅读参与	视听参与	活动参与	基础参与	个性参与
经济资本	0.176***	0.171***	0.131***	0.169***	0.147***	0.271***
	(0.032)	(0.031)	(0.029)	(0.030)	(0.028)	(0.031)
社会资本	0.342***	0.202***	0.226***	0.272***	0.214***	0.267***
	(0.027)	(0.026)	(0.024)	(0.025)	(0.023)	(0.026)
文化资本	0.477***	0.493***	0.217***	0.249***	0.356***	0.432***
	(0.038)	(0.035)	(0.034)	(0.035)	(0.033)	(0.036)
chi2(3)	28.79	49.7	17.31	8.23	21.07	45.67
卡方检验	0	0	0	0.041	0	0

注：*表示 $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内为回归系数标准差。

合,以强调不同类型的个体资本对其文化生活影响的联系和区别。通过对居民各类型、各层次文化参与的水平刻画和动因检视,文章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动因有一个总体判断:个人对自己文化生活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和实践的确是出于多元动机的考虑,其中既包括伴随需求层次发展催生的精神文化需要,又有基于社会地位和身份信号刺激的社会性动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个体及其家庭(包括原生和新生家庭)文化关系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包括:(1)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参与类型丰富、层次较高,农村大部分居民也有基本文化生活,但在阅读和个性化参与方面较城镇居民存在明显差距。居民总体文化参与水平不高。(2)有序Probit分析表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收入、教育等因素对个体文化参与具有显著作用,本文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各类型、各层次文化参与均有显著影响;与父亲受教育程度相比,配偶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影响更为全面。(3)系数集束化分析表明:文化资本对个体文化参与起主导作用,社会资本对于视听和活动参与影响较大,经济资本对个性参与的影响较强。研究结论刻画出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也揭示了面向大众、面向整体、面向创新、面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政策意涵。

一是面向大众,增强文化政策包容性。在开放社会中高雅文化不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独有的领域,文化参与作为身份标志的重要性也会降低。公共文化政策应当增强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在各群体间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扩宽居民文化资本获取渠道,以扩大参与为基础增强文化资本流动性,尤其注意不仅要降低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经济门槛,更要让服务内容和形式充分尊重群体认知差异,普惠兜底的文化服务应成为大众文化资本累积的新起点。文化参与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是个体持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打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转化空间,有意在大众公共生活和网络中树立、宣传文化标兵,发挥先进文化偶像的示范效应,让群众感受到“身边人”的文化感染力。此外,通过大力开展具有广泛参与基础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促进不同社会背景和阶层的人之间交流融合,弥合社会资本裂痕。

二是面向整体,突出文化治理全局性。居民文化

参与多重动因反映出文化活动背后丰富的社会关系,涉及一系列支撑要素: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产品供给、家庭文化氛围熏陶、学校文化艺术教育、社会文化舆论引导等。这些分散实体在规则、程序、组织和绩效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仅从理论上增加了文化参与解释的复杂性,也突显了加快构建文化治理整体性框架的紧迫性。以扩大文化参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文化治理框架核心议题是组织和管理公共文化部门的制度、机构、计划和活动以实现文化参与的公共价值,在此框架下,文化行政应注重完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和群团组织等主体文化生产和交付活动的法律制度、行政规则、司法裁决、市场秩序、社团规程,促进文化立法和执法齐头并进、文化事业和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实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是面向创新,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分析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的内容愈加丰富、层次不断提高,原因除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之外,文化供给侧技术进步的贡献显著。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数字和通信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全新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知名文创企业和爆款文创产品满足群众多层次、个性化文化需要。面向创新的文化政策应着力激发事业单位、文化企业、科技企业等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以应用为驱动,以文化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以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设施体系、产业体系、消费体系,在数字化和“新基建”进程中推进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素材库、人才库、产品库、数据库建设,加强大数据在文创加工设计、文化市场开发、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四是面向未来,加快文化与教育融合发展。本文实证发现通过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文化资本对成年居民文化参与有持久而全面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当下的文化决策可能影响未来成年人群的文化生活质量,也提醒政府、学校和家庭应注重一个人社会化早期阶段的文化能力、习惯和资本的累积。面向未来的改革是将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关口提前,核心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实现培育方针、激励手段、情境

调节等方面协调配合,促进基础教育阶段艺术教育和学科教育融合发展。注重对中小学生艺术兴趣的培养,不仅是教授唱歌画画,而是全面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力、领悟力和创造力。科学设计和实施从小学到高中衔接有序的艺术教育体系和严格的艺术教育大纲,在高考改革中适度体现对学生文化艺术修

养的要求,当下的“双减”政策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应注意,面向未来的文化政策重心不是艺术专项成长,更不是童星或少年偶像团体培训,而是鼓励广泛开展家庭文艺活动和学校文艺课程,帮助广大青少年习得良好的审美趣旨,达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之目的。

注释:

- ① 积极观众的概念表明“读者”是意义的动态创造者,而不是文本意义的简单接受者。20世纪80年代,David Morley和Ien Ang的实证研究认为,阅读发生的文化背景为文本的不同理解提供了框架和资源。
- ② 主要是由血缘、亲缘、朋友、熟人等构成的非正式网络,该网络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和可能与他们发生利益关系的各类社会职业从业者的熟识程度,包括律师、医生、教师、警察、企业高管、人事经理等。社会网络使用算术平均方法对上述各单项观测值进行处理后得出。
- ③ 考虑到文化参与中社会模仿和学习行为发生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对社会互动的衡量使用受访者各类型社交活动的算数平均,主要包括受访者与亲戚、邻居、朋友三种社交活动频率。
- ④ 使用定序测量方法反映最高学历,得分数值1—7分别代表未受教育、小学、初中(或同等)、高中(或同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七个层次。

参考文献:

- [1] JARNESS V. Modes of Consumption: From 'what' to 'how' in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J]. Poetics, 2015(53): 65-79.
- [2] BOURDIEU P.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J].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32): 1-17.
- [3]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J].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2011(1): 81-93.
- [4] FALK M, KATZ G T.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Can We Identify Common Determinants?[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6, 40(2): 127-162.
- [5] 英格尔哈特.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 严挺,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56.
- [6] 陈波, 邵羿凌. 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文化参与的因素研究: 以江西省三村九十九户调查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8(12): 56-66.
- [7] DAVIES S. Still popular: Museums and Their Visitors 1994-2004[J]. Cultural Trends, 2005, 14(1): 67-105.
- [8] MOLINA J A, CAMPAÑA J C, ORTEGA R. Time Spent on Cultural Activities at Home in Spain: Differences between Wage-earners and the Self-employed[J]. Documento de Trabajo, 2016(1): 1-18.
- [9] 刘精明. 能力与出身: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8): 109-206.
- [10] BOURDIEU P.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 du Jugement[M]. Paris: Minuit, 1979: 74-76.
- [11] 奥斯特维尔, 王列生, 张帆. 多元动机、多种体验与文化参与多样性[J]. 文化艺术研究, 2017, 10(4): 146-155.
- [12] NAULT J F, BAUMANN S, CHILDRESS C, et al. The Social Positions of Taste between and within Music Genres: From Omnivore to Snob[J].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1, 24(3): 717-740.
- [13] LIPUMA E. Culture and the Concept of Culture in a Theory of Practice[J]. Bourdieu: critical perspectives, 1997: 14-34.
- [14] 菲斯克. 电视文化[M]. 祁阿红, 张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2-63.
- [15] CHRISTIN A. Gender and Highbrow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Poetics, 2012, 40(5): 423-443.
- [16] SILVA E B, LE ROUX B. Cultural Capital of Couples: Tensions of Elective Affinities[J]. Poetics, 2011(39): 547-565.

(下转第30页)

· 公共文化 ·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徐嘉弈 董广伟

(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日照 276826)

摘 要: 文章以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路径与价值。我国民间图书馆在地域文化建设中秉承“文化整体论”以适应当地整体社会环境,坚持“文化相对论”以拟构地方历史脉络,重现“地方性知识”以传播地域文化。呈现三个主要价值:第一,有利于树立独特风格从而实现自身差异化发展;第二,作为“记忆空间”以传承地域文化;第三,嵌入当地文化发展格局以推动当地文化事业复合式发展。

关键词: 民间图书馆;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58.89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Paths of China's Folk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th and value of China's folk librarie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folk libraries in China adhere to the "cultural holism" to adapt to the overall local social environment, adhere to "cultural relativism" to construct a local historical lineage, and reproduce "local knowledge" to disseminate regional culture. It presents three main values: first, it helps to establish a unique style and thus realize its own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econd, it serves as a "memory space" to inherit regional culture; third, it is embedded in the lo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tern to promote the compou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undertakings.

Key words folk lib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gional culture

1 引言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承担着参与地域文化建设,传播弘扬地域文化的职责,这一职责既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的严格遵循,又是对“文化自信”这一时代呼唤的真切回应^[1]。目前,诸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均将公共图书馆作为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机构^[2]。我国学界对于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研究业已展开,且现有研究主要将传播弘扬地域文化的主体聚焦于官方主办的公共图书馆。此外,高校图书馆因其具有的资源优势、

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学术优势^[3],在传播弘扬地域文化时所起的作用也受到广泛关注。相较而言,非官方主体创办的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中所受到的关注较低,但民间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传播弘扬地域文化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充分关注民间图书馆在地域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作用,不仅有利于民间图书馆自身可持续发展,亦对建立健全地方公共文化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研究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路径与意义,为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提供多学

科理论支持。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是研究社会与文化的应用性学科,关注文化的“普世界性、一般性和特殊性”^[4]。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下,地域文化被学者定义为“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这意味着地域文化具有符号性、系统性及独特性等特征^[5],因而呈现多样化的复杂形态。因此,文化人类学的诸种观点为尊重、发掘、保护、弘扬地域文化贡献了理论基础,也为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指导。本文采用这一研究视角正是基于文化人类学独特的学科关照,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审视我国民间图书馆目前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可以发现众多民间图书馆在此方面已做出了自我发展的实践,而将此类实践加以类比、整合,并作“从具体到一般”的科学性归纳,从而提炼出目前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路径,以为其他民间图书馆建设提供规律性指导,这正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在对民间图书馆实践的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角,能够充分关注民间图书馆实践中的“文化要素”,而这正是目前我国民间图书馆建设中的短板。具体而言,从地域文化本位出发,检视目前我国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中的得失,促进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播;而从民间图书馆本位出发,则能够以弘扬地域文化为契机树立民间图书馆的独特风格,为民间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方向性参考。同时,这一图书馆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亦有利于充实图书馆学理论,并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多元指导。

2 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

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依据可从主、客观两方面探讨。客观方面,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源于对公共图书馆文化职能的继承;而民间图书馆自身面向基层的属性及灵活性强的办馆风格等主观因素则为传播弘扬地域文化提供了有利契机。

2.1 文化职能的“继承性”

2018年1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第一章总则中第四条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6]这一款目对办馆主体为非官方的民间图书馆进行了属性的划归与

确认,即具有“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收集、整理、保存文献信息并提供查询、借阅及相关服务,开展社会教育”性质与功能的民间图书馆处于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中;同时,这也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民间图书馆也相应地拥有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大众的社会属性^[7]及与公共图书馆平等的法律地位与发展权利^[8]。在这一法律背景与逻辑前提之下,《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所规定的包括“促进文化间对话和文化多样性;发扬口述传统”^[9]在内的传播、弘扬地域文化的职能也同样被民间图书馆继承,民间图书馆应予以遵循。而这一文化服务向度也应成为民间图书馆在满足社会大众基础阅读需求之上的发展目标与使命担当。

2.2 植根基层的“在地性”

民间图书馆作为来自民间、服务基层的公共文化设施,因其办馆主体的非官方性,故而天然具有“草根性”^[10]。一方面,非官方主体推动建立的民间图书馆在资金、资源、场地等问题上存在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民间图书馆植根基层,有利于调动本地资源,开展特色文化服务。民间图书馆浸淫于所在地的文化场域之中,与他者介入式的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相比,民间图书馆与地域文化“亲缘”更近,具有因地制宜吸收、传播、继承地域文化的“基因”,“草根性”的劣势转换为“在地性”的优势,能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方面发挥自身价值。

2.3 风格创设的“灵活性”

与官方主导的公共图书馆相比,民间图书馆在营建方面灵活性更高,体现于民间图书馆具有空间形态、资源形态和服务形态方面的多样性^[10],此种多样性实际上决定了民间图书馆风格创设的“灵活性”。由于办馆主体的多样性与非官方性,图书馆建设者、运营者往往依据自身爱好、专长、目标、资金状况及辐射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而建设场馆。正因如此,民间图书馆在吸收地域文化方面具有较强自主性,客观上的束缚与限制较少。而民间图书馆的“灵活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公共图书馆的补充,以“小而美”的面貌呈现。

从现有建设成果来看,公共图书馆和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实践方面呈现总体方向目标一致,而实践方式、规模及侧重点上存在差异。我国公共图书馆弘扬地域文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地方

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以及开展地域文化主题活动等^[1],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实践包括东莞莞城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主编的《东莞历史文献丛书》^[11],首都图书馆建设的“北京记忆”专题地方文献资源网站^[12],杭州图书馆主办的集杭州历史文献及特设工艺展示传播为一体的“杭州匠人”项目^[13],等等。总体而言,公共图书馆,尤其是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地域文化建设时往往依据自身技术、人才、资金等优势,开展规模较大、周期较长、内容较为多样的相关实践,且弘扬地域文化往往只是公共图书馆的服务项目之一。相较之下,我国民间图书馆因自身特点及资金、资源等条件限制,开展的地域文化建设实践规模相对较小,但灵活性更强。同时,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趋势下,多数民间图书馆对地域文化的依赖性相对更高,换言之,对于我国民间图书馆而言,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其自身谋求发展的必然需求。因此,探讨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

3 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

如前文所述,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路径与公共图书馆有所不同,民间图书馆因其自身特质,在传播、弘扬地域文化方面呈现出独特风貌。本研究引入文化人类学视角,不仅能够拓宽认识我国民间图书馆与地域文化间互动关系的视野,而且可从孤立的实践案例中归纳出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主要路径,以作未来发展之参考。

3.1 秉承“文化整体论”,融入地域整体社会环境

对地域文化的讨论无法剥离社会环境,其中生态环境、历史传承、制度习俗等因素都对地域文化的形塑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即以整体的目光看待人类行为,强调与其相关的自然形貌、物质空间及人文环境等诸要素不可分割、相互协调^[14],应将其视作有机的系统加以整体看待。

民间图书馆作为负载文化职能的实体空间,亦身处地域文化的整体系统之中。民间图书馆融入当地自然与人文环境而不显突兀,且能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甚至凸显和谐之美,这正是文化整体论在民间图书馆

参与地域文化建设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形态学认为,文化有层次之别,大致可划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理文化层^[15](见图1),此四次由表及里地展现了人类文化实践中的不同维度,为整体地看待人类文化活动提供了认识工具。对于地域文化而言,物态文化层主要指当地的自然景观及民居、代表性建筑等人文景观,制度文化层包含了村规民约等规定性内容,行为文化层涵盖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习俗礼仪等惯习,而心理文化层则指向当地居民特有的审美意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心理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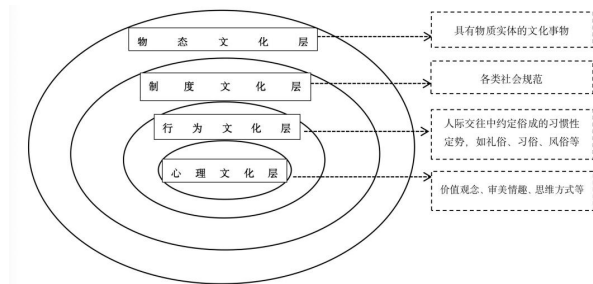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文化结构的四个层次

部分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时呈现出遵循文化整体论的倾向,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民间图书馆如福建省的月溪花渡图书馆。该馆的主体建筑由当地的废弃水电站改建而成,承继并保持了其原有的中国传统建筑工艺的夯土木结构形式,以“融入”而非“介入”之姿汇入当地地域文化系统中;且图书馆内部装置基本以木材为主,贴近闽地多林木的生态环境;外壁夯土墙之上加装的玻璃窗,则为读者提供了欣赏月洲村山水景观的自然窗口,实现了图书馆空间与自然环境的沟通,使得图书馆空间不再孤立于自然环境之外,而是与其共同构成一种“连续交互的人文体验”^[16],从而形成整合自然与人文的整体系统,呈现了民间图书馆积极融入当地文化系统中物态文化层的努力。同时,该馆位于福建省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该村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在宋、明、清三朝诞生了数位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光耀门楣的文人,有“八闽文化第一村”的美誉^[17]。月溪花渡图书馆选址于此,精准契入当地重视读书修身的共有文化观念,呈现出对当地整体文化结构中心理文化层的深入把握。再如位于漳州平和县崎岭乡下石村的桥上书屋,该图书馆的空间主体为联通两座客家土楼的由木条包裹的桥梁,桥梁中部的小型图书馆主要面向当地村民、儿童^[18]。桥上书屋因其建筑材料就地取用的环

保持特性及融入地域文化自然形态而厕身于《卫报》评选的2021年世界八大环保建筑之一,其对当地物态文化层的吸收与再造受到认可。此外,书屋架起的桥梁联通了互有隔阂的两岸异姓村民,成为两岸村民相互走动的物理实体,进而削弱偏见、增进交流,这一功能则彰显了民间图书馆能够深入地域文化结构中的行为文化层、心理文化层,甚至对当地社会传统、居民心理结构产生积极影响。再如坐落于浙江省桐庐县莪山乡戴家山村的先锋云夕图书馆“嵌入”当地乡村庭院,以当地闲置院落为图书馆空间主体,在保留传统山乡自然、社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营造一处公共文化场所。先锋云夕图书馆还呈现了对当地畲族社会风貌的尊重,图书馆修复了传统的黄泥土坯墙、小青瓦屋顶等建筑构件,在图书馆内阅读即被斑驳的土墙体环抱,传承畲族“诚实建造的朴素美学”^[19],使馆内阅读不仅成为读者吸取知识的过程,更成为深入体验莪山畲族文化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先锋云夕图书馆在参与莪乡文化时“表”(还原建筑构件)“里”(传承美学价值)并重,从当地物态文化层逐步深入心理文化层的整体性实践思维。

以上案例均体现了我国民间图书馆在空间实践中以柔性姿态融入当地社会环境的有益尝试,致力于实现民间图书馆与当地人文环境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有效互动。民间图书馆在融入地域整体社会环境的实践中,多以建筑设计为切入点,从当地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撷取营建材料或设计灵感;强调将民间图书馆的两重属性,即延续当地历史记忆的“时间性”与向大众传播文化的“公共性”^[19]相结合,使民间图书馆在时间、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实现对地域文化的吸收与再造。从文化整体论角度出发,民间图书馆依托所在地自然、人文要素而诞生,其空间实践必然在此基础上实现。具体而言,就是深入当地地域文化肌理,通过展示、借用、还原等方式嵌入当地的地域文化结构之中;同时,民间图书馆的文化资源满足了当地读者的阅读需求,甚至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而吸引外来读者,拉动地区经济,使当地地域文化进入公众视野,在此意义上实现了民间图书馆对当地社会的反哺,使民间图书馆真正为地域文化建设施加正向影响,从而成为地域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

3.2 坚持“文化相对论”,再现地域独特人文风貌

尊重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人类学的普遍关怀,且

不同的地域文化自有其发展的独特历史脉络,这也使得承认文化的差异性成为研究一地文化的前提。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提出了“文化相对论”,认为不同地域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文化必须就它本身特有的历史过程来了解”,将文化人类学的使命定位为通过考察、构拟一地的历史脉络,从而了解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20]。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挖掘当地独有的人文历史内涵在认识地域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价值,也为民间图书馆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思路。

如前文所述,我国民间图书馆自身具有“在地性”“灵活性”等特点,因而地方独特的文化土壤可以视作民间图书馆的生长源泉,民间图书馆更需依赖地域文化浇筑自身发展根基。从目前实践成果来看,部分民间图书馆已意识到挖掘地域人文历史内涵的重要性,譬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的青山书院是一家以“弘扬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传播现代文明”^[21]为宗旨的民间图书馆,书院得名于当地著名历史人物——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青山;同时,书院背靠梁山,水浒文化也成为其文化养料。故而青山书院从李青山文化、梁山文化乃至齐鲁文化形貌中挖掘、提炼出“忠义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传承的核心概念。为传播、传承忠义文化,青山书院多次举办主题研学、读书交流、书画征集、院刊编纂等活动,并以“迎接新中国成立和庆祝梁山建县七十周年,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忠义精神;提倡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目标,于2019年举办以“爱祖国·爱家乡·爱阅读”为主题^[22]的主题朗诵会,充分概括了青山书院倡导的忠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忠义文化的传承是青山书院得以立足的根基,而青山书院回溯、整合、提炼了植根于当地历史脉络的忠义文化的内核,取其精华,将“忠义”落脚于热爱祖国、传承文化,并与阅读修身相结合,使之与时代精神相契。苏州吴中区的运河图书馆是以企业为办馆主体的民间图书馆,该馆以发源于苏州的昆曲文化为主题,将昆曲名家、研究者捐赠的昆曲珍本和大量昆曲文化书籍作为特色馆藏,并邀请专家开展苏州文化专题讲座,传播昆曲文化^[23]。在图书馆的空间再造中则融合了苏州典型的昆曲元素与园林元素,借鉴月洞、海棠门等园林元素及昆曲的剧场性表现形式^[24],使图书馆的形式与内容自洽,再现了苏州深厚的艺术文化传承脉络与婉转精致的独特文化风格。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贾岛图书馆,则以唐朝诗人贾岛

为名,选址于为纪念贾岛而建立的贾公祠内^[25]。房山作为贾岛故里,该民间图书馆将诗人贾岛及中华诗词文化作为核心概念,将偏小众的诗人及其故里文化引至台前。此外,四川省泸州市的苏佐先生收藏5万余册与泸州历史文化相关的书籍,开设苏佐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向市民免费开放^[26]。以挖掘地域文化为宗旨的民间图书馆虽大多规模较小,但也在客观上实现了图书馆“专门化”倾向,成为传播传承地域文化的公共文化空间。

我国民间图书馆在弘扬地域人文历史方面主要从传承历史文化及挖掘“文化盲点”两个层面着手,这正反映了民间图书馆对地域独特历史文化的重视,呈现出文化相对论的实践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图书馆多采用如下措施:①围绕历史文化名人设定民间图书馆主题,开宗明义地传播特色地域文化,如贾岛图书馆等;②收藏展示地域文化主题文献,集中展现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如运河图书馆、苏佐历史文献图书馆等;③举办主题活动,拓展民间图书馆文化职能,提升地域文化传播效能,如梁山青山书院等。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出发,民间图书馆挖掘人文历史层面的地域文化的诸种举措就是参与拟构地域历史脉络、丰实地域文化肌体的方式。此外,从提出之日起,文化相对论便承载了反对文化中心主义的使命,从文化内部来看,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则提醒人们尊重、理解不同地域的独特文化。我国地大物博,各地文化差异较大,民间图书馆积极挖掘地方独特人文历史内涵,呈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亦有利于帮助大众深入理解文化多样性。

3.3 挖掘地方性知识,传承地域文化与风俗

信仰与习俗是地域文化链条中的重要组成,是地域自然与社会风貌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呈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地方性知识理论,学者认为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本体地位的知识”,不可脱离“特定的情境(context)”^[27],也即“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要素。换言之,地方性知识诞生于特定历史脉络,且适用于当地民族或社区。了解地方性知识是承认文化多样性,理解、尊重、包容其他文化的关键环节。

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民间图书馆同样具有对以地方信仰、习俗为代表

的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使命。玉树藏族自治州拥有悠久的藏文化渊源,当地宗教文化信仰多元,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此汇聚。2017年竣工落成的诺林图书馆即发挥了传承和弘扬地域风俗信仰的职能。诺林图书馆的十一个部门中有四个部门专事收藏展示当地宗教、语言、信仰、社会风俗的文献,文物展览馆则拥有众多藏文书法作品;除音像室、电脑室等功能空间外,诺林图书馆还设有提供藏式奶茶、印度甜茶等特色饮食的茶歇区域^[28],潜移默化地展现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兰州穆斯林图书馆同属对地域信仰风俗展示与传承的民间图书馆的实践典型,其藏书包含丰富的伊斯兰史、穆斯林史、回族史等信仰与民族的典籍文献,以及众多不易获取的民族文化类非正式发行刊物;此外,图书馆还以公益慈善方式回馈社会,成立诸如“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穆斯林妇女慈善会”等组织,以穆斯林身份组织慈善活动服务大众,成为社会认识、了解穆斯林信仰文化的窗口,因其无分民族的公众服务性质,被王子舟教授称为“没有围墙的穆斯林大学”^[29]。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信仰就是地方性知识,其中集中展现了民族独有的文化风貌,民间图书馆以挖掘、呈现地方性知识为途径,充当了民族文化的展示窗口。

除传承民族及宗教信仰外,还有以地方风俗为主要传承对象的民间图书馆,如广东省开平市的关族图书馆。这是一家坐落于侨乡的宗族图书馆,由关姓宗族出资兴办,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关族图书馆除承担图书馆的文教功能外,兼有沟通乡里、联络宗族的职责,其主要表现于编印寄往海外侨胞的《光裕月报》以传达家族信息,编制族谱,纪念展示宗族优秀先人,组织祭祀等活动^[30]。关族图书馆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把握可谓射中鹄的,我国传统文化渗透着宗族文化的烙印,“敬宗法祖”“家国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宗族文化也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如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立足中国东南的自然地理与民众生存需求提出宗族文化的重要意义,构建了中国宗族模式^[31]。从学界的关注视野来看,广东是宗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这也证明了宗族文化是广东重要的地域文化形态。因此,关族图书馆所呈现的重视宗族组织、传承宗族文化的实践,实际上起到了展示广东乃至华南地区在宗族文化统摄下的民俗风貌、呈现当地地方性知识的重要作用。

我国民间图书馆在地方信仰风俗传承的实践方面体现出两种路径：①展示体现信仰习俗的物质载体及仪式。如诺林图书馆的典籍及民族饮食，关族图书馆修撰的族刊、族谱，祭祖仪式等。物质载体与仪式是地方信仰与风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对两者的展示是最为迅捷的传承地域文化的方式。②以与地域文化适配的运营模式揭示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如以关族图书馆为代表的宗族图书馆，宗族图书馆多通过联络宗族获得持续运营的资金支持，并通过族刊向宗族成员传递宗族近况，实现信息畅通；主动承担联络宗族的责任，凝聚宗族向心力。而读者通过参观，也能从这一特殊的运营模式中把握宗族文化的内涵。

总体而言，我国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体现了以文化整体论适应融入当地文化系统，以文化相对论拟构地方历史脉络，尊重、重现并展示地方性知识以传播弘扬地域文化的路径。且以上文化实践的达成均与民间图书馆自身特性息息相关，民间图书馆的草根本色与灵活风格为其参与地域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4 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

检视并反思现有我国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经验、案例，可发现民间图书馆在参与地域文化建设中呈现出三重价值。具体而言，即对民间图书馆自身生长的价值，对地域文化记忆生成的价值，以及对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价值。

4.1 树立自身个性化风格，形成生长内驱动力

印度图书馆学巨擘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特别提出了“图书馆是生长的有机体”这一属性^[32]，以此肯定了图书馆不断生长更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对于目前我国民间图书馆而言，除资金、规模、人才等客观因素外，缺乏个性化风格也成为民间图书馆生长发展的制约因素。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一地发展的宝贵财富，处于地域文化系统中的民间图书馆同样受惠于地域文化的滋养；而通过主动发现、吸纳、融合地域文化资源，形成“人无我有”的独特风格，则是民间图书馆得以在竞争中突围的内在动因。

文化相对论对小众文化的现实关怀启示民间图书馆运营者，应积极把握地域文化中能够为我所用者，以“差异化”思维树立独特办馆风格，从而形成自

身发展的内驱动力。如运河图书馆就是充分运用“差异化”理念的案例，运河图书馆在苏州众多文化资源（如园林文化、苏绣文化、评弹文化、吴门画派文化等）中选取了昆曲文化作为自身主题，不求全而求精，精研深挖；且图书馆各类空间实践均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有的放矢，从而形成自身生长发展的内驱动力，成为民间图书馆得以存续、生长的内在机理。

4.2 充当地域“记忆空间”，传承独特在地文化

杜定友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表了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的著名论断^[33]。这一论断也使得图书馆与保存社会记忆的职能紧密联系。在文化记忆理论的框架下，图书馆成为了文化记忆的媒介^[34]，承担了地方“记忆空间”的文化价值。

与官方主办的公共图书馆相比，民间图书馆作为地方“记忆空间”的独特性体现于挖掘、传承地域文化的过程由民间主要推动，因此能够较多呈现贴近当地的、个性化的“地方性知识”，从而形成对公共图书馆的所展示的地方“集体文化记忆”的补充。如梁山青山书院挖掘的“忠义文化”，是具有浓厚儒家传统氛围的齐鲁文化的重要分支；且梁山县因《水浒传》中梁山泊所在地而闻名于世，具有深厚的“忠义文化”资源，因而青山书院发挥了保存与弘扬这一地方性文化记忆的功能。此外，民间图书馆在发挥“记忆空间”功能时，实际上整合了纪念馆的部分功能，从而形成“图书馆+纪念馆”的职能创新，如关族图书馆在进行族谱编制、祭祖等仪式性活动时，同时承担了“文化展演”功能，和读者共同参与到这场文化记忆的“社会剧”之中^[35]，从而为读者的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生成、巩固奠定基础。

4.3 嵌入地方总体格局，推动文化事业复合式发展

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是主动将自身嵌入地方文化事业总体格局中的举措。从“文化整体论”角度出发，民间图书馆无法剥离地域文化环境而单独存在发展，地域文化环境势必对民间图书馆产生影响。对民间图书馆自身而言，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是“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图书馆发展的必由之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民间图书馆“孤岛式”的发展模式，增强民间图书馆的“社会联结”^[36]，从而有助于其获得来自官方或其他社会机构的资源支持。如弘扬藏地文化的诺林图书馆在建设之初受到了自治

州文化局的支持;以“健全房山文化旅游连接线”为宗旨的贾岛图书馆获赠来自故宫博物院的2 000余册书籍^[37]等。而对当地文化事业而言,民间图书馆参与到地域文化建设中,使官方与非官方机构协同配合,形成地方文化事业的复合式发展格局,从而扩大服务半径,为读者提供更为多样的文化选择。

5 结语

文化人类学观点的引入,为厘清民间图书馆与地域文化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导民间图书馆参与地域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民间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有力补充,因规模、选址及建设规划方面“灵

活性”等较强的优势,便于对所在地特色地域文化加以吸收、融会,且“在地性”优势有利其贴近所在地风土人情,挖掘潜在的“地方性知识”,以此打造自身的独特风格,充当地方“记忆空间”,最终纳入地方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以获得文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植,从而进一步开发民间图书馆的服务潜能。此外,部分官方主办的公共图书馆,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书店(如北京正阳书局、广州楠枫书院、济南阡陌书店等)都日益成为参与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民间图书馆应借鉴不同类型主体之所长,与其他主体展开广泛合作,在公共阅读空间系统中形成弘扬地域文化的合力,充分发挥文化机构传承地域文化、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欢.公共图书馆弘扬地方文化的逻辑阐释与实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1):20-24.
- [2] 冯凯悦.图书馆职业如何承担起保护中国乡土知识的职能[J].图书与情报,2010(3):21-22.
- [3] 段昌华.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地域文化建设服务的思考[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99.
- [4] 袁同凯.文化人类学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9-10.
- [5] 张凤琦.“地域文化”概念及其研究路径探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8(4):50,63-66,127.
- [6] 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17-11-04].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27.htm.
- [7] 那艳,吴汉华.多数民间图书馆属于公共图书馆:兼论古越藏书楼的公共图书馆性质[J].图书馆杂志,2022,41(1):39-41.
- [8] 于风程.论《公共图书馆法》对民间图书馆的影响[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6):48-50.
- [9] 张树华.对1994年《公共图书馆宣言》的认识和理解[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3):5.
- [10] 王子舟.民间图书馆的新形态、新功能[J].图书馆论坛,2016,36(12):23,32-37.
- [11] 中国新闻网.《东莞历史文献丛书》首发 收录199种宋明清著作[EB/OL].[2022-03-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128034674541437&wfr=spider&for=pc>.
- [12] 中国新闻出版网.首图地方文献上网再现“北京记忆”[EB/OL].[2022-03-01].<https://www.chinaxweb.com/info/43978>.
- [13] 柴玲姬,陈锋平.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化传承工作探析:以“杭州匠人”项目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5):94-95.
- [14] 黄丽坤.基于文化人类学视角的乡村营建策略与方法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46.
- [15]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0-32.
- [16] 韩冬青.融入城市 强化内容 整合设计——关于文化建筑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建筑学报,2012(7):10.
- [17] 新华网.月溪花渡乡村图书馆开馆 福州再添田园书香新名片[EB/OL].[2022-02-01].http://m.xinhuanet.com/fj/2018-08/28/c_1123343516.htm.
- [18] 泉州网-东南早报.漳州土楼“碰”出桥上书屋 传统与现代交融[EB/OL].[2022-02-01].<http://mn.sina.com.cn/news/m/2012-08-27/09486364.html>.
- [19] 王铠,张雷.时间性 桐庐莪山畲族乡先锋云夕图书馆的实践思考[J].时代建筑,2016(1):64-73.
- [20] 叶志坚.博厄斯学派文化思想论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4):50-52.
- [21] 济宁看点.梁山青山书院举办迎“423世界读书日”线下读书交流活动[EB/OL].[2022-02-01].<https://www.163.com/dy/article/FATD41G70525C8NA.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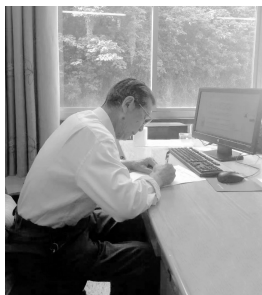
- [22] 济宁看点.梁山青山书院“爱祖国·爱家乡·爱阅读”主题朗诵会在梁山新华书店举行[EB/OL].[2022-02-01].<https://www.163.com/dy/article/EOL4NFE00525C8NA.html>.
- [23] 中国江苏网.吴中区启用运河图书馆 免费向市民开放[EB/OL].[2022-02-01].http://jsnews.jschina.com.cn/sz/a/201707/t20170727_847430.shtml?isappinstalled=0.
- [24] 如室.苏州运河图书馆[EB/OL].[2022-02-01].<http://new.rushi.net/home/works/detail?id=179659.html>.
- [25] 首都文明网.世界读书日贾岛纪念馆、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EB/OL].[2022-02-01].http://www.wenming.cn/syjj/dfcz/201204/t20120425_627857.shtml.
- [26] 四川新闻网.泸州“书痴”建私人图书馆 耗时十年编纂苏氏族谱[EB/OL].[2022-02-01].http://sc.cnr.cn/sc/2014sz/20150405/t20150405_518233048.shtml.
- [27] 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杨德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9:20.
- [28] 文化火种寻找之旅——个体公民公益图书馆事迹寻访录.诺林(宝苑)图书馆[EB/OL].[2022-02-01].<http://www.mjtsg.org/getLibs.asp?ID=382>.
- [29] 王子舟.一座没有围墙的穆斯林大学——甘肃省“兰州穆斯林图书馆”田野调查手记[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1):121-125.
- [30] 李斯,沈默,冯华倩,等.论关族图书馆联系侨乡宗族关系的职能[J].图书馆论坛,2014,34(3):7,40-45.
- [31] 乔素玲,黄国信.中国宗族研究:从社会人类学向社会历史学的转向[J].社会学研究,2009,24(4):196-200.
- [32] 侯汉清,刘迅.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概述[J].图书馆杂志,1985(4):14-18.
- [33] 唐高潮.图书馆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纪念杜定友先生关于图书馆与社会的理论发表六十周年[J].图书馆杂志,1988(5):51-52.
- [34] 刘博.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图书馆——社会记忆与图书馆关系新论[J].图书馆建设,2016(3):13-16.
- [35] 马萍,潘守永.从“仪式性”看纪念馆的“文化展演”空间实践[J].东南文化,2017(2):115-121.
- [36] 陶成煦,颜颜邓邓.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民间图书馆的功能拓展与发展策略[J].图书馆,2021(9):42-43.
- [37] 中国文化报.故宫博物院向贾岛图书馆赠书2000余册[EB/OL].[2022-02-01].<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624/c172318-21945920.html>.

作者简介: 徐嘉羿,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图书馆、图书馆建设;董广伟,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间图书馆、图书馆建设。

收稿日期: 2022-01-21

本文责编: 王晓琳

缅怀毛昭晰先生



著名史前史学家、第八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图书馆研究与工作》顾问毛昭晰先生于2023年1月5日在杭州不幸辞世,享年94岁。

毛昭晰先生生前始终关心《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的发展,在一年一度的编辑委员会会议上,身为顾问的他积极为我刊的发展献计献策。2016年,在我刊公开出版之际,时年87岁的毛昭晰先生亲临编辑部为我刊题写了贺词。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斯人已去,音容犹在。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毛昭晰先生!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2023年1月5日

· 公共文化 ·

公共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研究*

——以六安市图书馆为例

严贝妮¹ 张子珺¹ 刘亚东²

(1.安徽大学管理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9)

(2.六安市图书馆 安徽六安 237000)

摘 要: 文章以全国首个采用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市级公共图书馆——六安市图书馆为研究对象,访谈其运营副馆长,并利用案例研究法分析该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两大主体及图书馆组织架构、资源建设、特色活动和分馆建设四个运作流程。总结出该模式的四个优势:社会力量承接运营工作,推进公共图书馆发展;政府全程监督把控方向,企业确保运营效果;充分调用企业掌握资源,丰富资源建设活动开展;分馆建设提升读者到馆率,健全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社会力量;六安市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1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Whole-Library Entrusted Operation Mode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Lu'an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Lu'an City Library, the first municipal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to adopt a whole-library entrusted operation mode, as a research object. An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A case study shows the two main bodies of the entrusted operation mode, as well a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resource construction, special activities and branch library construction. Four advantages of the model are summarized. Social forces can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of libraries,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ies. The government supervises the whole process and points to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with social forces ensuring the operation effect. We can enrich library resources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companies. Branch library construction will improve reader attendance and thus refine the system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whole-library entrusted operation; social force; Lu'an Library

1 引言

全馆型委托运营指政府将公共图书馆的整体运营管理,通过有偿或无偿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向社会

公众提供,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运营的方式之一^[1]。政府在2011年时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 本文系2020年安徽大学文科重大科研培育项目“面向文化强国战略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0ZD009)的阶段性成果。

划》中指出“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主要任务之一是使“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更加成熟”^[2]。

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
在三方面:第一,社会力量与政府等主体间的关系。
如汪圣认为购买者、承接者和消费者三个主体的共同
作用,导致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服务质
量不高和公平性欠缺^[3]。胡安琪从法权互动的角度考
察政府、社会力量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构建出公共图
书馆政社合作的法权互动关系模型^[4]。第二,图书馆
社会合作的机制和路径。如易斌等人认为政府购买运
营服务是提升区级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有效路径^[5]。王
平等提出图书馆管理者驱动的“以资源为核心”的
总分馆与社会合作融合路径^[6]。第三,图书馆社会化
运营管理的典型案例。如社会力量助推郑州市城市阅
读空间的品牌化^[7]。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之城”建
设创建了可复制的成熟模式^[8]。面向用户碎片时间的
公共图书馆分馆遵循着“短平快”和“以人为本”的
服务理念^[9]。公共图书馆引入社会力量合作打造特色
阅读空间“悦·书房”,在保持书店特色的同时,充分
发挥了公共图书馆的专业优势^[10]。

“十四五”时期要求更高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质量,公共文化设施配置要“精”且“足”,六安市图
书馆是全国首家采取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市级公
共图书馆^[11],自2019年开馆以来陆续被光明日报、人
民网、新华网、安徽日报、皖西日报等媒体累计报道1
244次。该模式将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工作全部委托
给社会力量,而政府只负责监督以及控制图书馆的发
展方向。经过两年多的运营,六安市图书馆的服务已
经具备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效率,读者愈发乐意参与
图书馆的活动,培育相关技能,享受读书生活,激发
文化热情,增强精神力量。因此,本文运用访谈法对
六安市图书馆运营副馆长进行访谈,在深入了解了六
安市图书馆的全馆型委托运营项目后,利用案例分析
法揭示了六安市图书馆的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并分
析该模式的优势,希望为创新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运
营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2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的建设现状 概述

为优化六安市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六安市委
和市政府在2016年建成了面积为2万平方米的六安市
图书馆主体建筑,并且未遵照传统的批准编制、配齐
人员的路线,而是按照“具有全国影响力、专业化水平
高”的标准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引入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12],并与其下属上市公司安徽新华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皖新传媒)签订战略合作、装修
工程、委托运营等协议,将六安市图书馆的装修工程
与运营服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交由国有企业负责,在
皖新传媒完成六安市图书馆装修工作后,继续由其负
责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管理。

六安市图书馆于2019年6月30日开始试运营,在
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仍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于
2020年获得了安徽省“十家最美图书馆”“十佳夜读
空间”的称号。2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共有五层,设
有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少儿、低幼、报刊、视
障七个主要阅览区,总阅览座席1 300个,还设有报
告厅、沙龙区、读者培训室、休闲区、视听区等功能区
域。截至2021年12月31日,注册读者量106 234人,馆
藏文献资源54万册件,数字资源库21个,文献累积外
借量1 923 246册次,数字资源访问量7 974 501次;举
办活动1 480场,其中线上活动200场;拥有456人的志
愿者团队,其中专业志愿者95位;2021年在职工62
人,现设运营馆长1名、运营副馆长1名。

3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解构

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与传统政企合作模式略有
差别。在传统政企合作模式中,社会力量一般参与图
书馆的某一服务环节或单独的项目,而在全馆型委托
运营模式中,社会力量不仅承接图书馆的前期场馆空
间设计和设备配置等工作,而且负责图书馆的总体运
营。六安市图书馆的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包括运营主
体和运作流程。下文将分别分析该模式的主体和运作
流程。

3.1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两大主体

六安市政府和皖新传媒是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
委托运营模式中的两大主体,即政府方和企业方,也
可看作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六安市政府在公共图
书馆建成之初即着手寻找合适的承接方,在全方位评
估了能够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后,最终决定

引入皖新传媒承接六安市图书馆的全馆型委托运营工作。

皖新传媒实力雄厚,是全国出版发行业中首家主板上市的公司,并且于2011年跻身全国知名文化企业,2016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其业务范围涉及文化消费、教育服务、物流等。该公司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也有相当快速的发展,自2017年承接六安市图书馆以来,至2021年底还参与运营了合肥市包河区图书馆、徐州市云龙区图书馆、徐州经开区图书馆、六安市叶集区图书馆、蒙城县图书馆以及太和县图书馆,中标了阜阳市图书馆、马鞍山市博望区图书馆和六安市霍山县图书馆,并形成了可供复制的经验模式。皖新传媒正式承接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任务后,六安市政府成立了六安市图书馆运营管理中心,该中心制定了运营考核指标,并且负责监督、评估以及考核承接方的业务绩效。

3.2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的运作流程分析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的运作流程包括准备阶段与施行阶段,如图1所示。准备阶段从政府方设立投资与运营领导小组开始。政企双方完成契约签订后,企业方开始着手场馆设计、设备采购和装修工程等工作,政府方也同时设置了工程监理和跟踪审计小组,对企业方的工程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在硬件设施准备齐全后,委托运营的施行阶段正式开始。这一阶段中六安市政府又设立了六安市图书馆运营管理中心,该中心负责监督和评估皖新传媒的运营工作,皖新传媒设置运营馆长统筹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工作,并同时与皖新传媒公司总部和六安市政府保持沟通、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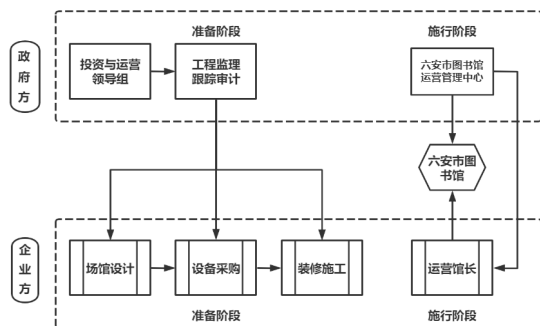


图1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流程

3.2.1 准备阶段

在全馆型委托运营的准备阶段,政府方通过设

立相关领导小组和工程监督小组的方式,把控着政企合作的节奏以及工程的质量。在企业方进行场馆设计时,六安市政府提出要将皖西作家、皋陶文化、红色文化等六安市的本地文化符号融入场馆设计装修中,发挥了政府引导的作用。企业方承接项目之后,利用其设计、装修及运营一体化和内部沟通协调的便利,提前制定运营方案,并在设计装修阶段融入运营方案的具体要求,使得场馆设计能够精准对接后续运营的需求,体现了“以运营为核心”“运营先导”的理念。

3.2.2 施行阶段

在全馆型委托运营施行阶段,政府方设立六安市图书馆运营管理中心(对外称“六安市图书馆”)承担运营审核把控和业务绩效考核的任务,皖新传媒设立正副运营馆长负责图书馆的常态化运行管理。

(1) 组织结构

与传统的图书馆业务部门设置不同,六安市图书馆随着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不断灵活调整适应业务需求的组织结构。刚开馆时,由于馆内事物繁多,所以部门划分较细,设置了1位运营馆长和3位运营副馆长。运营馆长分管人力财务部并统筹3位副馆长的工作,3位运营副馆长共分管了7个部门,分管部门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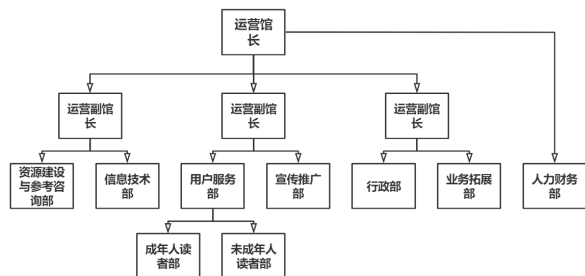


图2 六安市图书馆组织结构(旧)

在运营趋于稳定之后,六安市图书馆对于组织结构实施了改革,以加强部门之间的管理和沟通效率。目前的组织结构如图3所示,由运营馆长直接负责综合管理部,综合管理部即相当于一个后台支持部门,负责采编、咨询、人事、行政、技术和宣传工作。虽然该部门的业务范围较广,但采编、人事、行政、技术和宣传等工作都有运营公司总部相关部门的支撑,一部分工作内容交由总部统一调度和执行。运营副馆长则负责成年人读者部和未成年人读者部,即前端服

务部门,直接与读者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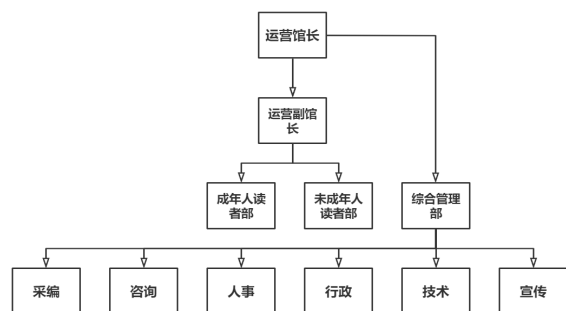


图3 六安市图书馆组织结构（新）

这种组织架构的特点是降低跨部门协作的难度,运营馆长在负责综合管理部时也调配副馆长的工作,副馆长则直接管理两个前端部门。正副馆长们需要把控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公益性特征、资产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内容^[12]。这样的分工使得图书馆的组织更严密、管理更集中。在馆员配置方面,包括馆长在内的六安市图书馆全体馆员均未加入六安市政府的编制,而是签订了劳务合同,由皖新传媒负责培训和管理,分布于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当中,截至2020年,六安市图书馆馆员本科以上学历达到69%,是六安市图书馆能够提供较高服务水平的人力保障。

（2）资源建设

在纸本文献资源方面,政府方与企业方通力合作,保障了图书质量和图书外借率。政府方将图书采购任务交由皖新传媒后,皖新传媒利用其掌握的市场数据、借阅排行以及馆配业务的专业力量,为读者编制图书馆采购方案,并利用其图书选购、采编的经验和专业馆配资源服务团队直接为六安市图书馆采购图书。另外,图书馆的文献采选工作还开通了现场采访、读者在线荐购、“你选书、我买单”、接受捐赠等途径^[13],确保能采购到读者需要和满意的图书。

企业方在采购图书时,需要满足政府方的一系列要求,例如六安市图书馆首批图书采购时的要求是:图书来自国家百佳出版社的比例需高于采购总量的85%;图书出版时间为采购时近三年出版的比例不低于采购总量的85%;重点保障六安市特需的《皋陶文化图书专区》;由企业负责全部图书编目、加工、上架等工作^[14]。同时,所有到馆图书均由政府方组织第三方进行到馆拆包、逐本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以保障

图书采购质量。

由皖新传媒负责纸本文献资源的采购,能够更好地全力投入到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工作当中。图书采购后,需要对图书进行上架陈列和提供借阅服务。为提升图书展示效果,图书馆创新图书分类方式,结合营销热点,引入热门作者和主题标引。在展示书籍时采用封面展示、主题展示和书脊陈列等方式。为加强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六安市图书馆还建立了红色文化专区、皖西作家学者专区、参考阅览专区和皋陶法律专区,体现了六安的地方特色。上述措施使六安市图书馆截至2021年底的馆藏图书整体外借率超过359%^[15]。

（3）特色活动

自2019年8月举办第一场活动开始,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六安市图书馆共举办活动1480场,其中有影响力较大的品牌活动,也有契合时事的主题活动,更有为特殊群体开展的专门活动。将六安市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按照面向对象分,可分为面向成人的读者活动和面向未成年人的读者活动,这种分类也符合六安市图书馆的部门分工。成人读者活动主要面向六安市市民开展,未成年人读者活动面向婴幼儿、中小学生和高中生开展。在划分活动对象的基础上,六安市图书馆将举办的各类活动进行了进一步划分,详见表1。

①阅读推广。阅读推广类活动是六安市图书馆的主打系列活动,皖新传媒利用其在出版传媒领域累积的作家资源优势,邀请了众多文化名人和知名作家做客六安市图书馆,开展了包括新书分享会、阅读分享会在内的各种阅读推广活动。例如皋城公开课活动,邀请过全国各地知名学者专家来到六安市图书馆开展公益讲座,并同时进行线上直播,2020年共举办8场讲座,现场读者人数2860人,线上的两场直播观众人数达到8万人,不仅使得皋城公开课这一阅读推广品牌深入人心,更有效提升了六安市图书馆的知名度,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六安市图书馆也善于抓住节庆和社会热点事件推出主题阅读推广活动,例如“4·23”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国庆系列主题活动等。

②非遗历史。六安市图书馆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广工作,不仅在馆内设置了皋陶文化专区,也定期举办相应的文化讲座和活动,例如皋陶法治专区、皋城观皋陶、皋城印象等活动。除皋陶文化

表1 六安市图书馆读者活动情况

活动面向对象	活动类型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成人	阅读推广	六六读书会/江淮读书月/皋城公开课/红色读书分享沙龙/文学戏/绘本阅读家长分享交流会	组织主题多样化的读书活动,交流体会
	非遗历史	庐剧班/中国篆刻艺术鉴赏/皋城观皋陶/清平乐/葫芦烙画分享沙龙/漫谈中国茶/皋城印象/翁墩剪纸/皋陶法治文化	举办与非遗或历史文化有关的讲座或体验活动
	兴趣爱好	六图有戏/民族舞/走秀班/葫芦丝班/口琴班/萨克斯班/主题电影展播/国风妆发系列体验/手机拍大片/国庆古筝公益音乐会	学习相关兴趣爱好知识
	健康健身	衡御钝斋医学专题讲座/健身球班/柔力球班/健康与运动主题分享会/秋季三侯论养生	教授健康知识、运动技巧
	教育培训	家庭教育公开课/商务礼仪课/演讲与口才/教师礼仪/老年信息素养培训/语言实验室/女性仪态课堂/民法典主题讲座	主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弱势群体支持	常春藤/国际盲人节特别活动/九九重阳节公益文艺汇演/特教学生作品爱心特卖会/视障人士数字阅读推广/映山红书屋	开展弱势群体支持、帮扶活动
未成年人	婴幼儿类	幼儿英语启蒙	幼儿英语课
	阅读类	周日早读课/周末绘本剧/儿童文学作家分享会/山丘故事会	绘本领读、儿童作家讲座
	休闲娱乐类	火箭制作体验/国庆少儿电影放映/STEAM教育实践体验活动	手工、游戏、电影放映
	学业辅导类	周六英语角/2021中高考优秀学子报告会/关于高考写作的几点思考/我的学习“魔法力”	科目辅导、学习经验分享
	亲子类	佛山咏春拳亲子运动课/语言实验室/亲子运动/中秋亲子沙龙/亲子花艺DIY/母亲节活动/亲子公开课/亲子手作课堂/亲子共读21天打卡计划	运动课、语言课、DIY活动、阅读活动

外,其他历史文化也是六安市图书馆的推广内容,图书馆举办过庐剧班、葫芦烙画分享沙龙、篆刻艺术鉴赏活动等。

③兴趣爱好。六安市图书馆举办的兴趣爱好类活动一般有固定的开展对象。如国风妆发体验、手机拍大片等活动主要吸引青年读者参与,而萨克斯班、葫芦丝班等则主要吸引中老年读者参与。

④健康健身。健康健身类活动既介绍中医养生知识,也教授健身技巧、运动技能,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⑤教育培训。教育培训类活动以职业技巧和家庭教育培训为主,其他类型的培训为辅。商务礼仪课和家庭教育公开课是图书馆的常驻教育培训类活动,兼顾了成年人职业技能需求和家庭经营技巧的需求。

⑥弱势群体支持。弱势群体支持类活动主要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开展。上文提到的葫芦丝班、民族舞班和萨克斯班等都是主要面向老年人开展的“常春藤”系列活动。六安市图书馆面向视障人士举办过“阅读的方式不止一种”盲人节特别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盲文阅读、听书、无障碍电影等,视障读者从触觉、听觉的角度受到文化的滋养。此外,六安市图书馆在金寨县和霍邱县具有较多留守儿童的地建设运营了3家映山红书屋,通过开办图书流动站、优质图书下乡等方式帮助留守儿童接触到更多图书,培养孩子们的阅读技能和习惯。

面向未成年人的读者活动主要分为阅读类、休闲娱乐类、学业辅导类和亲子类,旨在培养小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提升小读者的学习能力,开阔他们的眼界。家长与小朋友能共同参加的活动不只局限于亲子类活动,六安市图书馆鼓励大小读者携手积极参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活动,这既有利于亲子感情的培养、家庭关系的巩固,也有利于家长之间分享育儿经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安市图书馆鼓励读者成为各个活动的主导者,分别面向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招募志愿者,进行培训后使其成为阅读分享会、儿童绘本阅读会的主持人。截至2021年底,六安市图书馆志愿者数量已达到了468人,总服务人次达1 111人,总服务时长达6 666小时,读者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图书馆活动既能够使他们熟悉图书馆工作流程、培养对图书馆的热爱,也有利于图书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

(4) 分馆建设

金马社区分馆、中央公园分馆以及东苑社区分馆是由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规划建立的三家六安市图书馆分馆,分馆定位为社区阅读空间。三家阅读空间的读者服务政策与总馆一致,除免费阅读、手机扫码借阅以外,还做到了通借通还、线上免押金办证等便民服务,并且支持读者线上下单。总馆将图书馆服务

免费配送至分馆,方便不便到馆的居民也能享受到图书馆的优质资源和服务。

2021年10月份,金马社区分馆所在社区荣获安徽省唯一一家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的全国“书香社区”称号。金马社区分馆馆藏文献7 000余册,由于楼上是社区科普馆,因此特别增加了自然科学类图书,利用丰富的科普资源开展读者活动,定期举办绘本阅读活动、科学仪器体验活动等,建成了“爱科学,乐体验”特色活动品牌。该分馆还与皖西学院建立了大学生专业志愿者团队,大学生们成为各类儿童活动的小老师^[16]。六安市图书馆总馆与三家分馆通力合作,营造了浓厚的书香氛围,为六安市居民的社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并使得居民们的文化水平和志趣得到了提升。

4 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优势分析

4.1 社会力量承接运营工作,推进公共图书馆发展

六安市政府引入社会力量对六安市图书馆进行全馆型委托运营,从各方面提升了六安市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六安市图书馆建成初期,六安市政府便考虑到编制缺乏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因此决定将六安市图书馆的工程项目和运营管理工作交由社会力量来完成。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准备阶段能够利用场馆设计承包商和委托运营承包商的一致性,做到场馆设计精准对接运营需求。在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施行阶段,由于场馆设计工作与委托运营工作都交由企业方负责,因此企业方可以与政府方交流协作,预先制定出委托运营方案,并结合场馆设计中的空间功能划分灵活调整运营内容和服务重点。而且,企业方负责六安市图书馆馆员的招聘和管理,缓解了六安市政府编制紧张的问题,所招馆员素质较高也扭转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人才不足的困境。

在服务上,六安市图书馆秉承以读者为中心的宗旨,实现办证、借还、书目检索和数字资源阅览的全流程自助。建立了居民服务“一卡通”,实现社会保障卡在六安市图书馆的一卡通行,居民持社保卡可线下借还图书、参加活动,线上可直接绑定微信公众号使用线上服务、浏览数字资源等。建立云平台、你选书我买单、微信客服等16个线上系统,将客流分析系统接

入安徽省文化云平台,检测服务效能,建立意见收集与反馈机制,以提升服务品质和读者体验。对图书馆的运营过程进行管理检查和数据分析,资源建设中心每周对排架情况进行检查,每月对读者利用文献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并形成报告,通过数据发现管理中心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一系列创新举措提升了六安市图书馆的服务水平,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门槛,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均等性和便捷性。

4.2 政府全程监督把控方向,企业确保运营效果

六安市图书馆虽然采用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但是也需要政府全程监督企业方以及把控图书馆发展方向。在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建设的准备阶段,也就是六安市图书馆场馆设计装修的时期,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派出负责人全程参与装修工程监理以及跟踪审计。这一负责制度,不仅能够控制工程质量,而且能够监督承包商在装修过程中将六安市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中。在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施行阶段,六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成立了六安市图书馆运营管理中心,承担六安市图书馆运营审核和年度绩效考核的工作,制定以及细化年度考核标准和实施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服务费挂钩,从而做到跟踪监管企业方提供服务的全过程,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保证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的顺利运行。

政府将责任理念、合作理念、契约理念融入与社会力量的合作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了细化操作流程,完善配套政策,并对公共服务进行量化测评。企业方则通过设立运营馆长和运营副馆长跨部兼职的方式保障运营效率,使得运营服务是一项具有专门做法、专门机制、专门技术和专门手段的专业化工作^[17],从而确保运营过程中的服务效果与活动质量。

4.3 充分调用企业掌握资源,丰富资源建设活动开展

多元文化活动的开展是公共图书馆活力的体现,“服务活动化”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整体运营的优势之一。六安市图书馆选择皖新传媒成为总承包团队的一大原因是皖新传媒作为出版发行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为开展公共文化产业服务组建专业图书馆运营团队,另一方面拥有大量优质的图书资源以及作者专家资源,不仅能够为六安市图书馆的运营管理、文献资源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且能够邀请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莅临六安市图书馆举行文化

讲座、读者见面会及新书介绍会等活动,例如“皋城公开课”活动,先后邀请过王余光、徐雁、王立新、法医秦明、马伯庸、曹文轩等全国知名的学者作家来到六安市图书馆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六安市图书馆通过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充分调用了总承包商所掌握的人力、物力资源,大大丰富了资源建设和活动开展。在运营过程中以读者需求为导向,打破图书馆现有资源的局限,根据读者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设计活动,内容包括阅读、运动、养身、音乐、游戏等,不仅丰富了读者的业余生活,而且引导了读者培养新的志趣。

4.4 分馆建设提升读者到馆率,健全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公共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的第四大优势,是政府能够与引入的社会力量合作迅速推进总分馆的建设,从而提高读者到馆率并且健全当地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六安市图书馆现有的功能虽已能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需求,但是考虑到部分读者存在到馆困难、时间不充裕等问题,六安市图书馆在运营走上正轨后又建设了3所面向社区的分馆。其中中央公园阅读空间、金马社区阅读空间和东苑社区阅读空间由六安市图书馆采用总分馆模式进行管理,使得管理更为协调统一。为促进六安市图书馆的服务能够辐射至基层社区,每个阅读空间都有相应的建设要求,如中央公园阅读空间要求打造“文化+公园”的模式,金马社区阅

读空间和东苑社区阅读空间要求探索关爱未成年人的新举措。皖新传媒作为六安市图书馆全馆型委托运营的总承包商,不仅掌握了六安市图书馆的完备信息,而且了解六安市各类文化设施的建设情况,因而也成为六安市图书馆分馆建设的承接商。

皖新传媒凭借运营六安市图书馆总馆的经验,在充分掌握六安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向分馆输送经费、图书资源和人力资源,确保其服务有质有量地开展。三个分馆布局合理,管理统一,资源共享,满足了不同社区、各类型读者的需求,使得更多读者能享受到六安市图书馆的服务,扩大了六安市图书馆服务的辐射范围。

5 结语

六安市政府通过引入大型国有企业承担六安市图书馆的整体运营管理工作,充分利用及发挥了政府与社会力量所拥有的资源和作用,使得双方在六安市图书馆的前期场馆设计装修中,以及后期的委托运营过程中通力合作,达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形成了可供推广的全馆型委托运营模式。该模式不仅保证了六安市图书馆服务的专业性和公益性,而且一并提升了六安市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在丰富六安市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做到了惠及其下属城镇居民,推动了六安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郭华,葛琳琳,易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8,27(1):40-47.
- [2]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EB/OL].[2022-02-21].<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3/5620456/files/d8b05fe78e7442b8b5ee94133417b984.pdf>.
- [3] 汪圣.流失与重塑: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问题研究[J].图书馆,2021(9):1-6.
- [4] 胡安琪.公共图书馆服务政社合作供给三维法权互动风险及配置路径[J].图书馆建设,2021(6):81-92.
- [5] 易斌,彭红梅,曾宏宇.政府购买区级公共图书馆运营服务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22(2):26-31.
- [6] 王平,张彤坤,闫朝霞.欠发达地区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社会合作的融合路径: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田野调查个案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8,27(5):77-88.
- [7] 李娜娜,肖先沛.社会力量参与城市阅读空间品牌化研究:以郑州市高新区为例[J].图书馆,2021(8):57-63.
- [8] 李保东.粤港澳大湾区的“图书馆之城”建设[J].图书馆论坛,2022,41(4):1-10.
- [9] 李斯,李阳,陈一.面向用户碎片时间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分馆服务模式研究[J].图书与情报,2021,201(3):113-120.
- [10] 严贝妮,程诗瑶,李永钢.城市阅读空间的构建研究:基于合肥市“悦·书房”的解析[J].图书馆建设,2018(5):64-69.

- [11] 六安市人民政府.“六安市家庭教育公开课”启动仪式暨六安市图书馆开馆一周年活动成功举行[EB/OL].[2022-02-21].
<https://www.luan.gov.cn/public/6608171/9112571.html>.
- [12] 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政府.市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探索委托运营新模式,打造六安文化新地标[EB/OL].[2022-02-21].
<http://www.ja.gov.cn/public/6596411/19415961.html>.
- [13] 六安市图书馆.六安市图书馆年报(2020)[EB/OL].[2022-02-21].
<http://www.lalib.cn/>.
- [14] 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六安市图书馆首批图书方案编制及采购配送实施单一来源采购的公示[EB/OL].[2022-02-21].
<http://www.luan.gov.cn/public/6608481/7240921.html>.
- [15] 六安市人民政府.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2021年市图书馆年度图书采购项目[EB/OL].[2022-02-21].
<http://www.luan.gov.cn/public/6608171/9790592.html>.
- [16] 六安市图书馆.好礼相送!安徽省唯一!金马社区荣获全国“书香社区”称号[EB/OL].[2022-02-21].
https://mp.weixin.qq.com/s/wjkHaHXTxx4w0shx1_yWyg.
- [17] 陈红.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障碍与未来方向[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10):4-8.

作者简介: 严贝妮,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管理与服务;张子琚,安徽大学管理学院21级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刘亚东,六安市图书馆运营副馆长兼资源建设与参考咨询部经理,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 2022-05-20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第14页)

- [17] LIZARDO O.The Cognitive Origins of Bourdieu's Habitus[J].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04,34(4):375-401.
- [18] WACQUANT L.Symbolic Power and Group-making: On Pierre Bourdieu's Reframing of Class[J].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2013,13(2):274-291.
- [19] NOLTEMEYER A,BUSH K,PATTON J,et al.The Relationship among DeficiencyNeeds and Growth Need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aslow's Theory[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2,34(9):1862-1867.
- [20] 利奇文化与交流[M].卢德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12-14.
- [21] HEISE D R.Employing Nominal Variables,Induced Variables,and Block Variables in Path Analyses[J].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1972,1(2):147-173.
- [22] STENING B W,HAMMER M R.Cultural Baggage and the Adaption of Expatriate American and Japanese Managers[J].MIR: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92,32(1):77-89.
- [23] FORSELL T,TOWER J,POLMAN R.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Social Capital in Recreation and Sport Clubs[J].Leisure Sciences,2020,42(1):106-122.
- [24] SUNDARARAJAN L.Strong-ties and Weak-ties Rationalities:Toward an Expanded Network Theory[J].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20,24(2):134-143.
- [25] UPRIGHT C B.Social Capital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Spousal Influences on Attendance at Arts Events[J].Poetics,2004,32(2):129-143.

作者简介: 魏勇,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与政策创新;燕婷婷,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

收稿日期: 2022-01-06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改进 DEMATEL 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武文丽

(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山西忻州 034099)

摘要: 在大数据环境下, 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提升对于科学数据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 文章尝试引入改进的DEMATEL方法来识别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 以此更好地发挥和实现科学数据的最大价值。首先, 利用文献检索法和问卷调查法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 并构建一套较为合理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体系; 然后, 同时利用三角模糊数和DEMATEL理论的优点,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一种改进的DEMATEL方法; 最后, 利用改进的DEMATEL方法深入分析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并以此来识别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教育培训、技术平台和素养氛围是影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原因因素, 态度表现、惩罚制度和考核机制是影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结果因素。

关键词: 科学数据; 数据素养; 影响因素; 三角模糊数; DEMATEL

中图分类号: G251.6; G250.23

文献标识码: A

Identification of Key Influences on Data Literac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Improved DEMATEL

Abstract As we are in a big-data world, the data literacy of research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scientific dat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an improved DEMATEL method to identify the key influences on the data literacy of researchers as a way to better utilize and realize the maximum value of scientific data. First, the authors used literature 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ata literacy among researchers. The author also provides a reasonable system as a result. Then, the authors improved the DEMATEL method by exploiting the strengths of both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and the original DEMATEL theory. Finally, the article uses the improved DEMATEL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ata literacy among researchers and use them to identify the key influences. Research shows tha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literacy climate are the causal factors. Attitudinal performance, penalty systems, and appraisal mechanisms are outcome factors.

Key words scientific data; data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s;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DEMATEL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 大数据时代迎面而来。在大数据时代来临的同时, 数据成为驱动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兴指标, 也成为科研人员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1]。在此背景之下, 一个以数据为核心的

新型科研范式应运而生。新型科研范式的产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多源异构数据的支撑, 二是数据价值实现的保障^[2]。学术界一般将数据价值实现的保障称为数据素养, 并认为数据素养是信息素养内涵的最佳延伸和表达^[3]。然而, 新型科研范式下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科研人员数据素质的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鉴于此, 本文尝试对科

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识别问题进行研究,以期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提升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目前,关于数据素养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Shaffer等人^[4]依据科学素养技能测试探讨大学生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专业成绩、年级、能力和培训教育是大学生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Guenther等人^[5]对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承诺有利于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Naveed等人^[6]选取巴基斯坦科研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年龄、性别、学历和学术水平等会影响数据素养的高低。梁宇等人^[7]基于扎根理论分析高校博士生数据素养影响因素,并归纳出博士生数据素养影响因素的3个维度,即博士生主体维度、数据维度和数据环境维度。毕达天等人^[8]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科研人员数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素养氛围、技术平台和教育培训显著影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孙玉伟等人^[9]针对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数据素养问题展开研究,并得出数据使用动机、机会和能力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综合来看,上述成果大多是聚焦于数据素养影响因素的分类研究,尚未有文献探讨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更未有文献探讨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识别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汲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一种改进的DEMATEL(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方法来探讨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并以此识别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首先,利用文献检索法和问卷调查法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并构建一套较为合理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体系;然后,同时利用三角模糊数和DEMATEL理论的优点,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一种改进的DEMATEL方法;最后,利用改进的DEMATEL方法深入分析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并以此识别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

2 影响因素体系的构建

首先,利用文献检索法进行影响因素的客观筛选,具体过程如下。

(1)选取中国知网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和Web of Science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为检索平台,并同时以“数据素养”和“影响因素”为主题,对近5年文献进行检索,结果分别检索到CSSCI文献14篇和SSCI文献75篇;

(2)通过人工筛选,删除与关键词不相符的文献,结果分别剩余CSSCI文献9篇和SSCI文献31篇;(3)通过人工阅读上述筛选出文献的题目、摘要和正文,进一步归纳和总结12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即年龄、性别、学历、专业、学术水平、使用动机、教育培训、技术平台、素养氛围、态度表现、惩罚制度和考核机制。

然后,利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影响因素的主观筛选,具体过程如下。

(1)依据上述12种影响因素的评分设计调查问卷,该问卷总共由12个问题构成,其中每个问题分别对应某种因素的评分,评分的选项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分数越高则代表该因素影响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2)利用问卷星将该调查问卷发放给30位高校教师和20位研究所工作者,并收集到答题完整的46份调查问卷作为有效问卷;(3)将46份有效问卷中各因素影响程度评分进行集结,取定该评分的算术平均数作为该因素的影响程度综合得分(各因素的综合得分依次为2.5、1.2、2.7、1.8、2.8、2.9、3.2、3.8、4.2、3.9、4.1、3.7);(4)将综合得分小于3的6种影响因素(即年龄、性别、学历、专业、学术水平和使用动机)删除,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剩余的6种影响因素。

最后,归纳和总结剩余的6种影响因素。将教育培训、技术平台、素养氛围、态度表现、惩罚制度和考核机制构成本文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体系。下面针对上述6种影响因素,给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1)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是指科研人员通过接受专业的教育方式来提高科学数据素养。Shaffer等人^[4]认为,当科研人员接受到一定的教育培训后,其会更加重视科学数据在学术研究中的宝贵价值,进而在数据处理方面的意识有明显提升。毕达天等人^[8]发现,教育培训会影响科研人员对待数据处理的主观态度,并且会有效地加强和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

(2)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是指科研人员得到的与

科学数据素养相关的技术支撑。例如,科研人员能够方便地利用、处理和共享科学数据平台,以及能够方便地解决科学数据可持续使用、安全保护等问题。Naveed等人^[6]认为,当技术平台水平较高时,科研人员能够更为方便地接触和利用科学数据,进而能够有效地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毕达天等人^[8]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的技术平台会使得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偏低。

(3) 素养氛围。素养氛围是指科研人员所在单位或相关研究领域具有的数据素养状态。梁宇等人^[7]在研究中指出,当素养氛围较好时,科研人员会对科学数据素养产生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也与态度习得理论中的经典性条件作用相对应。孙玉伟等人^[9]的探索性研究表明,积极的素养氛围能够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这也与动机理论相吻合。Tsai等人^[10]的研究指出,素养氛围与科研人员数据素养显著相关。

(4) 态度表现。态度表现是指科研人员对待科学数据素养的个人风格和主观倾向。潘士美等人^[11]的研究表明,态度表现是科研人员科学数据素养发生变化的内在驱动力。毕达天等人^[8]的研究指出,态度表现是科研人员科学数据素养发生变化的内在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培训、技术平台和素养氛围等外在因素会使得科研人员态度表现发生变化。

(5) 惩罚制度。惩罚制度是指科研人员工作单位针对数据素养水平低给予的相关章程和准则。郝媛玲等人^[12]的研究表明,惩罚制度会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提升起到调节功能和监督作用。张路路等人^[13]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进行评述,并认为惩罚制度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驱动因素,而且惩罚制度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

(6) 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指科研人员工作单位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检验方式和测试手段。张路路等人^[13]的研究显示,当科研人员工作单位或相关研究领域的考核机制比较严格时,科研人员数据素养水平一般偏高,反之则偏低。孙玉伟等人^[9]的研究表明,考核机制的严格实施不允许科研人员有机会使得其数据素养偏低,反而会促进科研人员提升数据素养水平。毕达天等人^[8]的研究表明,考核机制与科研人员数据素养显著相关。

3 方法与模型

3.1 三角模糊数

模糊数是模糊数学的理论基础,能够为处理不确定性决策问题提供方法手段和技术支撑^[14]。三角模糊数是一类特殊的模糊数,其能够较好地描述人类思维,以及能够有效地处理模糊信息,尤其适用于处理语言信息环境下的不确定性决策问题^[15]。下面给出三角模糊数的相关定义。

若模糊数 A 的隶属函数为:

$$\mu_A(x) = \begin{cases} \mu_A^L(x), & x \in [a, b] \\ 0, & x \notin [a, d] \\ \mu_A^R(x), & x \in [b, d] \end{cases} \quad (1)$$

其中 $\mu_A^L(x): x \in [a, b] \rightarrow [0, 1]$, 连续且严格递增; $\mu_A^R(x): x \in [b, d] \rightarrow [0, 1]$, 连续且严格递减; $a < b < d$ 且 $a, b, d \in \mathbf{R}$ 。特别地, 当 $\mu_A(x)$ 的表达式为:

$$\mu_A(x) = \begin{cases} \frac{1}{b-a}x - \frac{a}{b-a}, & x \in [a, b] \\ 0, & x \notin [a, d] \\ \frac{1}{b-a}x - \frac{d}{b-a}, & x \in [b, d] \end{cases} \quad (2)$$

则称 A 为三角模糊数^[16]。三角模糊数通常可记为 $A = (a, b, d)$, 其中 a 为取值下限, d 为可能取值, b 为取值上限。

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相关定义,下面进一步给出三角模糊数的运算法则。

设 $\tilde{x} = (x^L, x^M, x^U)$ 和 $\tilde{y} = (y^L, y^M, y^U)$ 为任意2个三角模糊数, $\lambda \geq 0$, 则满足如下运算法则^[16]:

- (1) $\tilde{x} \oplus \tilde{y} = (x^L + y^L, x^M + y^M, x^U + y^U)$;
- (2) $\tilde{x} \otimes \tilde{y} = (x^L y^L, x^M y^M, x^U y^U)$;
- (3) $\lambda \otimes \tilde{x} = (\lambda x^L, \lambda x^M, \lambda x^U)$;
- (4) $(\tilde{x})^\lambda = ((x^L)^\lambda, (x^M)^\lambda, (x^U)^\lambda)$ 。

3.2 DEMATEL 方法

DEMATEL法是由美国Gabus和Fontela两位教授于1971年在日内瓦Battelle会议上提出的。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先由相关领域专家对复杂系统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评估,再通过矩阵论计算各因素的原因度和结果度,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复杂系统因素的因果关系图,最后识别出复杂系统的关键影响因素^[17]。近年来,DEMATEL方法在供应链管理^[18]、医疗设备管理^[19]、科研数据共享^[20]、社交网络信息管理^[21]

和电子商务管理^[22]等实际问题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DEMATEL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方法的基本步骤如下^[23-24]。

(1) 构造直接影响矩阵。假设某专家针对复杂系统中因素 \bar{F}_i 影响因素 \bar{F}_j 程度的评分为 \bar{x}_{ij} ，则构造的直接影响矩阵为 $\bar{X} = (\bar{x}_{ij})_{n \times n}$ 。需要指出的是，矩阵 \bar{X} 中的元素 \bar{x}_{ij} 均使用精确数来刻画。

(2) 计算规范化影响矩阵。规范化影响矩阵 $\bar{G} = (\bar{g}_{ij})_{n \times n}$ 的计算式为：

$$\bar{G} = \bar{X} / \max_i \sum_{j=1}^n \bar{x}_{ij} \quad (3)$$

(3)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bar{T} = (\bar{t}_{ij})_{n \times n}$ 的计算式为：

$$\bar{T} = \lim_{h \rightarrow +\infty} (\bar{G} + \bar{G}^2 + \dots + \bar{G}^h) = \bar{G}(\mathbf{I} - \bar{G})^{-1} \quad (4)$$

其中 \mathbf{I} 为主对角线上元素均为1且其余元素均为0的单位矩阵。

(4)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因素 \bar{F}_i 的影响度 \bar{c}_i 为矩阵 \bar{T} 中第 i 行元素之和，被影响度 \bar{d}_i 为矩阵 \bar{T} 中第 i 列元素之和，即：

$$\begin{cases} \bar{c}_i = \sum_{k=1}^n \bar{t}_{ik} \\ \bar{d}_i = \sum_{k=1}^n \bar{t}_{ki} \end{cases} \quad (5)$$

其中影响度 \bar{c}_i 表征为因素 \bar{F}_i 对其余所有因素的影响之和，被影响度 \bar{d}_i 表征为因素 \bar{F}_i 受到其余所有因素的影响之和。

(5) 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因素 \bar{F}_i 的中心度 \bar{p}_i 为影响度 \bar{c}_i 与被影响度 \bar{d}_i 之和，原因度 \bar{q}_i 为影响度 \bar{c}_i 与被影响度 \bar{d}_i 之差，即：

$$\begin{cases} \bar{p}_i = \bar{c}_i + \bar{d}_i \\ \bar{q}_i = \bar{c}_i - \bar{d}_i \end{cases} \quad (6)$$

其中因素 \bar{F}_i 的中心度 \bar{p}_i 能够反映该因素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因素 \bar{F}_i 的原因度 \bar{q}_i 能够反映复杂系统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若 $\bar{q}_i > 0$ ，则因素 \bar{F}_i 为原因因素，否则为结果因素）。

上述传统DEMATEL方法能够深入分析复杂系统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并识别出关键影响因素，但其未能够考虑决策者语言偏好信息的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难以保证决策结果的可靠性。

3.3 改进的 DEMATEL 方法

考虑到三角模糊数能够较处理好语言信息，以及DEMATEL方法能够有效识别出复杂系统的关键影响因素。Wu和Lee^[25]同时利用三角模糊数和DEMATEL理论的优点，给出改进的DEMATEL方法。本文尝试利用改进的DEMATEL方法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此识别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下面给出改进的DEMATEL方法的基本步骤。

(1) 构造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假设某专家针对复杂系统中因素 F_i 影响因素 F_j 程度的评分为 x_{ij} ，则构造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为 $\mathbf{X} = (x_{ij})_{n \times n}$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DEMATEL方法的直接影响矩阵 \bar{X} 中元素 \bar{x}_{ij} 均为精确数，而本文研究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mathbf{X} 中元素 x_{ij} 均为三角模糊数。表1给出语言信息与三角模糊数之间的转化关系^[16]。

表 1 语言信息转化为模糊数的对应关系

语言信息	模糊数
无影响	(0,0.1,0.3)
影响很弱	(0.1,0.3,0.5)
影响弱	(0.3,0.5,0.7)
影响强	(0.5,0.7,0.9)
影响很强	(0.7,0.9,1)

(2) 计算规范化影响矩阵。首先，依据三角模糊数期望函数将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mathbf{X} = (x_{ij})_{n \times n}$ 转化为基于精确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mathbf{X}' = (x'_{ij})_{n \times n}$ ，计算式为：

$$x'_{ij} = ((1-\gamma)x_{ij}^L + x_{ij}^M + \gamma x_{ij}^U) / 2 \quad (7)$$

其中 $x_{ij}^L, x_{ij}^M, x_{ij}^U$ 分别为三角模糊数 x_{ij} 的取值下限、可能取值和取值上限， γ 为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参数，当 $0 < \gamma < 0.5$ 时，表示决策者持悲观态度；当 $0.5 < \gamma < 1$ 时，表示决策者持乐观态度；当 $\gamma = 0.5$ 时，表示决策者持中立态度^[16]。然后，将基于精确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mathbf{X}' = (x'_{ij})_{n \times n}$ 进行规范化处理，计算式为：

$$\mathbf{G} = (\mathbf{X}' - \min_j x'_{ij}) / \max_i \sum_{j=1}^n (x'_{ij} - \min_j x'_{ij}) \quad (8)$$

最后，将矩阵 \mathbf{G} 视为本文研究的规范化影响矩阵。

(3)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综合影响矩阵 $T = (t_{ij})_{n \times n}$ 的计算式为:

$$T = \lim_{h \rightarrow +\infty} (G + G^2 + \cdots + G^h) = G(I - G)^{-1} \quad (9)$$

同样地, I 为主对角线上元素均为1且其余元素均为0的单位矩阵。

(4)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因素 F_i 的影响度 c_i 为矩阵 T 中第 i 行元素之和, 被影响度 d_i 为矩阵 T 中第 i 列元素之和, 即:

$$\begin{cases} c_i = \sum_{k=1}^n t_{ik} \\ d_i = \sum_{k=1}^n t_{ki} \end{cases} \quad (10)$$

类似地, 影响度 c_i 表征为因素 F_i 对其余所有元素的影响之和, 被影响度 d_i 表征为因素 F_i 受到其余所有元素的影响之和。

(5) 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因素 F_i 的中心度 p_i 为影响度 c_i 与被影响度 d_i 之和, 原因度 q_i 为影响度 c_i 与被影响度 d_i 之差, 即:

$$\begin{cases} p_i = c_i + d_i \\ q_i = c_i - d_i \end{cases} \quad (11)$$

类似地, 因素 F_i 的中心度 p_i 能够反映该因素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相对重要程度, 因素 F_i 的原因度 q_i 能够反映复杂系统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若 $q_i > 0$, 则因素 F_i 为原因因素, 否则为结果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 与传统DEMATEL方法相比, 改进的DEMATEL方法能够考虑决策者语言偏好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进而能够更为贴切地描述决策者的真实评估信息, 最终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决策者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因此, 改进的DEMATEL方法比传统DEMATEL方法相对更为可靠。

4 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

4.1 计算过程

下面利用改进的DEMATEL方法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计算过程如下。

(1) 构建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首先, 邀请10位大学教师和10位研究所工作者对6种影响因素[教育培训 (F_1)、技术平台 (F_2)、素养氛围 (F_3)、态度表现 (F_4)、惩罚制度 (F_5) 和考核机制 (F_6)]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评估, 在此基础上, 依据表1得到20位专家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限于篇幅, 该结果省略。然后, 利用算术平均数将20位专家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进行集结, 以此得到群体综合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结果如表2所示。最后, 将群体综合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视为本文研究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2) 计算规范化影响矩阵。本文研究假设决策者持中立态度 (既不乐观也不悲观), 即取定 $\gamma = 0.5$, 在此基础上, 依据式 (7) 和式 (8) 计算规范化影响矩阵,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规范化影响矩阵

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1	0.000 0	0.017 4	0.057 6	0.075 9	0.042 8	0.038 9
F_2	0.025 4	0.000 0	0.059 7	0.059 7	0.037 0	0.019 2
F_3	0.035 0	0.019 2	0.000 0	0.037 0	0.075 9	0.058 6
F_4	0.024 5	0.022 2	0.037 0	0.000 0	0.019 2	0.017 3
F_5	0.040 9	0.017 3	0.021 1	0.018 2	0.000 0	0.001 9
F_6	0.019 3	0.020 2	0.023 3	0.050 6	0.007 8	0.000 0

(3)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依据式 (9) 计算综合

表2 群体综合的基于三角模糊数的直接影响矩阵

因素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F_1	(0.000,0.100,0.300)	(0.100,0.290,0.490)	(0.480,0.680,0.880)	(0.880,0.880,0.985)	(0.345,0.540,0.725)	(0.300,0.500,0.700)
F_2	(0.170,0.370,0.570)	(0.000,0.100,0.300)	(0.500,0.700,0.900)	(0.500,0.700,0.900)	(0.285,0.480,0.680)	(0.110,0.310,0.510)
F_3	(0.270,0.460,0.660)	(0.110,0.310,0.510)	(0.000,0.100,0.300)	(0.285,0.480,0.680)	(0.680,0.880,0.985)	(0.490,0.690,0.890)
F_4	(0.165,0.360,0.560)	(0.140,0.340,0.535)	(0.285,0.480,0.680)	(0.000,0.100,0.300)	(0.110,0.310,0.510)	(0.095,0.290,0.490)
F_5	(0.320,0.520,0.715)	(0.095,0.290,0.490)	(0.130,0.330,0.525)	(0.100,0.300,0.500)	(0.000,0.100,0.300)	(0.015,0.120,0.320)
F_6	(0.115,0.310,0.510)	(0.120,0.320,0.520)	(0.210,0.340,0.510)	(0.455,0.620,0.755)	(0.065,0.180,0.375)	(0.000,0.100,0.300)

影响矩阵,结果如表4所示。

表 4 综合影响矩阵

因素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F ₅	F ₆
F ₁	0.007 8	0.022 4	0.064 6	0.083 4	0.050 8	0.045 0
F ₂	0.031 8	0.004 6	0.065 8	0.066 9	0.045 0	0.025 6
F ₃	0.041 6	0.023 8	0.008 7	0.046 5	0.080 6	0.062 2
F ₄	0.028 2	0.024 5	0.041 3	0.006 7	0.024 7	0.021 4
F ₅	0.043 2	0.019 2	0.025 9	0.023 9	0.005 0	0.005 9
F ₆	0.022 9	0.022 7	0.028 4	0.055 2	0.012 8	0.004 0

(4)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依据式 (10) 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

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F ₁	0.274 0	0.175 4	0.449 4	0.098 6
F ₂	0.239 7	0.117 2	0.356 9	0.122 6
F ₃	0.263 2	0.234 7	0.498 0	0.028 5
F ₄	0.146 8	0.282 5	0.429 3	-0.135 8
F ₅	0.123 2	0.219 0	0.342 2	-0.095 8
F ₆	0.146 0	0.164 1	0.310 0	-0.018 1

(5) 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依据式 (11) 计算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结果如表5所示,并进一步构建复杂系统因素的因果关系图,结果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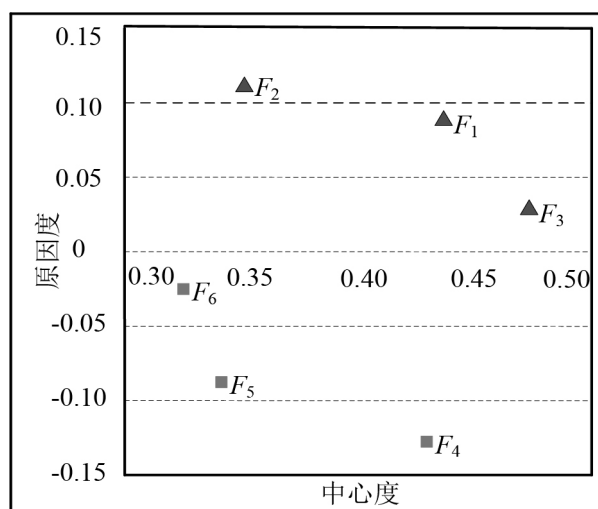


图 1 因果关系图

4.2 结果分析

依据上述计算结果,下面对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

因度进行分析。

一方面,中心度分析。影响因素的中心度能够较好地表征该因素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相对重要程度,若某因素的中心度越大,则表明该因素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直接影响力越大。由表5和图1可知,按照中心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将各影响因素排列为:素养氛围(F₃)>教育培训(F₁)>态度表现(F₄)>技术平台(F₂)>惩罚制度(F₅)>考核机制(F₆),其中素养氛围(F₃)、教育培训(F₁)和态度表现(F₄)的中心度分别为0.498 0、0.449 4、0.429 3,该类因素的中心度比较大,且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说明该类因素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显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①当素养氛围较好时,科研人员会受到周围良好氛围的影响,进而使得其对科学数据素养产生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最终使得数据素养得到改善;②当科研人员接受到较好的教育培训后,其会更加地重视科学数据的宝贵价值,以及在处理科学数据的能力上有显著提升,因此科研人员数据素养会得到明显提升;③当科研人员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科学数据素养时,根据动机理论,其会增加提升数据素养的动机,进而实现数据素养的提升。由此可见,与其他因素相比,素养氛围(F₃)、教育培训(F₁)和态度表现(F₄)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大。值得一提的是,Shaffer等人^[4]和毕达天等人^[8]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这说明本文研究是较为合理的。

另一方面,原因度分析。影响因素的原因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系统因素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原因度大于0的因素属于原因因素,且若该因素的原因度越大,则表明该因素越能够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原因度小于0的因素属于结果因素,且若该因素的原因度越小,则表明该因素越能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由表5和图1可知,按照原因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将各原因因素排列为:技术平台(F₂)>教育培训(F₁)>素养氛围(F₃),其中技术平台(F₂)和教育培训(F₁)的原因度分别为0.122 6、0.098 6,该类原因因素的原因度非常大,说明其能够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其他因素产生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平台(F₂)和教育培训(F₁)的影响度均相对较大(值分别为0.239 7、0.274 0)、被影响度均相对较小(值分别为0.117 2、0.175 4)。由此可见,技术平台(F₂)和教育培训(F₁)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值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培训(F_1)也属于原因因素,而且该原因因素的中心度非常大(值为0.449 4)。因此,教育培训(F_1)也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另外,按照原因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将各结果因素排列为:考核机制(F_6)>惩罚制度(F_5)>态度表现(F_4),其中惩罚制度(F_5)和态度表现(F_4)的原因度非常小(值分别为-0.095 8、-0.135 8),这说明其能够受到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其他因素的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类结果因素的影响度均相对较小(值分别为0.123 2、0.146 8)、被影响度均相对较大(值分别为0.219 0、0.282 5)。由此可见,惩罚制度(F_5)和态度表现(F_4)不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外,考核机制(F_6)的原因度虽然非常接近0(值为-0.018 1),但该因素的中心度非常小(值为0.310 0)。因此,考核机制(F_6)也不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教育培训(F_1)、技术平台(F_2)和素养氛围(F_3)是影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原因因素,同时也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态度表现(F_4)、惩罚制度(F_5)和考核机制(F_6)是影响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结果因素,而且不是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

4.3 方法对比

为了进一步验证改进DEMATEL方法的合理性,笔者也将传统DEMATEL方法应用于本文案例。需要指出的是,考虑本文研究是利用算术平均数对20位专家决策信息进行集结,因此这里也采用算术平均数对20位专家的基于精确数的DEMATEL矩阵进行集结。传统DEMATEL方法计算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各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传统DEMATEL方法)

因素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F_1	0.271 5	0.176 8	0.448 4	0.094 7
F_2	0.236 9	0.123 0	0.359 9	0.113 9
F_3	0.261 1	0.231 4	0.492 5	0.029 7
F_4	0.150 4	0.280 2	0.430 6	-0.129 8
F_5	0.126 4	0.218 4	0.344 8	-0.092 0
F_6	0.147 4	0.163 8	0.311 3	-0.016 4

通过将表5和表6进行深入对比后发现,本文提出的改进DEMATEL方法和传统DEMATEL方法所计算的中心度排序结果、原因因素和结果因素的分类结果均为一致,这进一步说明本文提出的改进DEMATEL方法是较为合理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计算的各因素中心度和原因度的具体数值是有所差异的。例如,技术平台(F_2)在本文方法中计算的原因度为0.122 6,而在传统方法中计算的原因度为0.113 9。这两种方法计算结果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文方法采用了三角模糊数来表征决策者的语言偏好信息,以及传统方法采用了精确数来表征决策者的语言偏好信息,而三角模糊数相较于精确数能够更好地描述语言偏好信息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使得最终的决策结果更为可靠。

4.4 对策建议

根据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管理者应该着重加强教育培训(F_1)、技术平台(F_2)和素养氛围(F_3)三个方面的投入,以此来针对性地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下面给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加强教育培训的支撑。高校、科研机构 and 科研型企业等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安排针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培训班或专业讲座。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帮助科研人员熟悉掌握处理数据的专业技能,进而有效地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能够影响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进而积极地改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

(2)加强技术平台的支撑。政府应该对数据公司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与照顾。政府部门管理者应该鼓励数据公司开发出高效便捷的软件,以此来为科研人员提供数据交流便利和数据共享便利等,进而能够使得科研人员在处理数据时得到较好的体验,最终来提升科研人员数据素养。

(3)加强素养氛围的支撑。科研工作部门应该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数据素养氛围。一方面,高学历人才通常掌握一些专业知识,其相对要更容易高效处理和分析数据,进而能够更好地提升数据素养;另一方面,良好的数据活动氛围能够积极地影响科研人员,进而使得科研人员能够自主地培养数据素养,最终实现数据素养的有效提升。因此,科研工作部门应该尽可能地招聘一些高学历人才,以及营造良好的数据活动氛围。

5 结语

目前,关于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内在因果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更未有研究探讨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识别问题。为此,本文引入一种改进的DEMATEL方法,以此来识别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关键影响因素,据此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提升提供对策建议。与已有的其他文献相比,本文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对现有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进行细致梳理,构建了一套较为合理的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体系,能够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借鉴;第二,同时利用三角模糊数和DEMATEL理论的优点,引入了一种改进的DEMATEL方法,能够提高传统DEMATEL方法决策结果的可靠性;第三,利用改进的DEMATEL方法对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之间

的内在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此识别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能够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的提升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采用了文献检索法、问卷调查法和改进的DEMATEL方法,该过程需要多个专家进行评分,这可能会使得决策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然而,本文研究的决策结果也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一方面,DEMATEL方法的决策机制比较健全,进而使得DEMATEL方法的决策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抽样较少带来的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现有关于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的文献还尚不多见,且该类文献大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使得本文研究具有较好的继承性和有效性。另外,未来还可以将改进的DEMATEL方法应用于诸如数据共享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图书馆绩效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生教育质量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等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 [1] 雷雨,吴超.安全数据素养的作用机制及其促进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9):192-197.
- [2] 高开欣,周科平,李桂梅.安全信息素养教育论纲:基本概念、元模型与研究范式[J].情报杂志,2021,40(1):189-195.
- [3] SHREINER T L.Visualizing the teaching of data visualizations in social studies:A study of teachers' data literacy practices, beliefs, and knowledge[J].Theory and Research in Social Education,2021,49(2):262-302.
- [4] SHAFFER J F,FERGUSON J,DENARO K.Use of the tes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skills reveals that fundamental literacy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scientific literacy[J].CBE Life Sciences Education,2019,18(3):1-21.
- [5] GUENTHER L,WEINGART P.A unique fingerprint?Factors influencing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uth Africa[J].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2016,112(7/8):129-132.
- [6] NAVEED M A,RAFIQUE F.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workplace:A case of scientists from Pakistan[J].Libri,2018,68(3):247-257.
- [7] 梁宇,郑易平.高校博士生数据素养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4):146-152.
- [8] 毕达天,曹冉.科研人员数据素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EM及fsQCA方法[J].情报学报,2021,40(1):11-20.
- [9] 孙玉伟,戚景琳,刘超,等.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数据复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MOA框架下的探索[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1,44(8):1-15.
- [10] TSAI C Y,LI Y Y,CHENG Y Y.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dult affective factors,engagement in science,and scientific competencies[J].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2017,67(1):30-47.
- [11] 潘士美,张裕灵,李玲.义务教育学生科学素养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来自PISA、TIMSS和NAEP的国际测评经验[J].外国教育研究,2018,45(10):76-87.
- [12] 郝媛玲,沈婷婷.高校文理科研究生数据素养比较[J].图书馆论坛,2016,36(8):126-132.
- [13] 张路路,张群,孔成果.基于用户视角的数据素养研究述评[J].图书情报知识,2018(1):114-121.
- [14] SUN K K,KARIMI H R,QIU J B.Finite-time fuzzy adaptive quantized output feedback control of triangular structural systems[J].Information Sciences,2021,557:153-169.

(下转第49页)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田一斐

(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山西忻州 034099)

摘要: 文章将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进行结合, 提出一种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 还可以消除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进而能够使得学术期刊的评价结果更为合理。文章选取33种信息与新闻出版学期刊和12项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一方面能够利用前景理论使得学术期刊各指标值更加客观, 另一方面还能够利用幂Heronian算子使得学术期刊综合评价值更加可靠, 使得学术期刊评价结果更为合理。

关键词: 前景理论; 幂算子; Heronian算子; 学术期刊; 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

文献标识码: A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cademic Journals Based on Prospect Theory and Power Heronian Operator

Abstract The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power Heronian operator are combined to evaluate academic journals, which is able to give a nove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academic journals based on the prospect theory and power Heronian operator. The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t not on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behavior of the decision expert, but also eliminat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abnormal indicator values and captu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cators. As a result,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academic journals can be more reliable. The article selects 33 information and journalism journals and 12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an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make the index values of academic journals more objective by using the prospect theory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possible to use the power Heronian operator to mak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academic journals more reliable. Therefor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academic journals can be more reasonable based on the method.

Key words prospect theory; power operator; Heronian operator; academic jour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1 引言

近十年来, 学术期刊评价问题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术期刊的排名, 其能够为科研人员投稿、图书馆工作人员订购杂志、科研部门人员制定核心期刊目录提供重要决策参考^[2]。从现有文献来看, 学术期刊评价经

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3]。起初, 众多学者定义了一些学术期刊评价的计量指标, 如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H指数等, 并利用单一指标评价法获得学术期刊的排名。后来, 一些学者提出将多属性综合评价法应用于学术期刊评价问题^[4]。考虑到多属性综合评价法能够包含多项指标的信息量, 其得到的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相对更为全面, 因此, 在学术期刊评价问题的后续研究中, 诸多学者都致力于探讨学术期刊多属性

综合评价方法。

目前,针对学术期刊多属性综合评价问题的研究,相关学者提出一些新的复合型指标和多属性综合评价模型。例如,N.Sombatsompop等人^[5]定义文章影响因子和位置影响因子等多项指标,并探讨这些指标与传统的期刊影响因子的区别。张慧玲等人^[6]定义一些新的CS系列指标,并将其应用于交叉性学科期刊的综合评价问题。结果表明,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评价效力。俞立平等^[7]对传统的H指数进行改进,给出一项改进的H指数,该指数适用于界定学术期刊时间范围的评价问题。丁佐奇等人^[8]探讨一项Plum X指标,并给出一些促进中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的管理启示。王磊^[9]将Altmetrics指标引入学术期刊综合评价问题,并探讨一种基于Altmetrics的国内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结果。赵蓉英等人^[10]从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共被引网络影响力3种视角出发,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学术期刊评价问题进行研究,并给出一种多维信息计量视角下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模型。张发明等人^[11]同样利用因子分析法的优点,并给出一种基于因子分析和诱导密度算子的学术期刊组合评价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得到较为稳定的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王伟明等人^[12-13]致力于学术期刊动态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提出基于最小偏差的学术期刊动态组合评价方法和双激励模型视角下的学术期刊动态综合评价方法。该类模型能够使得学术期刊评价结果更为全面,但计算过程较为繁琐。

综合来看,现有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能为学术期刊评价问题的后续研究提供决策参考,但上述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现有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尚未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而且尚未采用前景理论来探讨学术期刊评价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文献尚未同时考虑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指标之间的关联性,而且尚未采用幂Heronian算子来集结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事实上,第一,决策者在获得学术期刊的排名时,往往会规避将一些质量差的期刊排序靠前;第二,一些投机取巧的期刊往往会存在一些异常大的指标值;第三,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之间往往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为了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尝试探讨一种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

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本文方法的创新之处具体如下。第一,引入了前景理论来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其能够规避将一些质量差的期刊排序靠前。例如,避免科研人员选择质量差的期刊投稿,避免图书馆工作人员订购质量差的期刊,避免科研部门管理者将质量差的期刊认定为核心刊物。第二,引入了幂Heronian算子来消除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其能够使得学术期刊各评价指标值的集结更加可靠。例如,能够使得投机取巧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值更低,能够使得认真经营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值更高。

2 方法与模型

2.1 设计思路

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的设计思路是:首先,利用前景理论来分析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并给出考虑决策专家心理感知行为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然后,利用幂Heronian算子对考虑决策专家心理感知行为的学术期刊各评价指标值进行综合集结,在此基础上获得学术期刊的综合评价值;最后,对学术期刊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并获得学术期刊的排名。

2.2 前景理论

Kahneman等人^[14]首先提出前景理论的概念,其能够有效地考虑决策者的心理感知行为,并使得决策结果更为客观。前景理论认为当人们在处理风险性决策问题时,往往会存在“高估低概率事件,低估高概率事件”的心理。前景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能够解释许多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前景理论指出当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评估时,前景价值应该由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共同决定,其中价值函数反映对客观事物的实际评估情况,决策权重反映对感知偏差的心理评估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诸如科研人员投稿、图书馆工作人员订购期刊、科研部门管理者制定核心期刊目录等实际问题时,决策者往往会存在心理感知行为(对低概率事件过高估计,对高概率事件过低估计),即决策者的偏好是风险规避的。为此,本文利用前景理论来分析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以此来获得考虑决策专家心理感知行为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引入

前景理论来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其能够规避将一些质量差的期刊排序靠前。下面给出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前景值的计算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 确定前景价值函数 $v(x'_{ij})$ 。本文以算术平均数作为参考点,以此来确定前景价值函数。计算公式为

$$v(x'_{ij}) = \begin{cases} (x'_{ij} - \bar{x}'_{ij})^\alpha, & x'_{ij} \geq \bar{x}'_{ij} \\ -\lambda(x'_{ij} - \bar{x}'_{ij})^\beta, & x'_{ij} < \bar{x}'_{ij} \end{cases} \quad (1)$$

其中 x'_{ij} 为第 i 种学术期刊的第 j 项指标经过0-1标准化后的数据, α 和 β 为风险态度系数,且 $\alpha, \beta \in [0, 1]$, λ 为损失规避系数($\lambda > 1$ 表明损失敏感),通常可取定 $\alpha = \beta = 0.88, \lambda = 2.25$ ^[15-16]。

步骤2 确定前景决策权重 $\pi(p_j)$ 。计算公式为

$$\pi(p_j) = \begin{cases} \frac{p_j^\gamma}{(p_j^\gamma + (1-p_j)^\gamma)^{1/\gamma}}, & \text{收益} \\ \frac{p_j^\delta}{(p_j^\delta + (1-p_j)^\delta)^{1/\delta}}, & \text{损失} \end{cases} \quad (2)$$

其中 $\pi(p_j)$ 为相应的前景决策权重(当 $x'_{ij} \geq \bar{x}'_{ij}$ 时为收益,当 $x'_{ij} < \bar{x}'_{ij}$ 时为损失), γ 和 δ 为概率参数,通常可取定 $\gamma = 0.61, \delta = 0.69$ ^[15-16]。

步骤3 确定综合前景值 y_i 。计算公式为

$$y'_i = v(x'_{ij})\pi(p_j) \quad (3)$$

其中 y'_i 表示第 i 种学术期刊的第 j 项指标的综合前景值。

2.3 幂Heronian算子

在学术期刊综合评价问题中,一方面,部分学术期刊指标值会异常偏大或者异常偏小;另一方面,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之间往往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此时,若采用传统的指标信息集结方法,则会对综合评价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会对学术期刊的排名产生不利影响。为此,本文同时兼顾幂算子和Heronian算子的优点,利用幂Heronian算子对学术期刊各评价指标值进行综合集结。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利用幂Heronian算子来消除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其能够使得学术期刊综合前景值更加可靠。幂Heronian算子的计算公式为^[17-19]

$$y_i = \left[\frac{2}{m(m+1)} \sum_{j=1}^m \left(\left(\frac{m(1+T(y_{ij}))}{\sum_{i=1}^m (1+T(y_{ik}))} y_{ij} \right)^\phi \left(\frac{m(1+T(y_{ik}))}{\sum_{i=1}^m (1+T(y_{ik}))} y_{ik} \right)^\phi \right) \right]^{\frac{1}{\phi+1}} \quad (4)$$

其中 y_i 为第 i 种学术期刊的综合前景值,通常可取定 $\phi = \phi = 1$ ^[17-18],且 $T(y_{ij})$ 的计算式为

$$T(y_{ij}) = \sum_{k=1, k \neq j}^m \sup(y_{ij}, y_{ik}) = \sum_{k=1, k \neq j}^m (1 - |y_{ij} - y_{ik}|) \quad (5)$$

其中 $\sup(y_{ij}, y_{ik})$ 表示 y_{ij} 和 y_{ik} 的支撑度, y_{ij} 和 y_{ik} 分别为相应的学术期刊综合前景值经过0-1标准化后的数值。

3 结论与分析

3.1 指标选取和样本确定

依据2021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笔者选取了12项评价指标,即复合总被引、影响力指数、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web即年下载率、量效指数,上述12项评价指标能够从多种视角来综合考虑学术期刊的实际影响力和学术质量^[20]。另外,通过对数据的清洗,笔者删除了部分缺失数据的期刊,最终选取了33种信息与新闻出版学期刊为样本。

3.2 结果分析

为了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以及消除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先利用前景理论计算考虑决策专家心理感知行为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值,再利用幂Heronian算子确定学术期刊的综合前景值和排序,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编辑学报》的综合前景值为0.781 8,且排序位于第1。该期刊作为信息与新闻出版学领域的顶级权威期刊,其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新闻界》《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的综合前景值分别为0.753 3、0.734 1、0.725 3、0.715 1、0.698 9、0.677 6、0.655 8、0.614 6、0.603 2、0.603 1,排序分别

表1 学术期刊综合评价价值及排名

期刊名称	值	排序	期刊名称	值	排序	期刊名称	值	排序
编辑学报	0.781 8	1	科技与出版	0.578 1	12	中国记者	0.405 1	23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0.753 3	2	新闻爱好者	0.556 1	13	传媒评论	0.391 2	24
现代传播	0.734 1	3	中国出版	0.548 7	14	电视研究	0.383 2	25
新闻记者	0.725 3	4	新闻与写作	0.541 2	15	中国编辑	0.365 4	26
国际新闻界	0.715 1	5	出版科学	0.501 2	16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	0.362 1	27
新闻大学	0.698 9	6	出版广角	0.498 9	17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0.360 1	28
新闻与传播研究	0.677 6	7	新闻知识	0.467 7	18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0.358 8	29
当代传播	0.655 8	8	东南传播	0.453 4	19	新闻战线	0.349 8	30
新闻界	0.614 6	9	现代出版	0.432 1	20	青年记者	0.349 6	31
出版发行研究	0.603 2	10	今传媒	0.423 2	21	传媒观察	0.341 7	32
编辑之友	0.603 1	11	编辑学刊	0.412 8	22	中国报业	0.320 5	33

位于第2至第11, 该类期刊的综合评价价值与其他学术期刊的综合评价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比排序位于第1的《编辑学报》要相对更小, 而比其余期刊要相对更大。事实上, 上述10种学术期刊是信息与新闻出版领域的核心期刊, 其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也是比较吻合的。针对剩余的22种学术期刊, 其评价结果也是合理的。限于篇幅, 此处不进行类似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提方法的优势, 下面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 将本文方法与影响力指数法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显示, 这两种方法的最终评价价值是不一样的, 且两种方法排名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61。一方面, 影响力指数法同时兼顾了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的优点, 其能够较好反映学术期刊的综合质量, 可见其排名较为合理, 而其排名与本文方法排名具有较好的关联性, 因此本文方法也是较为合理的。另一方面, 两种方法排名并非完全一致, 究其原因主要是本文方法兼顾了12项评价指标的优点, 其考虑的信息量相对更为丰富, 因此本文方法能够使得学术期刊评价结果相对更为全面。

第二, 将本文方法与熵权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方法^[12]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显示, 这两种方法的综合评价价值和排名也并非完全一致, 两种方法排名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11, 究其原因主要是熵权TOPSIS法仅考虑了指标的信息量, 而本文方法不仅考虑了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 还消除了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了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值得一

提的是, 《当代传播》在本文方法中的排序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 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期刊的基金论文比相对较大 (值为0.590 0)。

第三, 将本文方法与经典的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方法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显示, 这两种方法排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两种方法排名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61。由于CSSCI方法排名具有较好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因此这进一步说明本文方法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评价结果。但值得一提的是, 与CSSCI方法相比, 本文方法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 而且无需花费巨大的成本。另外, 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本文方法还利用了前景理论的优点, 其能够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 进而使得学术期刊各指标值更加客观。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方法同时兼顾了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优点, 其不仅可以考虑决策专家的心理感知行为, 还可以消除异常指标的不利影响和捕捉指标之间的关联性。

4 结语

本文将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进行结合, 提出一种基于前景理论和幂Heronian算子的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方法。本文方法的贡献之处在于: 第一, 引入了前景理论, 该理论通过计算学术期刊评价的前景价值函数值和前景决策权重值, 进而得到学术期刊评价的综合前景值, 其能够使得学术期刊评价结果

更为客观;第二,引入了幂Heronian算子,该算子通过对异常指标值赋予较低权重和采用连乘法来集结指标值,进而可以消除异常指标值的不利影响和捕捉

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其能够使得学术期刊各评价指标值的集结更为公正。本文提出的方法为学术期刊评价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李军.防止过度使用“影响因子”评价哲学社会科学期刊[J].中国出版,2022(1):17-19.
- [2] 游励.国内期刊影响因子相对变化动态比较:以图书情报学科和物理学科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2):37-44.
- [3] 俞立平,郑昆.期刊评价中不同客观赋权法权重比较及其思考[J].现代情报,2021(12):121-130.
- [4] 刘凤仪,叶继元.我国区域高校图书馆西文期刊保障体系实证研究:以华东五校图书情报学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2):28-34.
- [5] SOMBATSOMPOP N,KOSITCHAIYONG A,MARKPIN T,et al.Scientific evaluations of citation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rticles in the SCI database: Thailand case study[J].Scientometrics,2006(3):521-535.
- [6] 张慧玲,许海云,岳增慧,等.学科交叉期刊的影响力评价方法研究[J].情报学报,2019(10):1030-1040.
- [7] 俞立平,王作功,张再杰.h指数的综合修正研究:h_(top)指数——以学术期刊为例[J].情报学报,2018(12):1188-1192.
- [8] 丁佐奇.PlumX评价指标对促进中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的启示[J].编辑学报,2018(6):610-612.
- [9] 王磊.基于Altmetrics的国内期刊影响力评价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3):74-83.
- [10] 赵蓉英,王旭.多维信息计量视角下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研究:以国际LIS期刊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7): 773-781.
- [11] 张发明,王伟明.基于因子分析和诱导密度算子的学术期刊组合评价[J].情报杂志,2018(3):165-170.
- [12] 王伟明,徐海燕.基于最小偏差法的学术期刊动态组合评价[J].情报杂志,2019(5):102-108.
- [13] 王伟明,徐海燕,张发明.基于双激励模型的学术期刊动态综合评价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20(5):65-71.
- [14] KAHNEMAN D,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2):263-291.
- [15] 高若兰,周亦宁,刘继才.基于前景理论的PPP项目投资者逆向选择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21(1):36-46.
- [16] LIU N,XU Z,HE Y,et al.An inverse prospect theory-based algorithm in extended incomplete additive probabilistic linguistic preference relation environ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nancial products selection[J].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2021(3):397-428.
- [17] 施明华,肖庆宪.直觉模糊幂Heronian平均算子及其在多属性决策中的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8(4):971-982.
- [18] 王伟明,徐海燕.混合信息下的多属性大规模群体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2020(11):2560-2569.
- [19] MUHAMMET D,DRAGAN P,ILGIN G.Fuzzy Power Heronian function based CoCoSo method for the advantage prioritization of autonomous vehicles in real-time traffic management[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1(69):1-20.
- [20]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J/CD].北京: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2019:1.

作者简介:田一斐,忻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学术期刊评价。

收稿日期:2022-02-17

本文责编:郑秀花

· 工作研究 ·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中乐谱文献分类的优化^{*}

刘莹

(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24)

摘要:乐谱是专业音乐院校图书馆中重要的馆藏文献,乐谱分类的优化对文献资源建设和读者服务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中乐谱相关类目设置的分析,梳理其与音乐学科领域相关概念范畴不相符的问题,提出优化方案,并提出在音乐院校图书馆增设专业排架标识的建议,以期更为贴合音乐院校读者的乐谱使用需求,促进音乐院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开展。

关键词:乐谱文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音乐专业;学科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4.1

文献标识码: A

Optimiz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Musical Scor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5th edition)

Abstract Music score is an important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professional music colleges. The optimization of music score classifi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reader service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setting of music score-related categories in th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5th edition)* and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of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conceptual categories related to the field of music subject. The study proposes an optimization plan and suggests the addition of specialized shelf markings in music college libraries. Our goal is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music colleges in the use of musical stores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ubject services in music colleges.

Key Words music score literatur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music major; subject service

1 引言

乐谱,是音乐创作的重要工具,是音乐记录与传承的主要载体,也是音乐学者进行作品分析时的文献依据和音乐表演者演绎作品时的摹本。在专业音乐教育中,基于乐谱的研究对教学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也对音乐院校图书馆的乐谱馆藏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中,尤以通过乐谱的分类、排架为读者便利地查找资料为服务重心。

音乐院校图书馆对乐谱文献的分类编目,一般遵循《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下文简称《中图法》)订立的划分体系而进行。《中图法》自1975年第一版问世至今的50年间,历经多次修订,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五版(2010年出版)是现行分类编目最权威的依据。标准的统一带来了工作上的便利和高效,规避了图书馆之间许多交流互通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学科体系在持续发展,乐谱出版物也愈发品类繁多,这客观上对乐谱文献分类标准提出了改进的要求,这一要求在乐谱馆藏量大、使用率高、读者使用需求复杂的

^{*} 本文系2021年度浙江音乐学院理论研究类项目“乐谱文献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基础上的优化分类研究”(项目编号:2021KL008)的研究成果。

音乐院校中尤为突出。笔者在音乐院校图书馆的采编和流通部门工作多年,从图书编目排架工作和读者反馈中,都明确感受到现行的乐谱分类方法在面对音乐学科发展和读者现实需求时有优化的必要。本文以专业音乐院校图书馆为应用场景,分析梳理现有乐谱文献分类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案,为《中图法》中乐谱文献分类体系的完善提供助力。

2 乐谱文献分类的影响因素

2.1 乐谱文献的特殊性与出版物现状

乐谱作为一种特殊的音乐文献,其内容以记谱符号为主。相对于以文字为主要内容的文献,乐谱仅有标题、作者、发行商等文字信息作为分类编目的参考,其内容主体的阅读需要专业知识支撑。乐谱承载的作品,以声乐和器乐为基本划分,涵盖丰富的表演形式和庞杂的体裁系统,而且这些表演形式和体裁还在持续的发展衍变与交叉融合,这就要求现有的分类体系作出相匹配的调整。

乐谱分类编目的困难,不仅在于文献内容和专业属性的特殊,其出版形式的复杂也制造了分类难度。现有的乐谱出版物品类繁多,如交响曲、协奏曲或其他篇幅较大的单首作品出版物;某一音乐表演专业(声乐、器乐等)或方向(如器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古筝、扬琴等)为主的作品集;某位作曲家创作作品的专辑或丛书;依据一个或多个主题词创作的主题综合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看出,乐谱出版过程中,编辑加工的维度多元、形制不一,造成产品样态纷繁复杂,难以以单一的逻辑妥善安置所有品类。

2.2 读者使用习惯

在公共图书馆和普通高校图书馆中,或许会涉及一些乐谱文献的收藏与查阅,但在音乐院校图书馆中,乐谱馆藏比重突出、文献利用率高,读者使用需求也更为复杂。因此,观察音乐院校读者对乐谱的使用习惯,更能对其分类体系的优化起到指示作用。

音乐院校各专业的读者在乐谱使用习惯方面差异很大。音乐表演专业的读者主要聚焦于自身专业方向的作品集,如钢琴专业的师生集中关注钢琴作品的乐谱,较少翻阅其他乐器的乐谱,所以他们更希望钢琴作品的分类排架相对集中,在快速找到所需目标时还能便捷地查阅相关风格或不同版本的作品,使检索

具有延展性。音乐学与作曲理论等专业的师生更多进行“主题式”查阅,主题可能是某位作曲家、某种声乐或器乐体裁、或某一历史时期音乐作品等。作曲、指挥专业的师生,他们对总谱的使用率会比较高,其中包括合唱总谱、管弦乐总谱、歌剧总谱等,相对集中的分类排架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不难发现,“专业性”是影响音乐院校读者乐谱使用习惯的关键因素。充分掌握各专业背景读者的乐谱使用偏好,找到各专业间对乐谱分类排架期待的最大公约数,是完善乐谱分类编目的有效切入点,结合其内容的特殊性与出版形式的复杂性,从其本质属性出发,搭建起文献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桥梁。

3 关于《中图法》乐谱文献分类的几点商榷

《中图法》把乐谱文献主要划分为“J64中国音乐作品”与“J65各国音乐作品”两大类目。“J65”下设类目没有展开细分,只说明仿照“J64”。下文笔者就从图书馆工作经验、读者使用反馈、音乐学科发展实际等方面出发,针对“J64中国音乐作品”中较为具体的类目划分,提出几点值得商榷的问题。

3.1 类目的设置不准确

类目的设置是分类体系的骨干,需要逻辑清晰、层级明确。类目的名称应与下设类目内容一致,避免“张冠李戴”,应将具有紧密关联的内容设置在同一或相关的类目下,避免类目设置过于分散。

3.1.1 J642.4“戏剧、电影歌曲”与J643“戏剧音乐、配乐音乐”

J642.4“戏剧、电影歌曲”与J643“戏剧音乐、配乐音乐”的曲谱在分类级别上不对等。戏剧中的演唱部分从属于“歌曲”类目,配乐的器乐演奏部分却未从属于“器乐曲”类目。再者,戏曲、歌剧、舞剧、音乐剧、话剧、广播剧及影视作品等艺术形式中的音乐大都具有推动戏剧动作的功能,其演唱与演奏是整体构思创作,合并在同一类目下更有利于研究该领域的读者查阅资料的便利性及拓展性。另外,其下设置了“歌舞剧歌曲”和“戏剧歌曲”,“歌舞剧歌曲”注释内容中只标明了“音乐剧歌曲入此”,而“戏剧歌曲”类目内容只关乎“戏曲唱段”,对于“歌剧”这一重要的艺术形式却未明确提及。歌剧这种艺术形式自17世纪正式确立后,历经数次改革,积累了丰富的作品,

衍生出多样的体裁,如:正歌剧、大歌剧、喜歌剧、乐剧等。20世纪初,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和本土化的尝试,我国的民族歌剧艺术也从无到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歌剧因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广泛的接受度和深厚的艺术价值,在中外音乐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往往成为表演、创作和理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对现有歌剧作品的分析及表演教学尤其常见。因此,建议添加“歌剧歌曲/选段”类目并注释列举歌剧体裁,便于从事此领域研究与教学的师生查找,也有助于编人员对于多种歌剧体裁的识别归类。

3.1.2 J642.5“艺术歌曲”

J642.5“艺术歌曲”与其下设类目“独唱、合唱、重唱”的概念范畴不匹配。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①与《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②对“艺术歌曲”的定义,可以看出“艺术歌曲”是一种有着独特创作特征的声乐体裁,表演形式更倾向于独唱,而《中图法》J642.5类目中独唱、合唱、重唱等演唱形式都归于“艺术歌曲”之下,或许是把“艺术歌曲”与“具有严肃艺术情趣的歌曲”等同,没有认识到“艺术歌曲”是一种独立的音乐体裁。而且,在整个乐谱分类中,只在“艺术歌曲”“儿童歌曲”类目中提及“重唱”“合唱”等多声部歌曲归类,不免会造成其他类别均没有多声部作品的错觉。建议在保留“艺术歌曲”类目之外,专门设置涵盖所有体裁、内容的多声部演唱作品类目,服务于从事多声部演唱作品教学与研究的读者。

3.1.3 J645“舞蹈乐曲”

J645“舞蹈乐曲”这一类目设置了“民族舞曲”“儿童舞曲”“古典舞曲”“现代舞曲”“芭蕾舞曲”“交际舞曲”下位类。首先,“舞蹈乐曲”这样的提法很容易与具有“舞曲”体裁属性的器乐作品混淆;其次,设置的下位类很容易将已有民族歌曲、儿童歌曲、古典音乐、现代音乐等作为配乐的作品与专门为舞蹈表演创作的配乐作品混淆。在这一类目中,没有对分类术语做进一步的说明,编目人员和读者在查找此类乐谱时往往会无所适从。建议对此类目添加“专为舞蹈表演创作的配乐作品入此”^[2]的注释说明,澄清本类目录乐谱的性质。

3.2 类目的名称及其注释不准确

类目的名称对于所含内容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对分类编目有指导意义的类目名称的选用应与音乐专业

紧密关联,选择公认且明确的专有名词术语,避免容易造成歧义的表述。注释是对于类目名称的补充说明,重点解释一些归属不明、身份模棱两可的内容。两者都有必要在充分了解专业发展现状的前提下作出与时俱进的修订。

3.2.1 J642.1“通俗歌曲”

流行音乐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曾被赋予“时代曲”“轻音乐”“通俗音乐”等多种命名,其中“通俗音乐”及其派生的“通俗歌曲”“通俗唱法”的称谓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重新进入大众视野,学界以“通俗音乐”这个折中的术语来代替背负着“黄色歌曲”不良声名的“流行音乐”^{③[3-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流行音乐自身不断发展,“流行音乐”这一本名首先在理论研究领域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各种曾用名,在大众文化话语中也淘汰了“通俗音乐”成为公认的名称^④。在音乐教育领域,国家教育部2020年发布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已正式将“流行音乐”作为专业方向增加到艺术学门类音乐与舞蹈学的专业设置中。因此,在文献分类目录中以“流行”取代“通俗”,是符合学科发展现实、音乐教育规范和文化建设导向的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通俗歌曲”类目注释中写道“普通歌曲、流行歌曲、摇滚歌曲入此”。首先,以“通俗歌曲”作为更具涵盖力的高级分类术语来囊括所有大众歌曲,不但无法奏效,还容易造成歧义。其次,“普通歌曲”的提法不仅无从定义,且在学术话语体系也未见过这种说法。再者,这里的“流行歌曲”究竟是广义的歌曲形式的流行音乐,还是狭义的体裁意义上的“Pop song”?^{⑤[5]}若为前者,则后面的“摇滚歌曲”被迫升级,脱离流行音乐的大范畴成为新的音乐门类;若为后者,则与“流行歌曲”“摇滚歌曲”并列的“普通歌曲”也要被定义为一种独立的音乐体裁。无论作何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与流行音乐学科内的概念界定也不相符。

综合上述两方面,建议将“通俗歌曲”更名为“流行歌曲”,注释为“摇滚歌曲、节奏布鲁斯歌曲、爵士歌曲、乡村歌曲、民谣歌曲等入此”。

3.2.2 J642.4“戏剧、电影歌曲”

J642.4“戏剧、电影歌曲”注释为“戏剧、电影、电视主题歌、插曲、选曲入此”,类目名称没有对注释内容全部涵盖。电视剧与戏剧、电影是不同的艺术类

型,将其包含在戏剧或电影中并不恰当。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将相关二级学科定名为“戏剧与影视学”,以此命名逻辑出发,考虑到类目名称与其注释的一致性,建议将该类目更名为“戏剧与影视歌曲”。

该类目下的J642.41“戏剧歌曲”所设京剧唱段、昆曲唱段、地方剧唱段等子类目均为传统戏曲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对于“戏曲”的介绍为“中国的传统戏剧有一个独特的称谓:戏曲。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由此看来,“戏曲”作为指代一种中国文化艺术大类的专业术语,具有特殊的指向性,从古至今一直保有着全面的传承,其定名不能轻易被其他名词所替代。建议将该子类目更名为“戏曲唱段”,对于新创作的具有戏曲韵味或唱腔特征的创作歌曲,可另设子类目“戏歌”并辅以注释说明。

3.2.3 J647“器乐曲”、J648“民族器乐曲”

从类目名称上看,“器乐曲”和“民族器乐曲”两个同位类是从属关系,“民族器乐曲”是“器乐曲”的一部分,且“民族器乐曲”中的“民族”并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民族。从下设子类目反映出,J647“器乐曲”为中国的(西洋)管弦乐器作品分类,J648“民族器乐曲”为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分类。因此,建议将两个类目名称明确为“J647西洋管弦器乐曲”和“J648中国民族器乐曲”。

3.2.4 J647.695“爵士乐队合奏曲”

J647.695“爵士乐队合奏曲”注释为“摇滚乐、迪斯科等入此”,而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具有不同的乐队形制和作品风格,并非都由爵士乐队演奏。它们都属于流行音乐体裁,互相是并列而非从属关系。建议将该类目名称替换为“流行器乐合奏曲”,也更方便容纳类似的更多体裁的流行器乐合奏作品。

3.3 类目设置有待补充与调整

在《中图法》(第五版)所有音乐作品的分类中,仍有一些乐谱文献因找不到明确的归类,不得已全部置于“其他”类目中,造成“其他”类目过于庞杂,不便检索。

(1)在J647、J648类目中,分别以西洋管弦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作了独奏与合奏分类,但乐谱出版物中仍有既包含西洋管弦乐作品又包含中国民族器乐

作品的曲集,如吕远著《长城随想曲:吕远器乐作品选集(一)》、蒲方主编《陈田鹤音乐作品全集·器乐卷》等,其中不仅有不同种乐器的独奏,也有中外乐器不同形式的室内乐、协奏等作品,而这类作品集无法在现有的器乐曲类目中明确归属,建议添加区别于其他独奏与合奏形式的“器乐作品综合集”。

(2)在J648.6“器乐合奏曲”类目中,除了包含吹打乐、丝竹乐两种民间传统乐种,弦索乐、鼓吹乐、锣鼓乐等中国民间传统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器乐乐种均未罗列,使大量的中国民间传统器乐合奏曲作品集无法归类。另外,该类目中也缺乏民族乐器协奏曲集的类目,类似《阮与民族管弦乐队协奏曲日月歌:2013》《野火·第二竹笛协奏曲》这样的作品便难于归类。因此,建议在“器乐合奏曲”类目下增加“弦索乐”“鼓吹乐”“锣鼓乐”“民族器乐协奏曲”子类目,以归类不同类型的器乐合奏曲作品集。

(3)前文提到在乐谱文献众多的出版物类别中,还有重要的一类——作曲家专辑系列丛书,这类文献册数多,不宜打散排列,且作品由于涉及声乐与器乐的多种体裁、表演形式,无法准确归类于某一类别中,因此建议添加“专辑”这一类别,以集中分类排架某位作曲家成套出版的作品集丛书,便于读者对这类乐谱做专题性查阅。

(4)建议将与流行音乐、戏剧音乐相关的类目,从原有的“歌曲”和“器乐曲”作品类目中分离出来,独立设置“流行音乐”“戏剧音乐”类目。这两类音乐在新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大众对这两类音乐非常欢迎,文化产业方面的需求很大,国家教育部也因势利导,调整了专业设置。从两类音乐的表演与创作内涵而言,也有别于其他相对“传统”的音乐门类。独立设置不仅有利于促进两类作品的馆藏资源建设与管理,更有利于读者的文献资源利用。

4 关于专业音乐院校图书馆增设专业排架标识的建议

在《中图法》的乐谱文献分类系统中,将J64“中国音乐作品”从世界各国音乐作品中独立出来,为中国传统音乐艺术设置“量身定做”的归类,对于提升文化自信、鼓励音乐从业者与教学人员积极投身民族

音乐事业发展有着指导意义。但音乐专业领域的读者通常对《中图法》分类号的涵义不甚了解,给查找文献带来了困难。而且,按照“中国音乐作品”与“各国音乐作品”的分类进行排架,使同专业的乐谱相隔较远,给读者查阅带来不便,这一现象在馆舍面积大、馆藏量大的图书馆中更为突出。笔者通过总结过往工作经验与读者反馈意见,横向调研了同类型音乐院校乐谱馆藏与读者使用情况,建议在专业音乐院校图书馆中增设“区域号”与“书架号”组成的专业排架标识,尝试以此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如下:

(1) 区域号。专业音乐院校中对乐谱类文献需求最大、关联最直接的当属音乐表演各专业方向,以教学系部名称作为区域号将乐谱文献进行一级专业分区,如:声乐、民族器乐、管弦乐、钢琴、流行音乐等,明晰乐谱文献的专业/系别归属,直接对照各专业读者的查阅需求。

(2) 书架号。采用各音乐表演形式的名称作为书架号,在各专业区域内做第二级分架,如:独唱(奏)、重唱(奏)、合唱(奏)等,进一步为满足读者指向性的教学目标集中查阅乐谱提供便利。

白国应在《图书分类学》中,基于实践原则提出了专业图书馆的文献分类原则:“对于分类体系要求结合本专业的具体情况;对于本专业的类目要求比较详细的区分”^[6]。采用专业排架标识构建乐谱文献馆藏区域框架,再结合《中图法》分类体系做区域内部细分,或许可以使乐谱文献的分类排架既具备《中图法》的科学统一性,又兼顾读者个性化需求。

5 结语

音乐学科疆域在不断开拓,专业知识快速更新,相关文献分类法的发展要与学科发展积极联通互动,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资源有效利用。乐谱作为各类音乐文献中形式与内容都非常特殊的文献类型,其内在的专业属性决定了其分类体系应与音乐学科发展同步、与专业紧密结合。在专业音乐院校图书馆中进行《中图法》乐谱文献类目设置的优化、并尝试增设专业排架标识,首先能帮助采访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关注相关文献的出版动态,弥补馆藏疏漏,使乐谱文献馆藏的补充更及时有效;其次,能指导非音乐专业的编目著录人员准确归类,规范文献资源的编目数据;第三,使乐谱文献依据专业“身份”合理排架、典藏,增强图书馆空间利用的可持续性;第四,提高读者查阅资源的便利性和拓展性,使专业之间标识明晰并增进交流互通;第五,助力学科馆员在服务不同的读者使用需求时目标明晰、有的放矢,更好地推广馆藏资源,提高利用率;第六,使馆藏文献明确学科归属,作为应对学科评估体系的资源储备支撑,促进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良性发展,脚踏实地服务读者。

笔者通过自己服务于图书馆多个岗位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多所音乐院校图书馆的调研所得,提出以上关于乐谱文献分类的几点思考,期望对《中图法》的完善作出具体而微的贡献。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教。

注释: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艺术歌曲”定义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一种浪漫主义音乐体裁。歌词多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个人的内心情感,其曲调的音乐表现力较强,表现手段及作曲技法也较为复杂。歌曲一般采用钢琴伴奏,伴奏是整个音乐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多为音乐会独唱歌曲,一般为单曲形式,也有由多首歌曲组成的声乐套曲。”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7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394-395。
- ② 《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对“Art Song”定义为:“为音乐会曲目准备的歌曲,与传统歌曲或流行歌曲不同。这个词通常用于指代独唱歌曲而非多声部歌曲。”详见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second edition, Volume 2[M].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01:94。
- ③ 1987年11月,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国音乐学》编辑部联合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社会音乐委员会、《人民音乐》编辑部、《当代中国》丛书音乐卷编辑部、《歌曲》编辑部、《流行歌曲》编辑部、音协河南分会共同发起了在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会议纪要中提到“关于通俗音乐的名称,多数同志认为是不准确的。这一名称并不能对此类音乐界定清楚的范畴,不能揭示这类音乐的本质特征,不能概括其社会学和美学特征,因此也是不科学的”。

- ④ 大众对“流行音乐”的认可,甚至倒逼中央电视台“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2008年把20世纪80、90年代使用的“通俗唱法”改回“流行唱法”。
- ⑤ 如果是与摇滚歌曲并列,则一般认为“流行歌”所指为“Pop Song”这种具有相对明确特征的歌曲体裁,而非广义的流行音乐中的歌曲形式。对两个概念的辨析,详见陶辛《流行音乐手册》。

参考文献:

- [1] 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64-365.
- [2] 王天兵,宋显彪.《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5版)“J6音乐”类目修订评述[J].图书馆建设,2013(6):30-33.
- [3] 含方.十年——中国流行音乐纪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32.
- [4] 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史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230.
- [5] 陶辛.流行音乐手册[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448-449.
- [6] 白国应.图书分类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24.

作者简介:刘莹,硕士,浙江音乐学院图书馆采编部主任,馆员。

收稿日期:2022-02-11

本文责编:郑秀花

(上接第38页)

- [15] DONG J Y, WAN S P, CHEN S M. Fuzzy best-worst method based on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for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J]. Information Sciences, 2021, 547: 1080-1104.
- [16] DUBIOS D, PRADE H. Operations on fuzzy numb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1978, 9: 613-626.
- [17] FONTELA E, GABUS A. DEMATEL: Progress achieved[J]. Futures, 1974, 6(4): 361-363.
- [18] 王伟明,徐海燕.不确定语言信息下的大规模群体DEMATEL决策方法[J].控制与决策, 2021, 36(7): 1-11.
- [19] 王伟明,徐海燕,朱建军.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大规模群体DEMATEL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41(1): 200-212.
- [20] 孙俐丽,赵乃瑄.基于元人种志的科学数据共享关键影响因素识别[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0, 43(3): 91-97.
- [21] 张宁,袁勤俭.学术社交网络信息质量的治理和提升[J].图书情报工作, 2019, 63(23): 79-86.
- [22] SONG W Y, ZHU Y, ZHAO Q H. Analyzing barriers for adopting sustainable online consumption: A rough hierarchical DEMATEL method[J].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21, 140: 1-33.
- [23] 张发明,王伟明.基于后悔理论和DEMATEL的语言型多属性决策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 2020, 28(6): 201-210.
- [24] ADDAE B A, WANG W M, XU H Y, et al. Sustainable evalua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energy-resource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Ghana using large Group-DEMATEL[J].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2021, 6: 1-26.
- [25] WU W W, LEE Y T. Developing global managers' competencies using the fuzzy DEMATEL method[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7, 32(2): 499-507.

作者简介:武文丽,忻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科研人员数据素养管理。

收稿日期:2022-04-08

本文责编: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公共图书馆 IP 培育研究

——以宁波图书馆“甬图君”品牌为例

应珂

(宁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00)

摘要: 品牌IP作为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外在价值体现,既是图书馆阅读文化的代表,也是宣传推广的吉祥物,可作为图书馆和读者沟通的媒介,也可作为独立的活动符号来衍生发展。文章以宁波图书馆“甬图君”品牌形象为例,对其IP培育的建设进行总结梳理,可归纳分为概念定义与传播价值、形象开发与设计特点、品牌培育与衍生发展、运维营销与跨界推广。再把握公共图书馆特征,从产生、传播、反馈三端出发,对现有品牌IP形象塑造策略进行服务实践的问题分析,以期服务图书馆IP成长,实现品牌价值的延伸和持续。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IP; 甬图君; 品牌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59.2755;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IP Cultiv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Ningbo Library's "Yongtujun" Brand as an Example

Abstract As the external value embodiment of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the brand IP is bo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library reading culture and the mascot of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It can be used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braries and readers, and can also be developed as an independent activity symbol. This paper takes the brand image of "Yongtujun" of Ningbo Library as an example and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IP cultivatio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value, imag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features, brand cultivation and derivative developmen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rketing and cross-border promotion. Th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libraries, the problem analysis of existing brand IP image shaping strategies in terms of generation, dissemination and feedback is carried out for service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serving the growth of library IP and achieving the extens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brand value.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IP; Yongtujun; brand construction

图书馆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基于馆藏资源、馆舍历史、阅读推广、服务品牌等一系列与图书馆业务有关的资源素材,通过开发创新、概念创造、内涵提炼、内容整合,开发具有文化内容、阅读知识性、形象附加值的产权IP。图书馆IP品牌是图书馆文化外延的新表现,通过挖掘馆藏资源,融合阅读活动,赋予文化内涵,以艺术形象的表现方式,将创意性的文化内容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有形产品或无形服务^[1]。

公共图书馆以馆内外的阅读推广活动为契机,增进读者和图书馆的互动,以图书馆IP为抓手,打造品牌化的精品活动,提供功能阅读空间、个性化阅读体验,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效益,优化对外形象的竞争力,加强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影响力,丰富全民阅读供给保障,实现优秀文献资源的价值体现。

本文选取宁波图书馆“甬图君”IP品牌建设案例,进行调研、定位主体、分析现状、归纳经验,激发

同类主题创新活力,创造更多IP的融合性创新成果,为高质量图书馆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1 图书馆 IP 的概念定义与传播价值

1.1 图书馆 IP 的概念定义

IP有很多种称呼,如形象代言人、吉祥物、虚拟偶像、卡通载体等,国内对于IP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在互联网的语境下,IP的概念已超出本身知识产权的定义范畴,作为无形财产被赋予各种含义,成为了现象级的营销概念^[2]。图书馆IP代表着公共图书馆品牌的形象、知名度、象征价值、名誉度、美誉声誉等综合评价内容,IP可以拥有无限可能的内容,即凭借其自身的原创内容,用多样的表现形式,借助多个触发点进行分发传播。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定义图书馆IP的内涵和外延:①IP是图书馆原创或合法授权的内容,来源于图书馆,拥有版权基础。②IP的内容用于图书馆的业务和服务,并在创作上具有内容的延展性。③IP拥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赋予性格色彩,投射情感联结,提供情绪服务,可做到破次元壁与读者产生关联,凝聚读者感情。④IP的传播可以跨媒介、跨平台、跨领域、综合跨界,在品牌传播中有升值性和生长性,不仅仅只是直观的视觉传达和平面呈现。IP有自带流量的潜力,也具有商业价值。⑤IP一旦产生,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具有其特定的受众和可发展的粉丝、社群、社区,可以被重复性使用、消费、分享、互动。

1.2 图书馆 IP 的传播价值

一个成熟的IP形象在品牌的视觉化传达上,能迅速联结读者和图书馆,拉近读者距离,加深读者认知,提高阅读识别效率,快速建立起读者对图书馆的印象标签,降低宣传成本,加强推广效果,达到形象软着陆的目的。图书馆IP不仅能在图书馆的馆藏、服务、活动等业务上带来关注热度,也能打开阅读推广活动的知名度。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营销方式多样化,阅读品牌发展迈入了竞争时期,IP品牌是对外推广竞争力的有效衍生,IP形象的独特性有利于多平台的宣发推送,多渠道获得流量关注,多元融合信息符号,多方面传播核心思想^[3]。图书馆IP品牌化是公共图书馆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规划,也是对外形象的一张文化名片。

2 图书馆 IP 的形象开发与设计特点

图书馆IP是一种及多种文化形象的连接结合体,符合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清晰的符号辨识度,自带流量和变现能力,以角色形象作为核心代表,设计代言人的外型,赋予角色性格,根植内涵,设计角色表现,全方位打造完整的IP形象产业模式^[4]。在设计开发中要兼顾内涵和外延两个层次,内涵包含:IP形象的情感共鸣、精神内核、文化辨识度等;外延包含:IP形象的外型视觉设计和形象表达。

2.1 IP 形象开发的内涵层面

塑造IP形象并不是只设计一个吉祥物式的卡通造型,或绘制单一的寓意形象。构建完整的IP形象应该赋予IP角色灵魂和精神,塑造其性格特质、人物设定、角色世界观,拥有规律的生命周期、正确的价值观、正面的背景故事、凝结美好的情感、富有魅力的人格,充满温度的情怀^[5]。图书馆IP精神要素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品牌要素对既定图书馆形象及其内涵进行维系,既在品牌名称、符号、目标、主题等物理要素保持一致性,也表现为象征性、信誉、美誉、导向、评价、舆情、纪念意义等无形要素一致性。IP品牌对已有图书馆形象进行组合,完善为有机整体,输出核心的价值主张,通过内置精神与外部读者受众产生文化认同、情感共鸣、感情链结,重塑图书馆与读者关系,让图书馆展现温度和魅力。

在IP形象的传播推广中,展示图书馆的文化,加强用户粘性,体现文化价值^[6]。优秀的IP具有同调性,可以代表图书馆的文化基调,在产出上必定可以满足不断输出、不断成长的内容需求。在宣传曝光中,具有高频性的标签功能,加深受众认知印象。“甬图君”从读者的阅读需求出发,通过用户画像的数据分析获取创作灵感,从图书馆服务品牌的核心内容中选择原型,设定人物精神,并以此基点延展开进行IP形象的世界打造和故事开展,以“平台串联+阅读场景”赋予其虚拟人生的角色定位,展现图书馆使命,为后期推广奠定拓展基础,做到IP生命、阅读生活、品牌生态的有机融合。

2.2 IP 形象开发的外延层面

IP形象的身体比例和动作应用应该立足具体使用场景,在保证自身形体特征的基础上,加深具象

化,可以融合多样化风格,配适不同的联动互动要求,完成复杂的营销、推广、跨界合作,以便后期的业务拓展,通过插画、图标品牌、UI界面,线上banner设计等设计打造,满足图书馆内外各类使用,譬如馆舍场景实体、线上宣传虚拟形象分发、阅读宣传合作推广、品牌跨界联名产品。

从用户视角出发,IP形象应具备拟人化的视觉特点。“甬图君”形象的内涵,通过品牌的定位,赋予IP相应的象征意义。设计师从身边的馆员的造型进行人物创作,一位身着馆服、满面笑容、佩戴眼镜、大眼渥发、认真服务、专注工作的馆员形象,描绘文艺气质和书卷气,形体笔触灵动简洁,色彩明朗活泼。内容结合宁波图书馆借阅服务、阅读推广、资源导读、参考咨询等服务,设定具有代表性的场景,凭借其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传达IP角色的活动情绪,恰到好处呈现宁波图书馆读者服务的专业性,带给读者熟悉度和认同感。顺应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使用特点,将IP形象从单一的喜怒哀乐的情绪转换到适应互联网复杂内容的表情组,设计了“甬图君”32个人物视觉形象(见图1),体验阅读生活日常。例如微信社群推广,根据微信表情专辑分类,从静态视觉设计1.0到动态形象升级2.0,设置微信表情专辑。



图1 宁波图书馆“甬图君”IP形象(部分图例)

2.3 IP形象的设计特点

人格化的“甬图君”形象具有网红效应,IP开发故事阶段应平衡好专业性和娱乐性,严格把控核心内

容,保持作品原创性、真实性、品牌故事独特性、内容持续生产力。IP推广发展阶段应注意跨界衍生性、媒介载体的网络化。服务读者应注重用户相关性、受众群体的大众化。宣传推广IP应尊重新媒体传播平台的集群性,利用粉丝圈层,进行活动参与者与IP形象的情感互动,引发用户共鸣。“甬图君”形象特征应该符合图书馆的社会身份,融入阅读活动要素,联系用户生活,IP的人格化表现能唤起受众阅读兴趣。“千馆千面IP”,图书馆的品牌特点源自图书馆的文化定位,也是图书馆在IP品牌运营过程中的理念体现。IP投放到新媒体平台,易融入营销软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自自由性能,渗透到读者的阅读日常,聚焦热点和潮流趋势,建立读者喜爱的文化消费、互动交流、偏好符号。

3 图书馆IP的品牌培育与衍生发展

采用标准化的包装是IP品牌打造的重要环节,IP能以更规范的延展性进行图书馆文化活动的理念传递。通过IP人物独特的个性设定,打造IP传播的人设,加强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和辨识度,让IP形象在用户的标签印象中迅速建立桥梁记忆,产生阅读品牌联想。

3.1 立足图书馆职能,推荐馆藏资源品牌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明城市的重要服务窗口,以传承、服务、推广阅读为重要使命。阅读是社会文明的推手,自带流量和潜在势能。图书馆阅读品牌化,馆藏本身就是典型的超级IP来源。以宁波图书馆为例,有纸质藏书325万册(其中古籍近8万册)、中文电子书350余万册、电子报刊36万余册^[7]。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丰富,有其规模和特色。IP挖掘素材,可在馆藏资源的版权合法的前提下利用。已进入公共版权的资源,也是可供挖掘的IP素材^[8]。宁波图书馆“甬图君”荐读、好书推荐、“甬图,上新了”、“数据库推广”、“电子书云读”等线上资源专题微服务,贯穿宣传IP的策划执行和网络推广,既可强化公共图书馆宣传教育职能发挥,又能加深品牌影响传播。

3.2 引领图书馆活动,服务阅读推广品牌

公共图书馆活动品牌发展由来已久,提供均等普惠的文化服务。图书馆的馆史、域名、标志、标识、名称、口号、服务名称、文献资料、活动特色、专利技术、项目方案等内容都可成为读者的记忆点,构建IP品牌的整合要素。例如,宁波图书馆打造了“天一系

列”阅读推广特色服务品牌,融合“甬图君”馆员身份,拟人化于馆方自媒体平台进行阅读推广,宣发阅读服务与馆情资讯。甬图“天一”系列十三个活动子品牌,内含讲堂讲座、音乐分享、艺术展览、约读分享、约书荐读、云读数据库、童读童绘、文荟文简资讯参考、有声听书、朗读推广、外文荐书等六十余个活动系列。通过活动品牌积累人气,积累社会公众对图书馆的信任度和好评,加强图书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为IP发展及推广提供群众基础。

3.3 开发图书馆文创,打造阅读角色衍生

图书馆的一个文化IP可以开发设计多款文创产品。IP品牌具有不断成长的生命力,移步换景,以景换物,不限于时间、空间、载体、范围。IP品牌可提供创新表达来体现图书馆的文化价值,又可以根据阅读场景使用IP的具体要求,配合不同的IP文创进行推广,将文创产品的文化价值进行系列包装,发挥集群效益,产出最大化,避免文化价值流失,使公共图书馆IP发展持续增值。“甬图君”品牌IP开发过“靠你读书”系列抱枕、“文化人”冰箱贴、阅读笔记套装、纸胶带、书包帆布袋、“美好阅读实验室”盲盒等文创产品,配合年度阅读专题宣传,在读书周活动专题、全民阅读推广中,活动互动派发读者福利,分享甬图书香集锦、福袋、礼包。系统化是品牌建设的重要模式,增加了IP实体衍生品的产生形式,以玩偶、摆件、文具、标识、软装、礼品等IP立体化产品,实现二维平面形象到三维建模的转换,文创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植入阅读标签,系统化的作业也利于生产工期控制,以便优化生产用料、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4 图书馆IP的运维营销与跨界推广

4.1 组建自媒体团队,专人专岗运营

图书馆IP形象打造,需要专业化的自媒体营销人员提供服务。馆方可以采用内部选拔和服务外包的方式进行营销团队的组建。团队成员要了解互联网运营平台规律,非常熟悉微信、微博、B站、知乎、小红书、视频号、今日头条等平台的运营规则,有新媒体运营经验;思维活跃、有分享欲,沟通能力强,可跟进各媒体关系的维护与拓展;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沟通能力、策划能力,具备一定的项目跟进、管理和内容创意策划能力;熟悉各种视频图片编辑软件、直

播软件,掌握常用设计类软件,对审美有较高要求。

在专业应用能力的基础上,团队成员还需了解图书馆领域,领会图书馆的精神文化,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岗位人员的综合运维能力是IP品牌运维营销的人才基础,借助IP相关信息的表达,可以让读者受众更加全面了解图书馆IP品牌,加强宣传效果^[6]。

4.2 加强馆舍设施建设,丰富IP元素设计

在图书馆馆舍的空间布局方面,图书馆IP形象的打造可以加强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觉表达,打造人格化的IP形象,同步语音技术支持,植入馆舍的文化艺术空间,进行展览导赏;在馆舍参观引导的讲解介绍方面,设置IP形象的拟人化交流机器人,实现视觉交互听觉的联动,以读者多种感官体验来建立服务印象,在馆舍实体展示和接待宣传活动中发挥作用;另外在实物化IP形象的置入馆舍上,通过对产品、装置、装饰方面的材质创新,使读者获得更好的触觉体验,打造多维度的IP感官服务体验。例如,宁波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的墙面喷绘、展览展板的语音播报按钮、幼儿借阅区的孩童阅读椅、听书资源的耳机森林、黑胶唱片的音乐体验区域都尝试置入过IP的设计元素。

4.3 阅读网红化IP投放,精确培育粉丝社群

阅读推广服务品牌与读者建立感情连接需要品牌的价值认同,图书馆输入文化活动区分阅读受众,IP人格化代理更易于获得读者对于品牌活动的肯定,实现粉丝吸纳和服务效应。IP营销针对粉丝成立社群服务,在特点阅读活动的文化元素上整合共性,活跃品牌活力,实现粉丝情感反映,达到品牌溢价的社群效应。例如宁波图书馆在新春期间,发放“甬图君”阅读品牌的微信红包封面,将线上线下的读者及粉丝打通传播渠道,裂变二次自媒体推广,获得更大的流量通道,进一步巩固品牌形象,把握新年节日气氛,赋能IP营销,串联功能性服务,吸引读者进行微信互动的同时,精准定位人群,扩大甬图阅读品牌宣传投放^[9]。

4.4 联盟优势开发IP资源,增援文创周边流量

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需要构建开发的生态体系。阅读启发文创,文创引流阅读,图书馆IP品牌塑造及影响力积蓄,是图书馆IP跨界合作的能量基础。超级IP品牌自带流量体质,在推广图书馆logo品牌的过程中,更易孵化图书馆阅读理念,达成核心文化价

值传递。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为我国图书馆文创工作者提供了交流、学习、合作的平台。在文创产品的网店入驻、平台授权、协同设计、众筹流量、销售落地的各环节,联盟内图书馆可以根据自身开发需求进行IP合作和馆际推广。图书馆间的优势互补,打破了馆别限制,实现开放共享资源,又保证图书馆IP的跨界自由,保留图书馆IP的自有特点和个性化元素^[10]。

4.5 数字技术助推IP跨界,寓教于乐融入体验

文化IP借助互联网的数字技术,通过项目化IP品牌运营,围绕图书馆专题宣传服务进行跨界合作,融合全方位的社交平台,多点互动,开展数字图书馆IP计划。宁波图书馆结合小程序服务,开设数字读者证办理服务;响应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活动,开设自媒体阅读宣传专栏,陈列数据库资源,推荐网络图书馆IP。不受时间空间所限,在宁波大市内实现资源访问、获取、参考的文献传递。利用5G技术,开设创客空间内的主题VR活动,配合IP品牌授权,进行文化主题宣教,“数字敦煌”“海洋科普”“红色历史”等热点IP授权合作,让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富有趣味。让文化遗产融入读者的现代阅读生活,配合馆庆周年活动开展非遗手工拓印、传统技艺体验、文创市集等现场体验,融入多元文化产业IP互动,使图书馆活动意义倍增。

4.6 推进本土文化传承,文旅融合IP创新

“甬图君”充分发挥地域文化优势,联合馆内“明州往事”阅读品牌,采取了主题性选材的方法,开设了灵桥忆昔、走读外滩、鄞江游趣、风雅南塘、甬人甬事等栏目,联动宁波阅读联盟的社会阅读组织,采用图书馆+社会组织的定点游学走读活动,进行线下活动讲解、历史资料查找、参考咨询服务,将社会资源与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丰富宁波市民阅读文化生活。线上新媒体平台的阅读专栏,设立阅读标签,通过“明州往事”栏目的多平台推送,立足宁波,放眼中西,不仅讲述宁波本土发生的旧事,也介绍外地人乃至外国人眼中的宁波事件。配合宁波建城1200年开展“一本书打开宁波的1200年”读者福利活动,获得5.1万的互动阅读。结合书香宁波日,宣传普及阳明文化,推出长图推文《明天是他的生日,我要让他出现在我朋友圈》,漫画版的“王阳明传”赢得了5.7万的点击量,体现了作为宁波地区的中心公共图书馆的宁波图书馆在阅读推广中的文化价值,浓缩了甬图阅读品

牌的区域成效,实现深度融合。

5 图书馆IP的现状与问题思考

5.1 IP产生的逐渐趋同

IP对于读者,是品牌的符号象征,也是情感寄托和文化认同,提供图书馆归属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更迭发展,信息量爆炸,个人信息超载,注意力的日渐稀缺,使IP的表达有了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和传播符号。图书馆IP若有自身的话题能力、优秀的人格化演绎、多重投放的技术整合、有效精准的宣传投放,才会让IP拥有其独立的品牌生态圈和业界影响力。

互动是双向的交流,品牌建立自身的信息话语权,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真正的品牌IP化,无法避免推广场景应用的立体化,需要有IP产品、IP形象的具象投射,在读者的现实生活中将图书馆业务服务和用户体验情感连接起来。IP形象的设计元素要高度提炼,避免同质化竞争,创新应用场景需因地制宜,契合图书馆地域特点和读者受众的认知逻辑,以期为图书馆IP品牌应用拓展新的空间思路。

5.2 IP传播的迭代创新

目前仍有图书馆IP品牌建设中采用传统硬广方式,产品的创意性不足,营销方式单一,偏重叙事功能,缺乏文化骨血,套用其他场馆情境仍能推广,缺少图书馆的定位,切入点的案例性特色不足。图书馆IP传播需要考虑阅读推广活动在宣传过程中的宣发平台适配性,阅读推广需开拓活动品牌集群建设的创新思维,品牌活动更应注意IP特点的展现,规范IP品牌的使用。

IP文创产品衍生遵循定位中心化原则,面向读者用户为中心和以图书馆为中心的逻辑起点是有差异的。文创是实体产品,也应关注开发周期的迭代和产品的层次性。重视读者的用户反馈,产品体验满意度兼顾使用功能与情怀表达的平衡,更新IP文创的产品品类要做好产品线的跟踪和质保,出品批次的差异性是否会影响读者用户体验,也是运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5.3 IP反馈的周边回响

IP形象的品牌是否进行产业链设计,公共图书馆在制定文创衍生品开发计划时,更多以服务读者、实现文化价值为目标,相对较少考虑市场因素和周边

的产业辐射。IP全产业链不仅勾勒品牌未来推广的蓝图,也能服务图书馆文化的综合发展,让用户了解、理解、共鸣、喜爱图书馆,成为读者与馆方沟通的媒介,增加用户黏性,带来综合效益。

IP产品的使用场景和承载环境反映了设计学中的符号寓意。在文创IP设计体系中,IP空间服务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使用环境,通过展示馆舍的设计,融于IP吸引读者,沉浸式体验的阅读推广新业态,在技术层面基于智媒手段,在AR、AI、VR、5G等领域仍有探索空间。展示路径的更新,促使图书馆第三空间功能革新技术路径,虽有大量公共图书馆进行创客空间开发,但IP空间功能的运用仍有较多发展可能,有待突破。

6 IP新趋势的期待和展望

浙江省2019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文旅融合IP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总体思路:以文旅融合IP建设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推动文化和旅游“双万亿”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我省建设全国文化高地、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全国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样板

地。图书馆IP建设为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城市建设文化高地,构筑特色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力量,附加城市图书馆文化价值。“风物可人吾欲住”,宁波简称“甬”,地处东南沿海,是一个江南水乡、海港城市,也是一个具有藏书文化、图书馆文化的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形象主题口号,提供了建设文旅融合样板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文旅融合潮流下,宁波图书馆品牌发展迎来了新的挑战,利用IP提升图书馆魅力,打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阅读活动品牌。IP培育是宁波图书馆建设内容创新创意的延伸,版本迭代的跨界营销在推广上起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成为读者意识认知中的图书馆生活的标签记忆。“甬图君”作为阅读形象融入读者服务的深度渗透,以“互联网+IP”赋能阅读活动衍生,利用馆藏资源重组,媒介渠道破圈传播,读者用户亲身体验的深入,实现跨界内容整合,运维图书馆品牌推广走向成熟和纵深。“甬图君”的打造体现了互联网热度对图书馆品牌发展的流量影响,突破了图书馆形象“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状,提供了图书馆形象开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罗莉.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及其启示[J].图书馆研究,2021(1):74.
- [2] 吴小凤,汤筱晓.传承与创新:基于二元思想的老字号IP构造[J].商业经济研究,2021(7):116.
- [3] 刘彦希,张大鲁.IP形象设计在咖啡品牌中的应用研究[J].湖南包装,2021(2):109.
- [4] 刘月蕊,贾诗敏,赵蔚.多维度衍生视角下博物馆角色IP设计开发研究[J].包装工程,2020(8):254.
- [5] 李甜甜,丛昌楠,赵蔚.符号学视野下儿童品牌中的IP形象如何构建:以旺仔牛奶为例[J].西部皮革,2021(15):64.
- [6] 胡一.IP运营: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新与推广的新思路[J].图书馆学刊,2018(7):22.
- [7] 宁波图书馆简介[EB/OL].[2020-06-10].<https://www.nblib.cn/information/319>.
- [8] 应珂.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策略与运营研究:基于宁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案例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7):97.
- [9] 胡治芳,彭家莹.网红品牌IP营销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20(1):102.
- [10] 施丽.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探索实践:以浦东图书馆为例[J].公共图书馆,2020(2):31.

作者简介:应珂,宁波图书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自媒体阅读推广、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2022-08-05

本文责编:郑秀花

· 工作研究 ·

“十四五”初期我国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总结及展望

杨 婷

(南京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18)

摘 要: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学术界对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阅读推广、智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信息素养、图书馆学思想理论等六个方面。但是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深入开拓;在研究广度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热点过于集中,公共图书馆一线实践问题的关注略有不足。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50.1;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Summary and Prospect of Public Library Research Hotspo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bstract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academic of our country has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cause and librar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with a broad vision and full of innovation, and put forward many insights, strongly promoting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in our country to go deeper and deeper.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public library mainly focus on six aspects: reading promotion, smart library, 14th Five-Year Plan, cultural and travel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library science theory. However, in the depth of research, it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order to further condense the consensus; in the scope of research, there are still some imbalances, and hot spots are too concentrated, while the public library practice of the front-line attention is insufficient.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Research hot spot; review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站在历史关键节点上,如何谋篇布局、承上启下,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是公共图书馆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内图书馆界在系统总结“十三五”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视野宏阔,富于创新,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1 阅读推广研究

全民阅读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阅读推广是公共图书馆永恒的主题。研究者们从阅读主体、阅读方式、阅读活动设计、阅读空间规划等方面探讨图书馆在阅读推广方面可以做出的努力。

许玮等人围绕亲子阅读对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指出,亲子阅读领域的阅读推广工作,既是个人阅读能力发展的基石,也是全民文化素质提升的关键。许玮等人以社会文化理论为视角,以英美

国家亲子阅读推广经典策略为研究对象,探究亲子阅读共同体的实践向度构建。他们认为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统一规划、内容维度与动机维度的协同演进、程序规则的高效促进、降低亲子双方身份转化壁垒、避免儿童阅读能力中断是亲子阅读活动的主要特征^[1]。张鸣雨针对数字化阅读研究认为,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可以满足读者碎片化和及时性的阅读需求,成为未来阅读的发展方向。公共图书馆在数字阅读推广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困境,可以通过丰富数字馆藏资源和特色数据库、完善数字阅读推广设备和人员配备、拓宽数字阅读推广渠道、保障数字阅读的网络信息安全等,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数字化阅读服务^[2]。吴斯曼通过对阅读推广人的研究指出,阅读推广人是创新和优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的前提基础和核心要素。阅读推广人应具备专业信息阅读与分析能力、活动策划与组织能力、推广调研与评价能力。公共图书馆要通过构建分众化的阅读推广培育体系、成立专业化阅读推广组织中心、提供多元化学习和成长途径等提升阅读推广人的综合素养,使其发挥在促进全民阅读方面的重要作用^[3]。伍玉伟等人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类型定位鲜明且多元发展;空间管理强调纳入第三方协同管理与营销;空间设计注重场景与情境的构建;空间服务内容不断细分和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建设策略:提供满足阅读推广需求的空间规划设计、打造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管理人才队伍、加强与阅读推广空间利益者的合作、探索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治理的模式与方法^[4]。赵俊玲等人采用历史分析法,依据阅读推广课程与教材发展的特点,从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两个层面,深入探析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中阅读推广课程的发展脉络,认为我国阅读推广课程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起步期、上升期、波动期和复苏期,提出应该建立培养识书能力、读者研究能力和阅读服务能力的阅读推广课程体系^[5]。张潇雨等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源优化、空间建设和活动开展三方面,与公众现实需求存在差距;合作对象多为公益性群体,与营利性机构合作较少;跨界合作联盟主要包括特定型和综合型两类,管理机制较为松散。基于此,提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的提升策略:需求导向,深化合作内容;主动出击,

拓展合作对象;建立机制,保障联盟高质量发展^[6]。

2 智慧图书馆研究

近年来,随着5G网络、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感受到智慧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图书馆行业也围绕智慧图书馆建设开展深入研究。

王超基于智慧图书馆功能提升研究指出,智慧图书馆能够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服务的需求,有效克服时空局限,实现更广范围的服务,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服务理念基础上,为广大用户提供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生态系统的应用能够极大地提升图书馆纸质信息服务水平,构建起更加全面、完善、及时的知识信息服务网络,提高知识信息的传播效率和利用水平,更好地满足不同主体的服务需求^[7]。张健则围绕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问题研究认为,针对当前信息技术固有缺陷、行业规范缺失和数据信息资源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的智慧图书馆伦理失范问题,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实施为契机,从强化政府监管、建立健全图书馆行业规范、提高图书馆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等层面推进智慧图书馆伦理规范建设,主动、积极、及时做好数据合规工作,规避信息伦理风险^[8]。管红星等人则集中探讨智慧图书馆的本质、概念由来和建设策略,提出要辩证地看待智慧图书馆的概念,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智慧图书馆的“智慧”与其他行业的“智慧”的本质区别,提出智慧图书馆应该是一个宽泛的、包孕性的概念,在建设方面,要赋能与开慧并重、接轨社会发展与回归初心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探索适合馆情、发展需要的智慧路径^[9]。

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防篡改、可追溯性、共识机制等特点,杨群等人提出了一种区块链技术驱动智慧增值服务模式及应用路径,实现用户在资源获取方式、学习交流平台以及时间空间上的转变,并有效解决智慧图书馆在信息资源收集、安全存储和共享传播等方面的问题,满足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智慧增值服务。智慧图书馆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施变革,进一步推进智慧增值服务模式上新台阶^[10]。刘慧等人提出,社会记忆性是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智慧图书馆属性内涵有文献载体汇聚性、文献内容组织

结构性、文献数据整合关联性。智慧图书馆职能要素有数据职能、组织职能、分析职能、服务职能、智库职能、智慧职能,分为基础职能、核心职能、目标职能三个层次,其内容彼此逻辑关联构成智慧图书馆职能体系^[11]。吴建中提出,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策、规范、技术、服务以及人才等各个方面,不能成为数字图书馆的翻版,要改变以信息储存为主导的管理思维,通过智慧管理与智能技术将信息释放出来,让信息产生增值效益,并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服务。此外,智慧图书馆建设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战略规划和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智慧图书馆建设不能只看作是一个专业性项目,要成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器,让公共图书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心不可少的可获取、分享和创造的知识基础设施^[12]。

3 “十四五”规划研究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各公共图书馆也相继发布了“十四五”规划。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解析“十四五”时期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因素并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城乡和区域分布等因素对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张孝天等人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为基础,提出新的人口环境下,公共图书馆需要通过保障高品质和多元化的知识需求、积极应对老龄化战略、培育良好的未成年人知识服务环境、构建高效均衡的城乡和区域服务体系等,积极把握人口结构变化对“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影响^[13]。严贝妮等人研究指出,省级公共图书馆应该将“十四五”规划作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繁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途径,在“十四五”战略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应该注意提升省级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意识、制定省级公共图书馆战略规划专项计划、推进省级公共图书馆服务方式创新和强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在“十四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14]。屠淑敏则围绕公共图书馆新发展进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指出,“十四五”时期虽是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也面临着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复杂发展环境,提出联合发展、社会化发展、技术引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

发展等战略建议^[15]。彭松林从全面围绕省级公共图书馆未来建设诸多维度研究指出,文化自信、全民阅读、公共服务、信息素养教育、智慧图书馆等背景是观测和指导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发展的宏观视角。融入国家文化发展的大局意识,巩固文化阵地、守护精神家园的责任意识,找准定位、错位发展的实干意识是推进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科学发展的思想前提。文化、教育、社会、行业四个维度的时代任务与使命价值决定了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十四五”期间应着力实现四个战略目标,即打造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转化和地方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型文化空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公众科学素养教育及文化科技创新服务和牵引公共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16]。吴丹等人研究认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科可以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新技术应用与实践、数据治理与赋能、国家发展需求中寻找新的生长点与发力点。多部战略蓝图文件的颁布也说明在新时代中,世界范围内都在认真谋划社会的新走向与新目标,而在这一特殊时期,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科也需保持既往敏锐的洞察力。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应明确定位,梳理发展趋势,用前瞻性的眼光分析社会需求,牢牢树立起学科话语权,保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17]。

“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王世伟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当以创新思维、战略思维、总体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看待未来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以深度一体化、深度均等化、深度智能化、深度绿色化、深度安全化来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催生新发展动能并形成发现新优势,书写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18]。

4 文旅融合研究

文旅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对文化和旅游改革发展的制度性安排。针对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发展问题,研究者们也进行了探讨。

马玲从文旅融合必要性角度研究指出,创建公共图书馆“文创+旅游”服务有助于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激发图书馆文创、旅游业态产品的推陈出新,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公共图书馆可通过挖掘文化资源

潜力、提升旅游产品文化附加值,构建“文创+旅游”信息联合平台,注重“文创+旅游”服务宣传推广等实现“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目标^[19]。杨凡分析了文旅融合给公共图书馆带来的机遇,认为文旅融合发展是文旅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传统文化焕发活力的必然途径。研学活动作为公共图书馆文创产业的一部分,具有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合一的特点,研学活动的不断推进能够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促使文旅融合实现由点及面、由静态到动态的深度融合^[20]。张新勤通过系统调研和深入分析我国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指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模式主要包括研学旅行、主题图书馆、“图书馆+”模式等,实践案例也很丰富。我国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还需进一步夯实理论研究、强化本土化研究、加强细节研究、注重多学科研究等^[21]。

在“互联网+”以及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面临着挑战与发展机遇,开展跨界合作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有其必要性。李健等人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剖析了六类主要的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的特征及其经验启示,总结了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发展方向、合作路径、合作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22]。刘军等人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为核心,从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文化传播三个角度思考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策略,提出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完善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机制;创新服务理念,助力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发挥政策优势,统筹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健康发展;建设丰富的特色馆藏,为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多渠道积极探索,拓宽“公共图书馆+”服务模式,以期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坚定文化自信^[23]。

5 信息素养研究

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是个体生存于信息社会的关键能力与必备素养。随着信息素养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公民的各项能力也需不断地提高。

石庆功等人论证了信息素养的重要意义,指出信息素养是现代公民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教育机构,在公民信息素养教育方

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体系建设实践和落实,要重点加强信息素养教育专门制度的供给、完善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内容、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制度建设经验、健全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运行机制^[24]。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环境的变化,公众需提升健康信息素养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满足更高水平的健康需求。崔庆林调查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的现状,从公共图书馆自身条件、国家政策和公众需求三方面分析了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构建全民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教育形式、组建教育联队、广泛与社会各方合作的全民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创新路径^[25]。于喜展指出,面对日益剧变的外部环境,仅靠公共图书馆远不能满足信息素质教育发展的需求,需要构建起以提升学生核心信息素养能力为目标,学科教师、图书馆员、教学中心职员及其他人员等多部门参与的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借助于生态学理论,提出了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内涵及“两层四群”结构模型^[26]。张久珍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响应“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国家战略需求,承担全社会数字素养教育责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27]。

6 图书馆学的思想理论研究

针对图书馆学方面的思想理论研究应该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构成内容。在2021年,学界同仁又继续开展了相关的讨论与研究。武洪兴等人从比较视野出发,指出中心化思想是传统图书馆的主导思想,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公共图书馆迫切需要通过去中心化打破传统思想的局限与禁锢,以读者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胆尝试、勇于创新,不断扩大去中心化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范围,为读者谋求更多的效益、更优的体验,为图书馆谋求更高的效率、更健康的发展^[28]。魏辅轶提出知识服务未能在图书馆落地的原因在于缺乏需求研究,以及过度的个人依赖导致缺乏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图书馆2.0”运动是一场图书馆的去中心化运动,同时对图书馆人才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以“资源为王”为标志的寻根思潮的出现和兴起有其历史原因,但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成本困难和理论质疑。通过时间线索的展示,

提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过程可能陷入了一种“莫比乌斯陷阱”，这是由理论之间的张力导致的连续反馈运动形成的^[29]。柯平通过“抽象—内核—价值”的思辨路线，揭示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之本来面目，凝练出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思想——要素思想、藏用思想、书文化思想、传播思想、分类思想、导读思想，并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在文化、教育、科学中的价值^[30]。

7 结语

综上所述，“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共图书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阅读推广、智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信息素养、图书馆学思想理论等六大方面。这些方面既有阅读推广、图书馆学思想理论、信息素养等传统图书馆学基本问题，也有充分彰显时代特征的选题方向，例如智慧图书馆建设、“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等。可谓传统与现代交汇、当下与未来交织、理论与实践交响、客体与主体交互，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共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围和活跃程度，显示出公共图书馆学界对于行业建设与理论探讨的自觉与担当。特别是对于“十四五”规划编制，学者牢记自身使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有益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未来一段实践公共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引领。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研究取得成绩的背后，也有不少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提升之处。

一方面是研究深度上，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开拓，以备进一步凝聚共识，推进建设进程。在中国知网上以“智慧图书馆”为关键词搜索显示，2021年度共有675篇论文，尽管如此，对于智慧图书馆仍是有许多问题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何谓智慧图书馆、智慧

图书馆内涵以及建设途径之类，众说纷纭，至今都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答案。再如对于文旅融合这一热点议题，相关论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研究深度创新性有待进一步开拓。因此，“十四五”时期，学术界需要从关注相关议题的热度转向提高研究的深度和质量。

另一方面是研究广度上，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热点过于集中，公共图书馆工作和服务一线实践问题的关注略有不足。置身新科技语境以及“十四五”开局之年，加之文旅深度融合地提出，智慧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文旅融合理所当然地成为年度研究热点，但公共图书馆学研究除了应关注这类热点问题之外，还应该认真从服务实践中发现、提炼有关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热点问题。例如公共图书馆与读者双方正当权益保障上的法律支撑、制度保障建设，目前强调读者端有余而对公共图书馆自身权益关注不足，由此还可以带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部分条目的进一步诠释与辨析；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数字化存储与利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面对修复量大、人手少、周期长等困难，如何全国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在强调使命感的同时充分激发和调动人员积极性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如，随着《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的下发，如何精准对接国有资产管理科学化、严格化、规范化要求，进一步制定出台馆藏图书文献的科学处置细则，还有待全国业界加强研究，统一认识，抓紧落实，进而合理化解长期以来制约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涨库问题。诸如此类，都是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密切相关的高度实际的问题，希望这些问题早日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通过切磋交流，集思广益，为更好推进“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许玮,王鹏涛.基于亲子阅读共同体构建的英美国家阅读推广策略研究[J].图书馆建设,2021(6):1-17.
- [2] 张鸣雨.“互联网+”背景下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12):7-9.
- [3] 吴斯曼.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人能力培育策略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12):26-28.
- [4] 伍玉伟,洪芳林,毛望平.我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空间建设实践进展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12):32-40.
- [5] 赵俊玲,王超,郑雅丹.我国阅读推广课程的百年变迁[J].图书馆杂志,2021(12):12-21.
- [6] 张潇雨,孙红蕾.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跨界合作研究[J].图书与情报,2021(3):104-112.

- [7] 王超.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生态系统模型构建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12):16-21.
- [8] 张健.《数据安全法》视域下智慧图书馆伦理规范问题研究[J].图书馆,2021(12):47-51.
- [9] 管红星,宗瑞冰.智慧图书馆的人文解读[J].新世纪图书馆,2021(10):5-8.
- [10] 杨群,黎雪松,王毅菲.区块链技术驱动智慧图书馆智慧增值服务路径研究[J].图书馆,2021(1):40-48.
- [11] 刘慧,陆康,王圣元.智慧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及其职能体系构建[J].图书馆建设,2021(6):114-120.
- [12] 吴建中.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机遇、挑战和创新[J].图书馆杂志,2021(12):4-11.
- [13] 张孝天,申晓娟.从新的人口环境看“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1(6):9-21.
- [14] 严贝妮,李晓旭.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十四五”战略规划探赜[J].图书馆建设,2021(4):1-12.
- [15] 屠淑敏.“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环境分析和战略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1(2):3-12.
- [16] 彭松林.“十四五”期间省级图书馆转型发展的宏观环境与目标任务分析[J].图书馆,2021(8):1-9.
- [17] 吴丹,郭清玥.“十四五”时期图情学科愿景展望:基于全球战略蓝图的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21(3):14-26.
- [18] 王世伟.“十四五”时期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应具备的五大指向[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1):1-5.
- [19] 马玲.公共图书馆“文创+旅游”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10):100-104,109.
- [20] 杨凡.文旅融合下公共图书馆研学活动问题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报,2021(10):25-27.
- [21] 张新勤.我国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述评[J].河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5):121-128.
- [22] 李健,任竞,张怡宁等.我国公共图书馆跨界合作的现状与问题[J].国家图书馆学报,2021(3):3-12.
- [23] 刘军,林英.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5):66-128.
- [24] 石庆功,王春迎.公共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制度建设:驱动要素、内容框架及路径选择[J].图书馆建设,2021(4):53-60.
- [25] 崔庆林.面向全民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公共图书馆大有可为[J].图书馆杂志,2021(5):104-109.
- [26] 于喜展.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型与运行条件[J].图书馆杂志,2021(1):67-92.
- [27] 张久珍.图书馆.培育全民数字素养的阵地[J].图书馆论坛,2021(12):6-7.
- [28] 武洪兴,赵大志.图书馆去中心化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1):43-49.
- [29] 魏辅轶.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跨世纪的三次“重逢”与“莫比乌斯”陷阱[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251):34-46.
- [30] 柯平.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抽象、内核与价值[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6):4-17.

作者简介: 杨婷,南京图书馆馆长办公室业务主管,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宣传与推广。

收稿日期: 2022-05-05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异域采风 ·

靶向、扎根与嵌入：2008—2018 年美国选民对于图书馆认知与资助意愿的转变及启示^{*}

朱华顺

(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文章解析了《从意识到资助——2018年选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与支持》研究结果，发现多数美国选民认可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但资助图书馆的意愿有所减弱。与2008年《从意识到资助——美国图书馆支持研究》结果对比发现，选民对于图书馆的职能认知发生转变：图书馆作为社群联系、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中心渐成共识，由此也带来了选民对于图书馆需求与使用的转变。文章从提高图书馆服务与营销的靶向性、扎根社区服务地方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图书馆公共服务职能以嵌入国家发展战略三个维度展开对于上述转变的审视与把握。

关键词：美国；图书馆；选民；FATF；公共服务职能

中图分类号：G259.712

文献标识码：A

Targeting, Rooting and Embedding: the Change and Inspiration of American Voters' Perception of Librarie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Fund Libraries from 2008 to 2018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 Voter Perceptions and Suppor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2018*, finding that most American voters cherish the social value of libraries but their willingness to fund libraries has weakened. Comparing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2008 *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 A Study of Library Support in America*, the voters' 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functions have changed, libraries as a community connection, knowledge learning and skill training center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consensus; by which has also brought about a change in the voters' needs and use of libraries. The review and grasp of the changes wer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targeting of library services and marketing, rooting in the community to serve local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the libraries' public service to engage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American; library; voter; FATF;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2008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开展了面向全美选民资助图书馆的认知、态度及动机的调研，并发表了研究结果《从意识到资助——美国图书馆支持研究》(*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 A Study of Library Support in America*, 以下简称“FATF 2008”)^[1]。2018

年，OCLC联合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及其分支机构公共图书馆协会(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PLA)再次开展调查，研究十年间美国选民对图书馆认知与资助意愿的转变，并发表了研究结果《从意识到资助——2018年选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认知与支持》(*From Awareness*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美国大湾区图书馆转型发展新业态：案例研究与机理洞察”(项目编号：GD20XTS03)的研究成果之一。

to Funding: Voter Perceptions and Suppor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2018, 以下简称“FATF 2018”)[2]。

FATF 2008的调研对象为总人口数在300 000或以下区域的18至69岁的选民, FATF 2018在此基础上将总人口数在300 000以上区域的18至69岁的选民也纳入调研对象范围, 对比发现二者结果并无显著差异。FATF 2008的调研问题围绕着如下主题展开: 人口特征、投票行为、投票资助图书馆的可能性、使用图书馆服务、对于图书馆的态度、对于资助资金的态度、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重要性比较、对于图书馆及馆员的评价、关闭图书馆所带来的影响认知。FATF 2018在此基础上将主题延伸至: 对于图书馆新型服务的认知与利用、图书馆网站的访问率、图书馆对于社区发展的影响、图书馆及馆员的细分评级、对于资助资金的认知、对于图书馆筹款活动的贡献。

1 FATF 2018 研究结果

围绕上述主题, FATF 2018设计了5大类型的调研问题: 图书馆访问者及其使用的服务、重要性、描述性、同意程度、对于图书馆及馆员的正面评价。其中, 图书馆访问者是指在过去一年中访问过图书馆的人, 而使用服务是指访问者在过去六个月中使用过的图书馆服务。其余4大类型的问题均采用十分评分制(1为最低, 10为最高)进行计分统计, 分值为8、9、10的回答计入正面评价。例如, 当问及“A(指代具体问题或陈述,下同)对于图书馆/馆员有多重要”时, 总计有1~10个数值供选择, 选择为8、9、10的回答纳入“A对于图书馆/馆员很重要”的计分范围。具体示例如表1所示。

表1 FATF 2018 评分制问题

问题类型	关键词	示例问题	评分值
重要性	重要、重要性	A 对于图书馆/馆员有多重要?	1(一点都不重要)~10(非常重要)
描述性	描述、视为、相信、确认、感觉、认可	B 对于图书馆/馆员的描述程度?	1(描述得一点都不好)~10(描述得非常好)
同意程度	同意、感觉、视为、相信	我愿意支付更多的税款作为地方公共图书馆的运营成本	1(非常不同意)~10(非常同意)
正面评价	—	请对您所在区域的公共图书馆/馆员做一个总体评价	1(不满意)~10(优秀图书馆/馆员)

FATF 2018结果发现, 多数选民与图书馆有着积极的联系并认为图书馆是一个有用(useful)、有价值(valued)的社会机构。地方、社区对于图书馆资助仍然支持态度, 但是资助的意愿有所减弱。

1.1 多数选民认可图书馆的价值

55%的选民视公共图书馆为必不可少的地方机构, 53%的选民视之为社区自豪感的来源, 58%的选民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提高教育水平, 51%的选民认为图书馆可以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约一半(49%)的选民同意, 即便在互联网时代, 公共图书馆仍然是宝贵的社区资源。多数选民重视图书馆的基础服务, 包括: 提供工作或研究的安静场所(60%)、免费提供图书与技术服务(61%)、服务可及性(66%)、免费提供计算机与互联网服务(61%)、馆藏资源的丰富性(65%)、提供免费WiFi(64%)。在过去一年中, 70%的选民走进了公共图书馆, 52%的选民访问了公共图书馆网站。

1.2 图书馆的社区性越发重要

48%的选民认为图书馆所提供的丰富活动是其他社区机构无法比拟的, 44%的选民认为图书馆是社区成员聚会的场所, 30%的选民视图书馆为当地社区中心。在过去一年到访过图书馆的选民中, 37%的人参加了社区会议, 33%的人于过去六个月中参加过图书馆组织的活动。

1.3 选民对于图书馆的认知和利用与其资助图书馆的意愿不一致

虽然多数选民认可图书馆的价值, 且与图书馆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但是这种积极的认知态度和利用行为并未完全转化为资助图书馆的承诺。仅有27%的选民表示, 他们肯定(definitely)会投票资助当地图书馆, 另有31%的选民表示他们可能(probably)会投票资助。此外, 仅有35%的选民愿意支付更多的地方税款来为图书馆提供资助, 19%的选民不同意支付。

1.4 选民不清楚公共图书馆的资金来源

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nstitute for Museum and Libraries Services)的数据显示, 86%的公共图书馆资助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3]。然而, FATF 2018研究结果却显示, 59%的选民认为图书馆的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非地方层面。

1.5 选民支持联邦资金资助图书馆并乐于接受图书馆的筹款活动

37%的选民认为联邦资金对于图书馆的资助太少了, 29%的选民认为刚刚好, 另有29%的选民表示不确定。展望未来联邦资金资助, 约3/4的选民认为联邦政府应当增加公共图书馆的资金资助(38%)或保持不变(38%)。多数选民(61%)为支持当地图书馆的筹款活动作出了贡献(28%)或愿意为此作出贡献(33%)。

2 FATF 2018 与 FATF 2008 结果比较

FATF 2018结果显示, 越来越多的选民视图书馆为社群联系、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的中心。同时, 选民对于图书馆的认知态度和利用行为均有所弱化, 投票资助图书馆的意愿有所减弱。尽管多数选民表示肯定或可能会投票资助图书馆, 但是这一百分比已从2008年的73%下降至2018年的58%。

2.1 图书馆逐渐成为社群联系与终生学习的社区中心, 但其社区价值与关联性认知下降

相较于2008年(34%), 2018年更多的选民(43%)视图书馆为“提供社区中其他地方没有的活动和娱乐的场所”, 且越发认同此角色对于图书馆的重要性(2008年38%, 2018年48%)。与之类似, 2018年44%的选民视图书馆为“社区中居民聚集和社交的场所”, 而2008年这一百分比仅为35%, 且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这是图书馆的重要角色(2008年36%, 2018年45%)。2008年, 73%的选民同意“拥有一个出色的公共图书馆是自豪感的来源”, 而在2018年, 仅有53%的选民表示同意。与之类似, 2008年, 71%的选民同意“关闭图书馆意味着重要东西缺失”, 而到了2018年, 仅有55%的选民表示同意。2008年, 63%的选民认同“公共图书馆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2018年仅有46%的选民表示同意。

2.2 图书馆的工作技能培训 and 语言学习辅导功能更受认可, 技术服务需求增加

相较于2008年(35%), 2018年更多的选民(42%)认可图书馆“帮助培养职场所需的工作技能”。同时, 2018年35%的选民认可图书馆“为移民和非英语母语的人提供了学习课程、项目和材料”, 相较于2008年的25%有所增加。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发展, 相较于2008年, 2018年更多的选民倚重图书馆的技术与互联网服务。“视无线互联网为图书馆重要服务”的选民从2008年的39%跃升至2018年的

64%。尽管多数选民仍然视图书馆为技术中心,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 认同值在下降。认同“对于某些群体而言, 图书馆是获取计算机与网络互联的唯一场所”的选民, 从2008年的79%下降至2018年的62%。认同“公共图书馆在跟上不断变化的技术方面做得很好”的选民, 从2008年的60%下降至2018年的48%。

2.3 图书馆及其网站的访问率下降, 部分传统服务的使用率下降

图书馆的访问率从2008年的79%下降至2018年的70%。图书馆网站的访问率从2008年的77%下降到2018年的52%。图书馆的年均访问量从2008年的13.2次下降到2018年的8.6次。尽管仍然受欢迎, 部分图书馆传统服务的使用频次在下降, 包括: 成人阅读的非小说类书籍(2008年67%, 2018年53%), 小说或畅销书(2008年63%, 2018年54%); DVD(2008年51%, 2018年45%); 纸质参考资料(2008年51%, 2018年34%); 计算机检索(2008年47%, 2018年40%); 复印(2008年48%, 2018年39%)以及英语学习(2008年42%, 2018年27%)。

2.4 图书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认知下降

2008年, 71%的选民同意“图书馆是儿童获得功课帮助的绝佳资源”, 而到了2018年, 仅有51%的选民表示同意。2008年, 53%的选民同意“公共图书馆在帮助儿童做好学前准备方面做得很好”, 而到了2018年, 仅有44%的选民表示同意。2008年, 24%的选民认为“图书馆在儿童的生活中不像从前那样重要”, 而到了2018年, 这一百分比上升至36%。

2.5 图书馆核心服务的价值认知下降, 图书馆员的认可度下降

图书馆的核心服务尽管仍然受到多数选民的重视, 但其价值认知在下降, 具体表现为: 认为图书馆“免费提供图书与技术服务”的百分比, 从2008年的70%下降到2018年的61%; 认为图书馆“免费提供计算机与网络互联服务”的百分比, 从2008年的68%下降到2018年的61%; 认为图书馆“提供工作或研究的安静场所”的百分比, 从2008年的67%下降到2018年的60%; 认为图书馆“拥有满足社区需求的称职馆员”的百分比, 从2008年的57%下降到2018年的49%。相较于2008年, 除了“为非英语母语的人提供帮助”(从2008年的23%上升至2018年的29%), 选民对于

图书馆员的认可全面下降,具体表现为:认同图书馆员是“友好且平易近人”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67%下降至2018年的53%;认同图书馆员是“终生学习的真正倡导者”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56%下降至2018年的46%;认同图书馆员“了解我的社区”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54%下降至2018年的42%;认同图书馆员“了解社区需求以及如何通过公共图书馆解决这些需求”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48%下降至2018年的42%;认同图书馆员“拥有出色的计算机技能”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50%下降至2018年的42%;认同图书馆员“在社区中被广为人知”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40%下降至2018年的31%。

3 结论与审视

十年间,美国选民资助图书馆的意愿减弱,已成为事实,长远来看还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虽然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但见微知著,上述事实与趋势不得不引发我们的重视与思考。对于这种转变的审视,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

3.1 靶向——提升服务与营销的精准度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调查报告《图书馆2016》(*Libraries 2016*)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并不清楚图书馆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4]。以儿童教育项目为例,美国公共图书馆在此领域投注了大量资源^[5],然而FATF 2018的结果却显示,选民对于图书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认知在下降。这其中有学龄儿童课余时间减少、移动智能终端占据儿童注意力等客观原因^[4],但如何提高图书馆服务与营销的靶向性,成为公共图书馆在“注意力分散时代”下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难题: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知识服务快速增长,不断瓜分人们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从而带来了人们信息交流与知识获取方式的急剧转变,对于图书馆作为主要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地位带来了较大冲击。从FATF 2018的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图书馆及其网站的访问率、传统服务的使用率,还是对于图书馆核心服务的价值认同、图书馆员的认可度,均全面下降。

移动互联技术是移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产物,移动互联网构建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时随地

接入互联网并获取自己所需信息和服务的移动互联环境。移动互联环境,指向了用户的信息获取路径、检索方式、阅读习惯的嬗变,从本质上看,更指向了人们关注域、情感状态与生活方式的移动化转向^[6],是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投射于个体的必然产物。已有的研究表明,移动互联网已成为移动智能终端用户的主流信息渠道,移动智能终端用户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行为存在着碎片化与泛在化特征,微信应用、视频观看、音乐欣赏已成为移动智能终端用户的日常操作,VR/AR的应用开始渗透至人们工作生活中^[7]。上述转变及其特性,无不昭示着图书馆服务与营销的重心从PC端向移动端的转移。健全移动服务平台、建立自适应网页设计的门户网站、增加语音与图片搜索功能、加强VR/AR应用研究、建立交互式视频直播平台、建立分布式移动借阅体系等,或是移动互联环境下图书馆融合移动互联技术,创新图书馆的服务业态与传播方式,进而提升服务与营销精准度的可行之举。

3.2 扎根——助推地方数字经济发展

FATF 2018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选民视图书馆为社群联系、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的中心。这是美国公共图书馆持续耕耘社区的结果,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FATF 2008开展研究之时正值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之际^[8],危机期间民众优先关注自身生存及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发展退为次要^[9]。美国公共图书馆及时调整方向,整合、开发了相关资源、项目以扶持求职者、失业者与小企业主,助力地方经济复苏。2020年3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因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实施封禁时,该州里奇兰图书馆(Richland Library)不仅在图书馆停车场提供免费WiFi,还为当地需要上网的家庭提供便携式WiFi热点服务。在提供在线社交服务如虚拟读书俱乐部、在线故事会和社交媒体网络服务的基础上,该馆还通过电话咨询和网络会议协助当地居民和小企业主申请政府失业救济和小企业救济资金^[10]。反观我国图书馆界,疫情期间公共图书馆开展的线上服务多以资源推介、文献传递、阅读推广等传统服务项目为主,对于数字素养教育、数字技能培训等新兴服务项目较少涉及。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加速普及,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数智社会建设新阶段,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公民立足数智时代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11]。因具备独特的数字资源优势与丰富的信息素养教育经验,图书馆长期以来被视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的理想场所。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2020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数字技术政策中的图书馆:政策领域、机制与实践》(*Libraries in Digital Skills Policies: Policy areas, mechanisms, practices*)指出,图书馆可在基础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技能、高级ICT技能、实用型数字技能以及媒介信息素养四个领域支持公民数字技能建设,同时提出以终身和非正式学习、现有基础设施利用、第三方教育资源的访问获取、数字技能学习工具/平台创建等具体措施支持公民数字技能建设^[12]。发挥图书馆行业的资源优势与教育传统,通过网络环境与数字设备的供给、数字资源的组织与整合、实用数字技能的教育与培训、信息弱势群体提升计划等路径普及与提升公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进而助力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是公共图书馆在数智时代扎根社区、服务地方的重要切入口。

3.3 嵌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为了争取更多资助,ALA发起了“资助图书馆运动”(Fund Libraries Campaign, FLC),通过与主流媒体合作推介图书馆、邀请国会议员参观图书馆、应用社交媒体扩大图书馆影响力等方式向公众全方位展示图书馆在服务社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13]。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效,2016年,来自22个州的选民投票通过了122项图书馆资助表决(总数150项,投票通过率为81%)^[14],2017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27项(总数133项,投票通过率为95%)^[15]。FLC是ALA近年来不断强化图书馆公共服务职能并逐步嵌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思路的延续与扩展,即以图书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融入国家发展战略^[16],在提升图书馆关注度与影响力的同时为图书馆赢取

更多资助的可能。

《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提出以“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为路径,建设“公共事务服务中心”^[17]。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承接并全程参与了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遴选出969个“一级图书馆”、519个“二级图书馆”和1034个“三级图书馆”^[18]。2021年7月27日,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第七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研制工作会^[19],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工作步入了有序化、常态化的发展轨道。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我国公共图书馆已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宝贵经验并不断走向纵深。

从2007年开始,杭州图书馆通过社会化合作的方式探索主题图书馆建设,先后与企业、社会机构、学校等合作建成主题图书馆27家,涵盖杭州10个区、县,形成了主题图书馆的杭州模式^[20]。主题分馆以“融合发展”“合作共赢”为建设理念,27家主题分馆的功能定位、空间设计、室内装潢、馆藏资源、文娱活动等各具特色,做到了一馆一主题、一馆一特色。其中,不少主题分馆在全国甚至是世界成为了“首例”:电影分馆、音乐分馆、佛学分馆均为国内首创;城市学分馆为我国第一座以“城市学”命名的特色图书馆;环保分馆是全球第一座在垃圾场上建造的图书馆^[21]等。广州黄浦区图书馆结合当地创业园区、高新企业聚集的优势,精准引入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总分馆制建设,创新“政府主导资源补给+园区企业自主运营+社会参与”的分馆建设模式^[22]。在实施过程中,由黄浦区政府提供馆藏资源及部分启动资金,黄浦区图书馆提供业务技术指导,园区企业配套投入场地、设施及建设资金。以此为基础,通过众筹的方式吸纳更多企业、自然人等社会力量投入资金共建分馆,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与社会力量主体效益共同提升的双赢局面^[23]。

参考文献:

- [1]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A Study of Library Support in America[EB/OL].[2022-05-08].
<https://www.oclc.org/content/dam/oclc/reports/funding/fullreport.pdf>.
- [2]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Voter Perceptions and Support of Public Libraries in 2018[EB/OL].

- [2022-05-08].<https://www.oclc.org/research/awareness-to-funding-2018.html>.
- [3] Institute for Museum and Libraries Services.Public Libraries Survey[EB/OL].[2022-05-08].<https://www.ims.gov/research-evaluation/data-collection/public-libraries-survey>.
- [4] Pew Research Center.Libraries 2016[EB/OL].[2022-05-08].<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6/09/09/libraries-2016>.
- [5] MILLER C,KATHRYN Z,LEE R,et al.Parents,Children,Libraries and Reading[EB/OL].[2022-05-08].<https://www.pewinternet.org/2013/05/01/parents-children-libraries-and-reading/>.
- [6] 郭溪川,卢垚,袁雪,等.基于移动社交网络的图书馆信息服务思考与创新[J].数字图书馆论坛,2017(1):57-60.
- [7] 刘玉静,张晓青.移动智能终端用户的信息行为特征及对图书馆建设发展的影响[J].情报资料工作,2018(4):89-94.
- [8] Wikipedia.Great Recession[EB/OL].[2022-05-08].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Recession.
- [9] BISHOP B.Americans Have Lost Faith in Institutions.That's Not Because of Trump or 'Fake News'[EB/OL].[2022-05-08].<https://www.newsday.com/opinion/commentary/americans-have-lost-faith-in-institutions-that-s-not-because-of-donald-trump-or-fake-news-1.13205825>.
- [10] Richland Library[EB/OL].[2022-05-08].<https://www.richlandlibrary.com/>.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2-05-08].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2]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Libraries in Digital Skills Policies:Policy areas, mechanisms, practices[EB/OL].[2022-05-08].https://www.ifl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assets/hq/topics/info-society/documents/libraries_in_digital_skills_policies.pdf.
- [13]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Fund Libraries Campaign[EB/OL].[2022-05-08].<http://www.ala.org/advocacy/fund-libraries>.
- [14] KATHY R,KELSEY H.Referenda Roundup 2016:How States Performed on Library Measures[EB/OL].[2022-05-08].<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7/01/03/referenda-roundup-2016/>.
- [15] JOHN C,ERICA F.Breaking Records at the Polls:Budgets & Funding[EB/OL].[2022-05-08].<https://www.libraryjournal.com/?detailStory=breaking-records-polls-budgets-funding>.
- [16]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Policy Revolution! Initiative[EB/OL].[2022-05-08].<http://www.ala.org/advocacy/revolution>.
- [17]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印发《中国图书馆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2-05-08].<http://www.lsc.org.cn/contents/1299/15358.html>.
- [18] 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图书馆名单的通知[EB/OL].[2022-05-08].http://www.gov.cn/xinwen/2018-08/28/content_5317052.htm.
- [19] 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研制工作会召开[EB/OL].[2022-05-08].<http://www.lsc.org.cn/contents/1342/15336.html>.
- [20] 柯平,袁珍珍,张畅.主题图书馆的中国实践[J].图书馆建设,2020(1):8-15.
- [21] 浙江政务服务网.这一次,主题图书馆也有了杭州模式[EB/OL].[2022-05-08].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19/12/17/art_812262_41073709.html.
- [22] 广州文明网.广州黄埔创新探索总分馆建设路径助建“图书馆之城”[EB/OL].[2022-05-08].http://gdgz.wenming.cn/gqcz/qxdt_hp/201811/t20181126_5564871.htm.
- [23] 广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102.

作者简介:朱华顺,硕士,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信息服务。

收稿日期:2022-05-24

本文责编:郑秀花

· 异域采风 ·

公共图书馆播客品牌构建与营销策略研究

——以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Shelve Under* 播客品牌为例

曾 婕

(湖南省图书馆 湖南长沙 410001)

摘 要: 播客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兴起、萎缩、停滞三个历史阶段,现又逐渐走入复苏时期。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升级与快餐式阅读消费的广泛流行进一步突显了音频媒介可随性收听的优势,播客平台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详细阐述了播客的突出优势、国内发展现状及面临挑战等,对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播客品牌 *Shelve Under* 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其品牌构建与营销特点,以期给国内公共图书馆创新音频服务提供参考,推动听力资源更好地融入大众的学习和生活。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播客;有声阅读; *Shelve Under*; 品牌构建; 多伦多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Brand Construction and Marketing Strategy of Podcast of Public Libraries: Taking the *Shelve Under* Podcast Brand of Toronto Public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Podcasts are a product of the Internet age. Since its birth, 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rising, shrinkage and stagnation, and is now gradually entering a period of recovery. The continued upgrad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of fast-food reading further highlight the strengths of the audio medium for spontaneous listening, presenting a new opportunity for podcast platform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dcast,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its brand-building and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aiming to guide innovative audio services in China's public libraries. Our goal is to integrate hearing resources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ublic.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podcast; audio reading; *Shelve Under*; brand-building; Toronto

互联网语境下的“播客”不仅指向特定资源,还可指代制作电台声讯节目的方式与使用这种传播方式的一类用户。与当下随处可见的直播收听不同,播客作为一种数字传播技术,允许听众下载复制媒体文档,收听时间、地点、方式的自由选择度更高。它还支持RSS聚合推送,用户可上网浏览、搜索、试听不同主题的音频并订阅感兴趣的播客频道,基于精准推送实时知晓新增的资源内容,信息的时效性价值提升。无论用于知识分享或是宣传报道,播客的功能都

得到了客观体现,时至今日它已广泛用于各个行业领域,对人们的专业学习、休闲生活等产生了重要影响。2021年6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播客”入选2020年高频词语范围^[1]。*Shelve Under*是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Toronto Public Library,以下简称“TPL”)2018年创建的播客频道,它以图书导读为基础节目、鼓励读者分享原创作品、基于功能对比选择资源发布平台并为了制作优秀作品专门建造了音频工作室。笔者对*Shelve Under*播客品牌的创建及运营进

行分析,有助于国内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播客女发展之路。

1 播客的特点及国内发展现状

1.1 播客的突出优势

1.1.1 作品录制简单便捷

播客作为一种新的现代传播媒介,迄今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些年网络主播作为一项新型职业,流行于各大年轻群体中,观看收听音视频成为人们十分重要的学习休闲行为。探究播客风靡世界的起因,作品录制简单便捷是一大缘由,也是其突出优势。只需要包含麦克风功能的设备,如计算机、智能手机、录音笔等,人人都可以成为播客。这些设备价格并不高昂,降低了身份资质准入门槛,与此同时,录播及音频制作软件、工具日渐丰富,多机多用、无损格式、支持热门站点录制等功能一应俱全,部分软件还提供主播收藏、自动录制、开播检测,无需实时监测,在录制过程中避免投入过多的精力用于设备管控,大大降低了录制难度,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够加入创作者阵营。依靠新技术下的软硬件产物,原本就简单便捷的录制工作将变得更加高效、省力、经济。

1.1.2 信息共享性较强

从全球范围内看,绝大多数地区对广播都进行严格管控,个人或社会团体几乎无法获得广播许可证,播客却使得“成为广播人”的想法成为了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学习经历、生活感悟、情感故事等制作成播客主题节目放置于网络分享给他人,随着作品影响力的提升,它还可在不同的国度内得到广泛传播。播客的信息共享优势还体现在双向交流互动和动态更新两个层面:播客的传播虽然是单向,但国外发布者通常会将其与推特、脸书等关联,新内容发布与信息接受会在多个平台同步,支持快速跳转与推流地址解析下载,加深了创作者与收听者的双向交流互动;播客的发布本身采用RSS技术以日志形式完成,根据用户的订阅内容和客户端软件功能,新发布的节目能够实现自动化简单聚合,用户将自动接收他人最新分享的作品,无需进入站点多次点击浏览,信息共享程度提升且省去了频繁操作环节。

1.1.3 订阅自由,推送及时

现代快节奏的学习及娱乐生活中,人们时常面临碎片化时间无法充分利用的困境,也总是渴望“一心多用”的高效率行为。播客的出现实现了从文字记录到声音描绘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解放了过去用于阅览印刷型书刊或电子屏幕的双眼,推动资源使用方式的转变。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安静地收听收音机是日常生活中不可获取的一项内容。为了收听到感兴趣的节目,他们不得不长时间锁定某个电台,持续进行播放,真正的节目时间有限,前后多半为无关内容甚至是大量营销广告,消耗时间精力,严重影响收听体验。播客作为新型广播,使得听众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须迁就于电台节目的固有安排。它具备可选择、可订阅、可推送等优势,收听音频的时间、地点与内容完全由听者自己掌控,且超越了物理空间限制,可实现全球的广播电台同时锁定,频道定制与推送功能操作简单、反馈及时。

1.1.4 支持个性化发展

有别于收听电台讯息的传统音频资源利用方式,播客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特质。前者采取的是基于平台的内容分发方式,即创作者先制作音频作品,而后上传至指定服务器,通过平台审核与编辑后完成公开发布,平台出于经济利益或根据受众群体大数据得出的喜好分析,总是会对作品进行一定的调整,导致不少作品出现“共性”,同质化现象相对普遍。专业播客的发展则具有更强的个性化特征,首先是内容表达上,播客创作受限较少,作品的观点表达充满个性化特色;其次,用户与创作者的连接方式更加自由,基于泛用性订阅方式,用户只需添加自己感兴趣的播客作者RSS地址便能直接同其建立点对点的订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平台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内容获取的个性化^[2]。

1.2 播客在国内的发展现状

最早期的中文播客“反波”(Antiwave)诞生于2005年,按该历史节点计算,播客在国内的发展已超过15年时间。据专业播客搜索引擎ListenNotes统计,截至2022年5月2日,全球有超过283万个播客。其中,仅2020年一年就新增了超过95万个播客,而2021年新增播客数也有约90万。行业跟踪机构Omdia估计,到2025年,全球播客听众将从2019年的8亿增长到20亿。近些年互联网巨头相继加入播客阵营,如喜马拉雅在2020年8月上线了独立播客频道,其他如字节

跳动、腾讯、快手等企业也于2020年相继开发了专门的播客APP,播客聚合型平台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除老牌的荔枝FM、喜马拉雅、懒人听书等,新兴的产业品牌海盗电台、小宇宙、网易云等也加入了战局,综合性文化播客成为众多平台重点扶持的对象。由于互联网技术及网络传播媒介的跨越式发展,国内的网络用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忽略了在欧美地区十分流行的播客。短视频的崛起一方面刺激了人们的视觉接纳,另一方面则反向催生了大批“声音信息”的爱好者,听众数量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音频制作专业机构也加上了播客创作者标签,受众群体的扩大推动着播客们积极探索主题兴趣点。专业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与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PUGC)激增,使得国内的播客产业市场朝向繁荣态势迈大步。

2 播客面临的挑战

2.1 运营平台层面

《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大报告》显示,音频收听类APP的手机激活用户已达到10亿规模,喜马拉雅、蜻蜓FM、荔枝FM、酷我畅听等排名靠前,它们也是国内较早涉及播客业务的聚合类音频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平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用户群体,但其存在一个显著问题,即绝大多数用户是网络音乐、电子书的忠实听众,电台播客通常被埋没于这些类型的音频内容中,难以被有效发掘。在短视频病毒式壮大的冲击下,众多音频平台也以维稳现有用户规模为目标,在资金及人力物力的投入上,明显倾向于有声书领域,对播客的建设力度有限,播客内容生产、传播过程、上传分发响应速度等未能得到平台方重视。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传统的去平台化内容消费形式播客相继走向没落,RSS地址订阅逐渐被平台频道订阅取代,而后者同付费收听及利益分配高度关联,倘若分配机制不合理不透明,会使播客主显得更加被动、边缘,或是投身于其他音频平台的建设,或是直接放弃播客事业。

2.2 创作主体层面

有声阅读在国内娱乐消费市场正慢慢具备成熟化特征,其依靠文字文本、音乐特效及增添了情感演绎的朗读,形成了有声书流程化创作,加之版权日益

受到业界重视,付费听书成为当前新的发展趋势,也带给创作者更大的经营动力。播客与有声书行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在创作主体层面,对于新生播客主而言,专业制作技能及传播知识的不足导致频道收听人数过少,不仅打击工作热情,也进一步加剧了播客行业的头部效应;资质较为年长的播客主则一直在想方设法维持节目的运营,一方面需要吸引新用户喜欢上节目内容进而订阅频道,另一方面还得保持老用户的使用黏性,增加他们的忠诚度并为频道的建设优化提供建议。播客主的创作还需要资金支持,但由于没有版权收入,他们只能采取商业变现模式,利用口播广告、会员专享节目或线下周边产品售卖等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节目自主性,避免商业化的过度侵蚀是创作者们面临的强力挑战^[3]。

2.3 内容形式层面

2020年普利策新闻奖首次设立“音频报道奖”,这是声音进入顶级新闻评论界的标志,也意味着新闻播客凭借优质的内容与新颖的形式获得了大众认可。同年9月荔枝FM上线了“助眠”直播频道,然而其音频内容并非轻音乐欣赏与惬意的散文朗读,而是低俗违法的色情播客,在用户举报之后平台收到整改通知并被责令关闭该频道,其他包含违规内容的节目也被下架。此类新闻事件的出现对国内播客产业造成了不利影响,也促使播客主们反思内容创新的方向,无论对于创作者或是听众,保证播客的知识性、纯粹性及一定娱乐性是创新的基石,不能只追求牢牢吸引用户的耳朵而不顾播客内容质量,例如以媚俗内容或极端观点博取关注度^[4]。同时,播客形式如何创新也是创作者面临的问题,除传统的猎奇故事叙事、新闻播报外,部分播客开始尝试嘉宾专访、多人自由畅聊、创意广播剧表演等,在残酷的竞争中谋求生机。

3 Shelve Under 播客品牌概况

Shelve Under播客频道由TPL的四位馆员于2018年创建,每两周开播一期。团队领导人Amanda Piekart曾在佩斯大学图书馆工作,她认为与大学生群体相比,社会民众对公共图书馆角色功能的认知仍存在误区,而播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误区并就图书馆事业展开有趣的对话。Shelve Under之前的节目

主要涵盖三个主题:首先是同多伦多儿童读书俱乐部合作的图书导读专辑,由少儿及其家长选取一本书进行内容介绍、抒发阅读感受。导读结束后馆员会告知TPL新入藏的图书,推荐听众借阅;其二是涉及图书馆服务类节目,每一集都聚焦“服务”主题,例如总分馆模式、创客空间利用、VR设备解读,热门主题还包括图书审查、多元文化、阅读疗法等,这类节目通常以对图书馆员访谈的形式进行;最后是由Amanda本人负责的信息素养教学专辑,该专辑始于2019年,音频长度从十几分钟的“迷你集”到七十分钟的专题讲座不等,主要受众群体为中小学教师与学生,内容涵盖课堂管理、课程形成性评估、信息检索技能培养等。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Shelve Under播客新增了节目主题,内容以抗疫暖心故事分享为主,突显图书馆作为精神庇护所的现实价值,同时订阅了该播客的用户还可实时收到最新的多伦多社区防疫信息,助力区域化疫情防控需求^[5]。

4 Shelve Under 品牌构建及营销特点

4.1 打造专门的图书馆媒体工作室

在创建Shelve Under播客频道之前,TPL专门挪用了馆内创客空间的一块区域,用于打造本馆的多媒体工作室。该工作室由专业音频工作室、视频工作室及剪辑演播室组成。音频工作室是Shelve Under的诞生地,音响工程师控制间是其主体单元,室内也配备了专业电容麦克风、数字录音机及动力扬声器。工作室的物理空间打造追求实用性,高质量无损音频是工作室运营目标,为此房间没有设置窗户,采用了沉重的金属门并在墙壁中嵌入大量绝缘泡沫以阻挡手机信号,消除噪音干扰。为了给播客节目的情感演绎提供支持,提升播客主沉浸式创作水平,工作室之后还新增了隔音表演空间。专业音频工作室建造完毕后,馆员开展了众多录音类业务项目,具体包括数字演示文稿的音频旁白、焦点小组访谈汇报、历史故事口述、戏剧表演、电子游戏特效音乐、有声读物赏析、无线电模拟广播及音响艺术学习等,这些声乐类项目为Shelve Under播客的成功推出进行了全面铺垫^[6]。

4.2 精准捕捉目标群体需求

基于馆藏借阅、读者活动参与等大数据并结合读者有声阅读需求调研,TPL对播客节目的主题进行

了精细化挑选,最终确定了图书导读、图书馆服务介绍、信息素养教育三大节目类型。对每一期的节目内容,播客主们也会加工整合,力求在知识性与娱乐性上达到平衡。Shelve Under上线后,TPL在其网站主页上开通了在线意见表,倾听读者呼声,收集他们的声音喜好建议并积极采纳合理部分,例如邀请Fairview分馆的辩论社团教授辩论基本技巧、邀请童书作家Rober Munsch讲解如何利用对话式阅读融洽亲子关系等。Shelve Under精准捕捉目标群体需求,不仅使音频传达更具针对性,也让播客品牌与TPL本身包容多样的形象相一致,扩大了营销辐射面^[7]。

4.3 鼓励分享原创作品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单一的生产方式,新型技术背景下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体内容制造者、传播者,音视频行业的细化及微型专业设备的持续换代更是给自我表达提供了更多机遇。对于TPL的各类型读者而言,Shelve Under不仅仅是一个播客频道,它还是交流观点、分享经历的宽阔平台。Shelve Under鼓励用户亲自制作音频内容,将创意灵感通过声音传递的形式表现出来,而非简单地参与分发机制,频道也非常热衷于推广优质的原创作品以扩大节目的开放性、参与性。原创作品的加入也让该播客品牌的“叙事类”内容开发比例增加,主题不再过度集中于泛文化泛服务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知识群体亲和性,削弱了同质化导致的用户粘性下降。

4.4 基于对比选择资源发布平台

2012年之前,国外的播客都是作为音乐APP子功能形式而存在,之后苹果公司发布独立运行的Podcast客户端,播客开始以独立身份进入大众视野。由于播客产业在国外特别是北美地区已经十分成熟,集成化软件程序可选性极强,部分播客APP甚至提供音频出版业务以满足创作者转型出版者的角色需求,因此TPL对加拿大流行的数个泛用性播客平台进行了全面对比,以基本逻辑、界面设计、播放个性化设置及近些年热门的智能语音音箱等为评价指标,最终确定了Shelve Under频道的上线APP为谷歌播客、苹果播客及新兴的Spotify,并且以Spotify作为资源重点建设与推广的平台。该平台是流媒体新晋代表,具备社交功能,通过好友的用户可以共享对方的播客列表,这意味着图书馆播客不仅能被用户独自聆听,还可发散式分享^[8]。在专属模式下,用户还可在Shelve Under与其

他图书馆播客间进行比较,打造安全又富有思考性的声音空间,在有声阅读环境中探索自我。

5 Shelve Under 品牌构建营销给国内公共图书馆带来的启示

5.1 创建音频数字图书馆,推动服务创新

时下,数字图书馆建设更多地聚焦于电子图书期刊、专业知识视频等仍需要视觉运用的资源,对音频资源建设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TPL创建Shelve Under并形成常态化播客服务机制启示国内公共图书馆应投入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于音频数字图书馆打造中,如自主制作或收集不涉及版权的OA有声图书,丰富数字图书馆资源种类,将电子资源的使用教程、公益专题讲座等制作成播客内容,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宣传图书馆功能。此外,馆员还可系统化地将图书馆规章制度、馆藏分布、资源导引、服务概况、常见参考咨询等制作成声音文件并定期更新内容,提供离线独立播放,让普通民众更好地了解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角色及清晰的运行方式,增加图书馆资源宣传路径,以声音传递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

5.2 明确播客构建目标及定位

从TPL的实践来看,Shelve Under是其根据读者群体需求及服务定位而专门打造的播客平台,通过常态化运作、音频内容质量把控及主题的实时更新等,平台逐渐成长为区域性节目品牌,节目功能也随着软硬件技术的升级而不断得到完善。国内公共图书馆今后建设播客时也应明确构建目标与服务定位,音频主题、技术应用、资源组织方式和服务对象的规划需要有所侧重,起步阶段避免过度追求大而全的建设覆盖面,否则不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导致本馆的播客特色不够鲜明。在视听资源的采集方式上,可借鉴Shelve Under的做法,鼓励广大读者提供优秀的原创作品,基于图书馆资源特点、运营馆员专业背

景、读者原创作品分类及具体的播客建设目标等选择合适的节目发布平台,创建共建共享的双赢局面^[9]。

5.3 坚持以图书导读为营销基础内容

作为隶属于公共图书馆的播客品牌,Shelve Under在上线之初便以图书导读为节目内容的基本框架,体现了图书馆崇尚阅读、提升民众文化素养的开放理念。国内公共图书馆在创建播客频道时也应考虑首先制作图书导读类作品,结合本馆的馆藏资源特色定期推广相关音频,主题可包括新书通报、借阅排行解读、书评分享及图书介绍等,在推广主题过程中有效融入亲子阅读、群体共读、对话式阅读等形式,丰富声音传递体验。总而言之,图书导读当前仍是国内大多数公共图书馆的营销基础内容,但营销手段比较单一,多半在网站主页或公众号上以图文形式发布,读者点击量不高,营销效果有限。未来有了播客的加入,读者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收听图书导读节目,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汲取文字营养。

5.4 回应社交需求,重视情感互动

学者许苗苗认为,播客在欧美地区广泛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诞生于多重交织的语境中,声音传递时常以社交形式的对谈方式构建情景语境,听友同步支援营造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构的文化语境,促使声音在听众群体间引发共情^[10]。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推动声音媒介不断发生形象转变,特别是当下智能手机、蓝牙设备的普及使得播客具备了私人订制推送的强大功能,身体缺席、情感在场的轻社交成为年轻人的追捧对象。公共图书馆运行播客,应意识到用户的长效互动需求,在聚合内容的同时突出读者群体的社交属性,重视他们的情感互动需求,积极打造播客创作者、图书馆员、读者三方交流的社交空间,例如开放节目评论功能,引入“音频弹幕”,让用户能够对特定时刻的音频内容发表意见;基于情感主题调研结果制作体系化节目,以对话形式呈现亲切聊天的社交场景,为图书馆播客营造感情丰富、讨论热烈的收听氛围。

参考文献:

- [1]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207-208.
- [2] 彭碧萍.新闻播客本质探讨及其情境化的声音景观构建[J].中国广播,2021(1):47-51.
- [3] 谢啸轩.国内播客产业兴起的动因与挑战研究[J].新媒体研究,2021(5):63-63.

(下转第86页)

· 图书馆学史 ·

单不庵与图书馆事业*

周余姣^{1,2}

(1.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天津 300387)

(2.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摘要:单不庵是清末民国期间知名的文史学者,因其过早逝世,学界对其研究不多。其少时以孝闻名,曾与蒋百里、张宗祥被誉为“嘉兴三杰”。中年时期更因其所具有的深厚校勘功力,为胡适所重。其与图书馆事业还有四段书缘,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汉籍图书室,从事中文古籍整理与编目之工作。在其逝世后,其个人藏书亦被售予当时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今浙江图书馆)。单不庵之为人行事,有古人之风范;而其读书、抄书、校书、捐书的书缘,终究在图书馆中得一精神栖息之所。

关键词:单不庵;图书馆;古籍善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Shan Bu'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bstract Shan Bu'an was a famous schola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ied young, he was never a research priority in the library field. He was known for his filial piety. He was once known as the "three masters of Jiaxing" with Jiang Baili and Zhang Zongxiang. Hu Shi valued him for his profound collating skills. He also had close ties with libraries because he had once worked at Zhejiang Library,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Chinese Library of Academia Sinica. After his death,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Library (now Zhejiang Library). His academic attitude was very much like that of ancient sages. Shan devoted his life to reading, copying, proofreading, and donating books. For him, libraries were his spiritual habitat.

Key words Shan Bu'an; library; rare book

单不庵(1877—1930年),又写为“单不广”“单不广”,初名恭修,字诒孙,号伯宽,名丕,另还有不庄、角优、常惺之名。单不庵因原籍为浙江萧山,人称“萧山先生”,是民国时期知名的文史学者。其早年曾担任浙江双山学堂堂长,嘉兴秀水学堂、开智学堂教习,后又在新式学校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堂、嘉兴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等校任教,再任职于浙江省立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汉籍图书室等机构。门下弟子有曹聚仁、施存统、丰子恺等。1930年1月13日单不庵因患脑膜炎不幸逝世,终年53岁。因其

早逝,学界对其生平与学术研究较少。本文拟介绍其生平概略,并从其与图书馆事业的四段书缘为着眼点,作一专题研究,以增进后人对其生平与贡献的了解。

1 “萧山先生”单不庵生平概略

1.1 以孝闻名

单不庵父单恩培(字沅华)、伯父单恩溥(字棣华)均以治宋学闻名。因单不庵少年丧父,伯父棣华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3)的成果之一。

先生又仅有一女单士厘(1858—1945年),单不庵兼祧二房,为此堂姐单士厘与单不庵极为亲近。单士厘为钱恂(字念劬,1853—1927年)夫人,二人对单不庵多有照拂。1894年,年仅17岁的单不庵即在家中设馆授徒。1901年补博士弟子员,获第一。1906年3月,单不庵协助当时在日本考察宪政的堂姐夫钱恂编译政治书籍,在日本驻留半载。这是其难得的出国经历。

据其学生曹聚仁记述,单不庵曾“割股疗母疾”,当时被认为是大孝的行为^[1],因此以孝闻名乡里。

1.2 “嘉兴三杰”

单不庵与蒋百里、张宗祥交好,曾有“嘉兴三杰”之誉^[2]。蒋百里述三人交往之事时,曾道:“时塾中即闻有单伯宽者,讲道学,讲道学云者,含有作伪、不合时之义,非佳名也……而伯宽丁忧,又籍属绍兴,无由见。是岁冬,自上海辍学返,始躬访之。伯宽授余以《近思录》,余之知有宋学,伯宽教之矣;冷僧(张宗祥)之识伯宽,余实介之。”^[3]张宗祥在《述蒋君百里》亦称:“而百里又介予,与单君丕(不庵)为友,不庵治宋学,言必拱手,行必矩步,予苦之,不愿接见,强之再,卒成好友。”^[4]张宗祥、单不庵二人时常互借抄校,如单不庵向张宗祥借其影宋本《隋书经籍志》作校勘^[5]。

1.3 胡适“最可敬爱的朋友”

单不庵擅考据学,长于校勘,与胡适相交,为其所重。《胡适文存三集》自序中说及:“又如单不庵先生的几篇文字(卷四,页四八九~五三一;卷七,页九五四~九五七;卷八,页一〇九九~一一二一),是因为不庵死后他的遗文尚未收集印行,我把这些稿子收存在这里,纪念一个最可敬爱的朋友。”^[6]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亦收录有单不庵致胡适书信7通。其中的第4通用“浙江省立图书馆”用笺,落款时间为“十七、六、二一”,即1928年6月21日,此函主要内容是单不庵与胡适商讨将此前二人往返的8封书信并欲附在文后发表的事。此前,单不庵曾向胡适约稿。1928年4月30日胡适致函单不庵,内容如下:“不厂先生:送上短文一篇,不知可充图书馆杂志的篇幅否?我对于校勘是外行,千万请老兄如实指正,其中引段玉裁的话,请代为一覆校。杨立诚兄处,乞代为致意。前允代办西文参考书,因十分忙碌,竟未及办,十分抱歉。适之。十七 四 卅。”^[7]1928年5月

7日单不庵回书:“大著允登馆报,欣幸无已,敬谢敬谢。”此文当是胡适的《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8],文末还附有胡适、单不庵往来论学书信9封(比原来二人讨论的8封书信又多1封),这些信函的时间是1928年5月7日至7月20日(该文于当年8月发表)。

在胡适《拟“整理国故”计划》中,其拟请单不庵整理欧阳修之书^[9]。二人曾撰有《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本跋》^[10]。单不庵在该跋中述及:“这书本有适之一跋,考订已极明白,我既手钞一通,曾告之,愿把这书与正编详细对照一下,作一长跋。因循两月,有志未逮。今适之催我交卷,我无法塞责,只得就钞书时所见到的写此短篇,将来也许能重做一篇。”^[11]可见,二人交往频密,关系匪浅。

2 单不庵的四段图书馆职业生涯

2.1 初任浙江省立图书馆校理(1912—1919年)

1912年,钱恂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到任之后钱恂及其夫人单士厘一同检点文澜阁《四库全书》,编成了文澜阁缺书目录。1915年钱恂主持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乙卯补抄”),请单不庵到馆担任校理。钱恂之弟钱玄同后在单不庵的追悼会上回忆,自民国元年(1912年)到八年(1919年),“先兄在北京邀集浙江同乡,集资补钞,即请单先生在杭主持其事。单先生那时悉心蒐求,以事补钞,又在旧书坊中买回太平天国以前窃售的旧抄也不少。他有时一边还兼着教课,但他的主要工作则全在图书馆方面。故此期可说是单先生最尽力于图书馆的时期。”^[12]

其所补抄的书籍,具体不详,今可见其《跋补抄文澜阁书六种》^[13]一文,补抄有:明黄道周《易象正》、明张次仲《待轩诗记》、清芮长恤《纲目分注拾遗》、宋岳珂《金陀续编》、宋朱翌《猗觉寮杂记》、清阎若璩《潜邱劄记》。此为其与浙江省立图书馆之前缘。

2.2 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并负责中文图书整理(1920—1925年)

单不庵于1915年在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之时,即被视为“来自北京、上海的新思想正是沿着单不庵这位所谓守旧教员的人际网络,以我们难以察觉的方式将新文化迅速传递到地方。这位在地的硕学宿儒凭借其

火种的‘普罗米修斯’”^[14]。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波及杭州后,单不庵因与其他教员意见不合而辞职。1920年,受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引荐,单不庵离开杭州第一师范北上,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师。并与鲁迅、张宗祥往来,校勘古籍。192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分为中文、西文、古物美术三部,聘单不庵、皮宗石分主中西文书籍。单不庵始用四库分类法,大略弄出头绪^[15]。1921年春天,单不庵送胡适一本《雪桥诗话续集》,其中有胡适所需的一条《红楼梦》研究的材料,帮胡适解决了大问题^[16]。

1922年3月21日,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学季刊》召开编辑部会议,胡适为主任编辑,单不庵为编辑之一。1922年6月5日,单不庵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赠《文渊阁志》3册^[17]。1922年8月,单不庵由国文系讲师升任教授^[18]。但有学者亦曾述及,其虽担任教职,但不受北大教授聘书^[19]。1923年11月1日,北京大学设立图书委员会,顾孟余为图书委员会委员长,单不庵等6人为委员。

2.3 再任浙江省立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27—1928年)

1924年单不庵自北京大学南归,被浙江省立二中聘为教员。1927年5月杨立诚(字以明)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6月该馆改组,改设总主任一人,分中国文、外国文为二部,各设部主任一人。该年秋,单不庵复到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分馆任中文部主任并兼管文澜阁的事务,并编《浙江省立图书馆报》,这是其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后缘。《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续编》曾载其借钞信息数条,如:“本馆从单不庵先生借钞《杨慈湖先生石鱼偶记一卷》”“单不庵先生钞《唐写本老子残本四种》”“单不庵据文津阁本朱笔校《潜邱札记》眷西堂刊本异同于眉端”等。在此期间,单不庵请其弟子曹聚仁亦到该馆任职,负责整理和补充文澜阁中的《四库全书》等^[20]。前已论述,单不庵曾向胡适约稿,并还曾请胡适为其堂姐单士厘之《清闺秀艺文略》作序。单士厘之《清闺秀艺文略》在《浙江省立图书馆报》发表了卷一^[21]、卷二至卷五^[22]。在卷五末,单士厘谓:“弟不庵为《浙江图书馆报》征稿于予,因手录一通,予之讹漏之处,知所不免,再有所得,以俟续编。戊辰夏钱单士厘,时年七十有一。”^[22]1928年单不庵因与馆长杨立诚关系不谐去职。二人不谐之原因具体不详,但1931年后,杨立诚因

违规使用经费且管理不善被控免职并受惩戒。

2.4 负责中央研究院古籍善本之编目(1929—1930年)

1928年5月5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在致大学院蔡元培、杨铨的信中拟聘单不庵为通信员。1928年9月,傅斯年致蔡元培函中称:“昨闻单不庵先生不能与浙江图书馆长杨立诚兄相得,愤而辞职赴萧山原籍。杨君本非有图书知识者,单先生不能处其下,理甚显也。单先生版本目录知识,此日中国,极为难得……目下中央研究院买到邓家(邓邦述群碧楼)一批书,整理需人,此后中央研究院之图书馆,一切整理,必需专家,如单先生者,实难求得,未知可否聘为中央研究院之图书员,兼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必有成绩,以喻人也!”^[23]傅斯年此请求应得到了蔡元培的同意。1929年单不庵担任中央研究院汉籍图书室主任,负责为古籍善本编目,其中当有群碧楼之书。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卷六“《东牟集》十四卷”下有提要云:“余初得此书,以为或从内府流出,以其钞写装潢皆非外间所有也。及书既鬻出,始于沪上晤萧山单不庵君,谓余《东牟集》乃文澜阁原本,余始恍然。不庵曾随丁氏整比文澜遗籍,故一见即能辨识。余虽屡至杭州,而从未一窥中秘,犹不免自哂孤陋矣。己巳(1929年)四月,正闇补记。”^[24]其中提到单不庵曾随丁氏整比文澜阁藏书,故“一见即能辨识”,可见其确曾参与整理。《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曾载“单不庵先生逝世”要闻一则,内容如下:“本院汉籍图书室主任单不庵先生自去年四月初患病以来,经中西医诊治,均未见效,卒于本月十三日在沪寓逝世。先生为版籍专家,学识宏博,待人和蔼,平生专考学问,不治家产,死后仅余图书数千卷,别无长物。有子一,年尚幼。先生之死,不只本院之损失,亦我国学术界之不幸也,书此以志哀悼之感。”^[25]从1929年4月初患病,到1930年1月辞世,单不庵在中央研究院任职较短,主要负责编纂宋元善本书目。因所编书目未署名,限于资料,其此段时间之工作成绩待考。

3 单不庵藏书之去向

3.1 整体售归浙江省立图书馆

在单不庵生前,其就曾为浙江省立图书馆捐书,如捐赠史部1种64册,集部4种8册^[26],以及科学书4种4

册^[27]。单不庵逝世后,其子单大昕尚幼(后亦病殇),家道艰难。其家中藏书,多是传自其父辈,由其夫人陈氏主张,售予浙江省立图书馆。1930年12月9日,蔡元培先生曾就浙江省立图书馆收藏单不庵遗书一事,分别致信马叙伦、沈士远、胡适、马衡四先生:“顷接浙江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来函,略谓:‘前承函嘱保存单不庵先生遗书。查是项书籍,共五十三箱,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馆,并附书目一本;经点收保管,由该馆长缮就收据,交原代理人潘尊行君收执。相应函复’等语。特此转达,即希察照。”^[28]1931年6月10日,蔡又致函浙江省立图书馆杨立诚馆长:“萧山单氏遗书,闻已由贵馆保存。兹据单不庵先生之夫人来函,谓馆中允给代价一千五百元,渠意未满足,望加增至二千以外,请为转达云云。是项书价,既由贵馆估定,自属斟酌妥善;惟单夫人家境异常艰难,设非售书稍得善价,实不足以维生活。倘其书品尚佳,还希悯念遗孀,略予优价,俾得自存,不胜厚幸。特为代达,诸侯察裁。”^[29]其夫人陈氏哺育幼子,鉴于生活来源有限,故而要求增价。杨立诚被免职后,1931年9月26日,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黻章就购单不庵遗书之事上报浙江省教育厅。11月27日,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道藩下令验收单不庵遗书五十三箱,并准支付银一千六百元。并嘱“至购存书籍,应即妥为盖章编目,并连同书篋列入财产目录,其孤本善本,尤须什袭珍藏,以重文献”^[30]。

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刊出单不庵遗像,并谓其遗书共有八千卷,多经其手校,已归浙江省立图书馆^[31]。其遗书以一整体入藏浙江省立图书馆,未曾散佚,且多明本,实为幸事。据称:在其海宁家中,尚有《老子道德经校》《刘安节刘安上许横塘三先生年谱》《程伊川先生年谱》《宋代浙江学者小传》《二程学说》《明清间三大儒》《周浮沚先生年谱》《陈傅良先生年谱》八种。1936年11月,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有“单不庵手稿八种”参与展览^[32]。今可见浙江图书馆藏清陈洪绶稿本《筮仪象解》不分卷上有其1928年7月所作之题跋,认为该书“诠义平易,不涉术数,自有可传者在,不仅书法俊逸已也”^[33]。该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1291)。

单不庵喜抄校书籍。浙江图书馆今藏其重辑《说郛小品十二种》(抄本)1种,另有单不庵抄本8种,分别是:《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史记考证》七

卷、《猗觉寮杂记》二卷、《慈湖遗书》十八卷《续集》二卷、《葆光录》一卷、《树萱录》一卷、《绍陶录》一卷、《坦斋通编》一卷,均被该馆列为善本。其藏书印有“单丕”(圆形)、“不厂藏书”(方形)等。单不庵一生从事的是传统学术的研究,尤精于校勘学。著有《宋儒年谱》《二程学说之异同》《宋代哲学思想史》等。

3.2 其他存藏

单不庵逝世后,该年(1930年)的3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366号起6次刊出王烈等25名教授发起的为单不庵举行追悼会的启事。3月30日,北京大学及北平教育界,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为单不庵开追悼会,到会者有陈百年、马幼渔(裕藻)、马叔平(衡)、马太玄(马准)、钱玄同、钱稻孙、朱遇先(希祖)、沈兼士、林公铎(损)、杨遇夫(树达)、朱彙臣(洪)、陈君哲、赵万里先生等五十余人^[34]。北京大学为其设立“单不庵教授遗著整理委员会”。1931年1月5日,在胡适致张宗祥的信中提及“不庵遗著之征集,我极赞同,也愿附名发起。不庵的著作,最后的一部分为在研究院图书馆所编宋元本书目,有很精到的,当请子民先生令人写副本”^[35]。可见,张宗祥提议为单不庵编遗著,得到了胡适等人的支持。

但后来或限于各种条件,其遗著亦未曾整理出版,胡适在其文集中附录了部分二人论学之书信。据邱巍称:“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还藏有一函单不庵的著作手稿。这些著作经过钱玄同简单整理,共计11册12种,即《清代学术小史》《文选记闻》《水经注校记》《方言约注》《庄子天下篇道家部分》《司马光论六家要旨(附唐王绩传)》《周礼蠹说》《说苑人名考异》《颜氏家训集解两种》《选赋与史汉异文略释(上篇)》《典论》《荀子正名》。其中多有残稿,也有的杂有他稿。”^[36]笔者查询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目录,查到“单不庵先生杂著十四种十四卷”,著录为单丕(不庵)纂钞,民国间稿本,1函11册,善本线装。笔者猜测经钱玄同整理的这批书,应当就是单不庵“遗著整理委员会”整理的产物。不知经何种途径,入藏了复旦大学图书馆。2019年复旦大学已整理出版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一辑)》,收入58种稿抄本,其后还将继续整理出版,笔者期待亦能早日见到单不庵的稿抄本行世。

还有部分可能是其早期售出或流出的书籍。如

其赠给康爵手抄的郑厚《郑湘乡遗稿 附夹漈遗稿》，被康爵视为“名钞本”^[37]。康爵据此撰写发表了《文澜阁丁氏补钞夹漈遗稿校勘记 用函海本艺海珠尘本校》^[38]。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出其经藏的清代退补斋精刻本《读四书大全说》全六册一套。此书上朱笔批校极多，其后有单不庵所作题跋两则，一则为其评论陆陇其（字稼书）的观点——“《大学》一书之格致诚正修，犹《论语》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也。稼书之言切，切其要矣。不庵 丙寅（1926）立夏后二日。”另一则为评论朱熹的观点——“《中庸》为儒门传授之心法，所言重体用而明心物，后世之心性一脉，全得法于此篇。朱子所谓此篇单传，实继孔氏之修心根本，而足可直视释门之诂矣。”^[39]其稿本也有藏于天一阁的，如天一阁藏《萧山单不庵所著字书》一卷^[40]。1922年2月其赠予马鉴之《段氏说文注订》八卷、《说文新附考》六卷《附说文续考》一卷现藏于新加坡国立大学^[41]。是否还有其他存藏，还有待更多寻访。

4 结语

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单不庵仍然保留了旧文化

学者之行事特点，割股疗亲，为人狷介，让人感叹。就其学术成绩一面，单不庵致力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述作较少。曹聚仁曾如此言道：“先师单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证学的学人，（他的生活方式，则是宋明理学家这一型的。）他的读万卷书，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学问竟如英国史学家阿克敦（Lord Acton 阿克顿勋爵）一般……这蚂蚁一般勤劬的硕学，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42]在另一处，曹聚仁同样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至于单不庵师，他的渊博，那是无话可说了。时贤之中，读书之多，校勘之精，用心之细密，一时无两，比之古人，在阎百师、吴任臣之间。他持论过于谨慎，不敢独持己见，博而未通，却也并不迂拘。他自己操守很谨严，对人却很圆通。用旧话来说：‘古之人也，古之人也’。”^[43]因单不庵治学严谨，所遵循亦为讲学先生之路径，本不以著述为务，又过于早逝，确实未能留下较多的著作。但其为学之态度，仍让人敬佩。曹聚仁曾有意将其藏书中之札记和考据文字整理以传世，但未能完成。但笔者认为，作为学者，读书、抄书、校书、捐书，亦可概见单不庵之书缘。学者之幸与不幸，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参考文献：

- [1]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33.
- [2] 高健行.篆纹桃李曾相映——记单不庵[M]//顾国华.文坛杂忆 全编1.上海:上海书店,2015:334-336.
- [3] 许逸云.蒋百里年谱 1882—1938[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19.
- [4] 曹聚仁.将将之将——蒋百里评传[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134.
- [5] 张群.张宗祥十二种影宋抄本考述[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8(6):76-84.
- [6] 胡适.胡适文存:第3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2.
- [7] 胡适致单不庵书札[EB/OL].(2010-06-01)[2022-02-25].http://pmg.kongfz.com/item_pic_129469/.
- [8] 胡适.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8(1):1-51.
- [9] 胡适.拟“整理国故”计划[C]//季蒙,谢泳.胡适论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271-274.
- [10] 胡适.序跋: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本跋[J].图书馆学季刊,1926,3(3):110-112.
- [11] 单不庵.序跋:宋元学案补遗四十二卷本跋[J].图书馆学季刊,1926,3(3):112-114.
- [12] 钱玄同.亡友单不庵[N].大公报,1930-04-21(13).
- [13] 单不庵.跋补抄文澜阁书六种[J].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3):527-530.
- [14] 马楠.“道学先生”门下出“新青年”——五四时施存统激进转向背后单不庵的影响[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32(5):96-100.
- [15] 范长江.介绍北大图书馆——过去与现在[M]//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8-10.
- [16] 王兆胜.单不庵送书[M]//王兆胜.一生受用最是书——胡适的读书生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8:134-135.
- [17] 研究所国学门布告[N].北大日刊(1045期),1921-06-06(1).

- [1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8卷续编[M].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10.
- [19] 郭建荣.单丕:不接聘书的北大教授[M]//郭建荣.涵容博大 守正日新——我眼中的北京大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7-68.
- [20] 田艳艳.曹聚仁的图书馆生涯[J].兰台世界,2013(16):129-130,146.
- [21] 钱单士厘.清闺秀艺文略:卷一[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7(1):1-66.
- [22] 钱单士厘.清闺秀艺文略:卷二至卷五[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8(1):94,40,22,16.
- [23]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一卷[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150-151.
- [24] 邓邦述.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4辑 群碧楼善本书录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M].金晓东,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3-204.
- [25] 本院要闻[J].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30(7):115.
- [26] 本馆历年捐入书籍总报告[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7(1):21.
- [27] 本馆历年捐入书籍总报告二[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8(1):8.
- [28] 赵达雄.近代名人与浙江图书馆[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1):2-10.
- [29] 高平叔,王世儒.蔡元培书信集:下[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1288.
- [30] 公牍辑要:乙、关于收购单故教授遗书之件[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1):4-6.
- [31] 插图:单不庵先生遗像:[照片][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10):8.
- [32] 顾志兴.浙江藏书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519.
- [33] 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题跋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16.
- [34] 何士骥.单不庵先生追悼会纪事(续)[N].北大日刊(2418期),1930-05-23(3/4).
- [35]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凝聚的历史瞬间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熊光楷 袁熙坤 张忠义特藏汇报展图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51.
- [36] 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和传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10-111.
- [37] 林素梅,尤小平.化私藏为公藏的藏书家康爵[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9(3):105-107.
- [38] 康爵.文澜阁丁氏补钞夹漈遗稿校勘记[J].浙江省立图书馆报,1927(1):1-8.
- [39] 蒙蒙天亮.萧山国学大家单不庵先生批跋:退补斋精刻本《读四书大全说》[EB/OL].(2014-09-01)[2022-02-2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ce3b030102v0u1.html.
- [40] 周慧惠,刘云,袁慧.天一阁藏清代珍稀稿本提要[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79-80.
- [41] 李国庆.海外所见近代浙江藏书家印鉴考[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1):30-43.
- [42] 曹聚仁.蒋百里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前记.
- [43]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69.

作者简介: 周余姣, 博士,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古籍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历史文献学、中国图书馆学史。

收稿日期: 2022-05-05

本文责编: 李芳

· 图书馆学史 ·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工作研究

葛文娟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50)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的书目推荐工作颇具时代特色。文章对该时期的书目推荐工作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该时期书目推荐工作由点及面进行普及,学习苏联图书馆经验,逐步进行理论探讨;对书目推荐的功能和特点分析,发现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图书馆员向读者推荐好书、指导阅读的重要武器,但是书目推荐没有明确读者对象、文艺类书目过多、缺乏书目合作协调机制,影响书目推荐效果;该时期书目推荐的特殊形式,即读书计划,是培养读者系统阅读的有效方式,对于今天图书馆开展个性化阅读推广服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书目推荐;读书计划;新中国成立初期;阅读推广

中图分类号: G252.6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Work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6)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work of public libraries was quit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work in this period, and finds that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work in this period was popularized from point to point,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libraries, and gradually conduct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By analyzing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bliography recommendation, it is found that it has a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 and serves to guide reading, but there is no clear audience, too many literary and artistic bibliographies, and lack of bibliographic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ch affects the effect of bibliography recommendation. The special form of bibliographic recommendation in this period, namely reading pla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readers to read systematically, and has a goo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libraries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Key words Bibliography recommendation; Reading pla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ading promotion

1 引言

书目推荐是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国内研究来看,图书馆界专家学者对于书目推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公共图书馆^[1-2]、高校图书馆^[3]等服务主体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服务主体开展书目推荐工作的不同特点、类型等进行

研究,大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为研究着眼点。二是从不同读者群体需求的角度出发研究书目推荐,研究发现书目推荐的面向群体主要是儿童与青少年。徐蒙对近十年来青少年书目推荐的发展概况和特征进行了总结,发现青少年是图书馆进行书目推荐的主要服务群体之一,面向青少年推荐的书目涉及范围广、内容差异大、其中有很大比例是新书^[4]。三是从新技术环境入手,主要研究书目推荐服务与新技术结合的发展方

式。在数字时代,书目推荐的类型与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图书馆除了开展传统书目推荐外,还应新的技术环境下采取积极措施来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书目推荐服务,提高书目推荐的宣传度^[5]。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能够帮助图书馆员智能地推荐和预测读者要获取的信息,实现书目推荐形式的更好革新^[6]。关于书目推荐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不能只关注当前的发展变化,还应该从书目推荐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总结经验,获得启发。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笔者在查考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在进行书目推荐工作方面颇具特色,因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56年期间^[7]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书目推荐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此项研究需要收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开展书目推荐工作的史料和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献收集:(1)期刊论文。通过查阅南京图书馆编《图书馆学论文索引(1949.10—1980.12)》,查找有关书目推荐的文章。此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三种主要的图书馆刊物——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浙江图书馆编印的《浙江图书馆通讯》(先后更名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图书馆通讯》《浙江图书馆馆刊》)、北京图书馆编印的《图书馆工作》进行逐一查阅。这些刊物发表的文章基本代表了当时图书馆工作的前沿情况,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当时图书馆开展书目推荐工作的基本情况。(2)著作。通过查阅李钟履1958年编制的《图书馆学参考资料——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尽可能收集有关著作进行查阅;同时对《图书馆推广工作的开展》等可能包括书目推荐内容的著作进行研读。

(3)政策文本。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馆相关政策文件进行收集。(4)馆史资料。图书馆的馆史资料中同样存在大量信息,因此笔者尽可能查阅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今浙江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的馆史资料,这些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开展较好,保存的资料较多。通过上述途径的查找,笔者共找到与书目推荐有关的文献153篇,其中与苏联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相关的文章34篇,图书馆编制的推荐书目48篇,其他涉及书目推荐工作经验类文章71篇。

2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工作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书目推荐作为图书馆阅读辅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工作计划中,如浙江省立图书馆1950年1—4月的工作计划中专门添设阅读辅导股,积极推进对读者的阅读辅导,其中包括“编纂新书提要,图书评介等供读者参考;编制各类深入书籍介绍卡等,逐渐诱导读者提高水平与深入研究”^[8]等要点。

从目前查考到的文献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具备书目推荐性质的一些文章会刊发在《人民日报》等一些报纸的“图书评论”等栏目,这些栏目的创建也对全国图书馆工作者提出建议,认为“应采用各种方式,鼓励读者阅读报纸期刊和各种时事刊物”^[9]。还有一些图书馆创办的刊物,比如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浙江图书馆通讯》、广西省立图书馆的《广西图书馆简讯》等,会经常发表书目推荐的相关文章,作为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开展。

1950年至1951年,是书目推荐工作的缓慢起步阶段。全国的公共图书馆经历战乱的影响后陆续恢复正常工作,书目推荐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但书目推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说,都不是很规范和成熟,并且数量不多。当时只有少数条件比较好的公共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东北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等,配合群众性图书宣传的活动,初步开展了推荐性书目的编制工作^[10]。其中有大部分是结合着纪念性的展览会、报告会、讲演会而编制的,或者是为配合当前国家政治时事或重大节日的宣传而编制的。例如,1950年7月浙江省立图书馆为配合“儿童中心陈列”进行的报道,其中介绍了有关儿童教育的三十四种图书^[11]。还有12月浙江省立图书馆研究部编纂的《响应“抗美援朝”的扩大宣传》^[9]的稿件,从各报的书评中将重要的有关抗美的图书评介选集起来,并附一种较详细的书目,在刊物上发表,以此配合当前的时事,有重点有系统地评介图书,供读者们和各级图书馆作为选读选购的参考。北京图书馆自1951年以来,也编制了不少相关的推荐书目,如“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展览”“孟德斯鸠逝世二百周年”“安徒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等^[12]。虽然最初的书目推荐大部分根据当时的政治事件而编制,但是这些推荐书目对教育

读者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自1951年开始,一直到1954年,是书目推荐工作逐渐发展起来并普及到全国图书馆实践中去的阶段。该阶段的发展受到苏联图书馆的很大影响。随着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国内学者积极学习苏联图书馆的工作经验,部分学者开始翻译发表苏联学术成果。就期刊发表情况看,最早的译文是发表于1950年的《我们是怎样对读者服务的》,文中首次提及了“引导读者做阅读计划”以及“在招待券的文中印进推荐图书的目录”^[13]。本文查考到的34篇有关苏联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的文章都或多或少地提及了“推荐书目”或“阅读计划”,文中多次提及“利用图书介绍目录和阅读计划对读者进行阅读辅导,帮助读者觅得有趣的主题和选择最好的书”^[14-16]。其中有7篇文章专门介绍书目推荐的重要性、编制与使用方式,例如1952年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有关书目推荐的,分别是《书目提要本质的研究》《关于编制介绍性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论省立图书馆的书目提要手册》。书目提要是书目推荐的一种重要表达形式,“编制介绍性的提要,是书目工作中一种复杂形式,它需要具备各种专门知识和花费许多创作劳动力”^[17]。国内图书馆开始逐渐认识到“单凭放在馆内的卡片目录,还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群众的需要。除编印图书总目,还需积极的准备,创设条件外,尽可能多编制一些各种专题的参考目录,和短小精悍、适合工农群众使用的目录”^[18]。

在明确书目推荐的重要性后,更多的图书馆工作者开始关注推荐书目的编制和使用问题,相关文章也被翻译过来。如1954年谢健亚翻译的《一个区图书馆参考书目提要工作》,介绍了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谢尔努尔区图书馆运用了各种参考书目提要,编制了推荐目录,向读者和机关报道新书,印发节录(摘录)和进行书报述评^[19]。陶振纲详细介绍了苏联列宁图书馆编制的《帮助读者》小册子,主要涉及阅读计划和推荐书目的编制过程^[20]。苏联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的相关经验,有效帮助了当时国内公共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的开展。

国内在学习苏联图书馆经验的同时,也在工作中不断实践。自1953年起,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工作逐步深入,书目推荐工作也趋于活跃。虽然不能统计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多少个公共

图书馆开展了书目推荐工作,但是1955年李枫和张琪玉在《我们对于公共图书馆某些工作的意见》中提到,

“书目工作是比较开展的一项工作。各公共图书馆今年来编了很多新书通报、专题书目、书目手册、读书计划和资料索引等等的书目参考资料,在配合运动、配合生产、配合科学研究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21]。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开展书目推荐工作还是十分普及的。而且据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至1955年10月,各图书馆已经出版的目录参考资料有262种,其中推荐性目录有70种^[22]。1956年7月中央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省以上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应迅速加强书目参考工作,要更快地编制书目和索引,对现有书目工作加以检查和总结;没有建立书目工作的图书馆应迅速建立起来”^[10]。自会议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的书目参考工作都有了广泛开展,编制了大量专题书目。

书目推荐工作在全国图书馆普及实践后,人们逐渐重视书目推荐工作的意义和经验总结,并进行理论探讨。1953年陈光汉发表《把编制书目提要工作重视起来》,其中着重提到书目推荐之于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就是利用书目提要帮助读者在他所需要了解或研究的问题上独立选择参考书籍”^[22]。1953年杜定友从书目特点的角度将推荐书目分为四大类,即帮助各种各级图书馆补充图书的标准书目;有内容提要、指示阅读方法的介绍书目;反映某一论题所有图书、供专门学者参考用的专题书目;介绍某一科目、必须一次阅读,作为系统自修学习使用的读书计划^[23]。而王重民则从读者角度对推荐书目进行划分,他认为一般读者应该使用书目通报,即带提要评介的推荐书目,形式多样,可以是一张八开或三十二开的纸页,也可以小到像一张卡片;对于各生产机关的工作先进经验和要求获得专门知识、有志自学的在职青年干部这样的个别读者应该使用读书计划^[24]。除了对推荐书目的种类进行划分,1956年朱天俊专门针对推荐书目的编制和使用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涉及书目推荐的作用、编制方法以及如何利用^[25],可见书目推荐工作已经由实践逐步向理论探讨发展。

3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作用和特点

通过查考到的文献资料,笔者梳理了48份推荐书

目,选自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期刊,由浙江省立图书馆、东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等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的情况。根据推荐内容的详略又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只包括书名、介绍(介绍仅限于对图书内容的简介,不等于提要性质的评介)、作者和出版社的简单书目推荐,又称为图书介绍或书目介绍;另一种是带提要的评介类书目推荐,又称为书目评介、图书述评。一些书目通报的文章也会将这两者进行结合,前半部分是简单的书目列举,后半部分是带提要的书目推荐,如1950年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的《抗美援朝参考书目及书评》。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作用

为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所发挥的作用,笔者分析了书目推荐工作的经验总结类文章以及书目推荐的内容类文章,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3.1.1 书目推荐是为配合国家政治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书目推荐编制的内容以及编制时机充分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的书目推荐工作首先是为配合国家政治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通过对48篇书目推荐内容类文章的研读发现,明确表明其政治用途的有17份,占全部文章的35.4%。书目推荐正如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批评和书目》的决议中指出的,有“提高广大群众政治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巨大意义”。书目推荐是宣传政治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图书的最重要的形式。它的任务和性质是由为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和共产主义教育劳动者的任务所确定的^[26]。苏联目录学家甫·奥里谢夫说:书目推荐“是为共产主义思想而斗争的群众性的武器”,它十分确切地道破了书目推荐的本质,即它的战斗性和党性。

紧密配合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编制推荐书目最重要的任务。这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编制工作很大部分上配合着国家重大政治时事的发生以及重要节日的宣传等。如抗美援朝时期,全国各个公共图书馆几乎都编制了《抗美援朝参考书籍》;上海图书馆为配合农业合作化时编制了《农业生产管理工作》《农村党团组织工作》等推荐目录;在配合肃反运动时编制了《红色保险箱》故事会推荐目录等^[12]。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的根本任务。各公共图书馆在这方面也编制了相当数量的推荐书目,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浙江省立图书馆在点评“书刊介绍”栏目时就提到“其特点就是政治性很强,能敏锐地结合时事政策教育,为读者服务”。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浙江省立图书馆为了适应全国贯彻婚姻法的需要,特选出了一部分有关婚姻问题方面的读物的目录,为各级妇联干部和广大读者提供参考,其中包括婚姻法学习文件、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故事、婚姻法通俗读物^[27]。

3.1.2 书目推荐是图书馆员向读者推荐好书、指导阅读的重要武器

通过对48份书目推荐内容类文章的研读发现,有25篇文章没有说明明确用途,但是多带有“图书介绍”“图书推荐”或“仅供读者选择、阅读”等文字,这样的书目推荐仅作为宣传书籍、推荐阅读的一种形式。书目推荐在宣传优良图书、指导读者、推广生产先进经验、配合科学研究工作上都起着巨大作用。而推荐性与批评性的书目在指导阅读与宣传书籍上具有重要意义^[28]。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分民众刚刚摆脱文盲的帽子,但是其文化水平还没有达到能熟练阅读书籍的地步,而推荐书目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民众读什么样的书,能够激发他们的读书兴趣,通过推荐适合大众实际需要的书籍,培养大众的阅读习惯,因而逐渐减少某些读者盲目阅读或单纯看热闹的现象^[29]。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特点

不管是简单书目推荐还是评介类书目推荐的文章内容,一般都分为三部分,首先是前言或序言部分,主要说明书目推荐面向的人群和推荐用途,推荐书籍的分类、题材等,其次是推荐的书目或书目内容提要、述评等,最后进行总结。通过对48篇推荐书目及相关的书目推荐经验总结类文章内容的分析,可以从推荐书目内容及书目推荐工作方式两个角度分析其特点。

3.2.1 推荐书目内容角度

(1) 推荐书目的选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推荐书目选题的政治性与推荐书目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满足读者需求编制推荐书目,以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关键为工作出发点,其选题是深入生产、深入实践的,富有鲜明的政治性。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不少书目的主题都是围绕政治运动,宣传党的政策和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的。例如,在1953年,当全国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各地各图书馆就编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目达29种之多^[10]。

(2) 推荐书目面向的读者对象不明确

书目推荐的对象是否明确,决定了推荐目录的使用程度。一种推荐书目不可能适合于各个类型的读者。笔者通过对48份书目推荐内容文章的统计发现,有明确说明读者对象的仅有10篇,其余38篇只提到了“仅供读者参考”。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作为编制目录的参考,有可能导致目录中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目录推荐意义就不大,读者无法从目录中获得所需要的内容。一些公共图书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广西第一图书馆就提到“我们应在好书介绍用纸及好书推荐推荐目录卡上,注明读者对象,如本书适于具有某种文化程度或从事某种工作人员阅读参考”^[30]。

(3) 编制的文艺类书籍目录较多

通过分析48篇推荐书目的文章内容发现,几乎全部都是文艺类书籍目录,仅有1956年的2篇文章涉及了农业技术,以及生产经验和相关技术,即《农业技术书籍》和《介绍先进生产经验书目》。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至1955年10月上海图书馆的40种书目,其中19种是文艺性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所编的17种书目,有10种是文艺性的;南京图书馆所编的48种书目,其中18种是文艺性的^[12]。公共图书馆编制文艺类书籍目录较多,有一部分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读者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在编制过程中要顾及读者需求,只能推荐读者受欢迎的通俗的文艺类书籍;另一方面,图书馆编制推荐书目一般以自身馆藏为限,一些图书馆无法获得科学技术等其他类书籍,不能提供读者借阅,只好放弃推荐其他门类书目。

3.2.2 书目推荐工作方式角度

(1) 书目推荐工作方式多样化、后期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书目推荐工作是在吸收苏联图书馆经验并与中国图书馆实践相结合后逐渐规范起来的。最初的推荐书目也不是编印成册的小册子,而是经历了黑板报、壁报、推荐书目卡等多形式后逐

渐统一的。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书籍是图书馆的传统业务,最初国内图书馆一般采用黑板报、壁报的形式介绍。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51年7月起,每周在小黑板上用简短文字扼要介绍读物两种^[31],到1953年,有了较正式的格式,印制了一种好书介绍纸,上面列有书名、译著者、书码及内容简介等栏。每月介绍好书两次,每次数量增加到十册左右^[30]。除此之外,一些公共图书馆向读者介绍书籍还通过广播、图书宣传画等方式辅助进行,可见当时书目推荐工作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后期规范化的发展历程。

(2) 缺乏书目合作协调机制

书目推荐工作发展时期正经历国内图书馆分类目录革新阶段,旧有图书馆馆藏目录无法适应新的分类目录,全国各图书馆开始编制新的图书馆分类目录,书目的编制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公共图书馆内进行,由于沟通的延迟性,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复书目的出现。推荐书目作为图书馆目录体系中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关于同一主题、同一事件的推荐目录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重复出现。在1955年编制《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推荐书目和读书计划的,就有上海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济南市图书馆、南京市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各馆所根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是相同的,有的书在每个目录内都能找到^[12]。尽管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存在,但是有关书目协调机制的想法已经被提出。1954年王重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以东北区而论,有条件的如东北图书馆,就可以把编印推荐书目的责任担任起来,供给东北区的其他图书馆使用,其他图书馆也可以出些题目,请求东北图书馆编制”^[24]。在1956年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发布的报告中谈到设置书目协调机制的问题,这个机制的建立可以加强各图书馆书目工作的联系,克服平行现象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加强书目工作的效果。虽然提出了书目协调机制,但是笔者尚未找到证据证实该机制发挥的有效作用。

4 书目推荐的特殊形式——读书计划

笔者在查找书目推荐相关文章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公共图书馆不仅编制了传统认知中的推荐书目,还学习借鉴苏联图书馆经验,编制了读书

计划。读书计划是指导个别读者时使用的一种推荐书目,主要目的是具体、有计划地帮助读者研究一些问题,并养成系统的读书习惯。读书计划的编制主要学习自列宁图书馆在1950年编制的《帮助读者》自学书目小册子。

相对于推荐书目的普及,国内编制读书计划的公共图书馆相对较少。据查考到的资料,最先进行读书计划编制的是山东省图书馆。1953年冬季,山东省图书馆重点试行了辅导读者制定读书计划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图书馆工作“从被动的出纳工作改变为主动地引导读者走向有目的的系统的阅读,它不但充分发挥了图书的作用,而且也扩大了图书的实际周转率,更为预约借书制奠定了基础”^[32]。其后东北图书馆、广西省第一图书馆(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是由于编制过程的复杂性,制订个别读者的读书计划,还不是一般图书馆目前都有条件来展开的^[21]。

4.1 读书计划的特点

读书计划是向苏联学习的成果,尽管国内编制读书计划的公共图书馆不多,但是1953年山东省图书馆进行的试点工作非常成功并总结了详细的工作经验,成为国内其他图书馆纷纷效仿的典型。笔者以山东省图书馆的读书计划为典型,辅之苏联编制读书计划的相关案例,以此总结读书计划的特点。

4.1.1 注重与个别读者的深入沟通,体现个性化服务

这是读书计划同普通书目推荐区别最大的地方,普通书目推荐面向的是一般的、普遍的读者,其阅读需求更加大众化,而阅读计划是针对个别读者有计划、有系统的阅读,与读者的沟通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编制读书计划的首要环节就是“熟悉读者”,主要利用读者登录卡,读者会议的发言记录,结合着借书室在出纳工作中了解的情况,选择重点,进行访问,确定辅导对象^[32]。读者登录卡主要是读者借阅书籍的记录凭证,它能帮助图书馆员迅速地确定读者的阅读倾向,往往可以指出读者所定的阅读计划^[33]。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仅依靠读者登录卡了解读者的需要是不够的,要多方面研究读者,与读者进行沟通,比如经常与读者直接往来并谈话沟通,了解读者的劳动和生活的具体条件,甚至和地方党、团、工会、企业与机关进行经常的联系,深入系统地来分析读者的需要^[21],为之提供有针对性

的读书计划。

4.1.2 读书计划的制订体现图书馆员对读者阅读辅导的全面性

在书目推荐工作中,帮助读者制订读书计划,是图书馆辅导阅读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制定读书计划的主体不是图书馆员,而是读者,图书馆员的职责是阅读辅导。辅导内容包括“阅读的中心内容、选用的书籍、阅读方法(包括阅读次序)和阅读的时间”^[32],在引导读者制订读书计划并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员对读者的全方位阅读辅导。以元成染厂工人高山同志制定读书计划为例^[32],首先山东省图书馆馆员帮助他从生产、工作、学习、生活各方面阅读要求中,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选择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他的阅读需求,即“从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去了解苏联伟大十月革命的意义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友谊协助”;其次,山东省图书馆馆员在帮助他选择书籍的过程中,不仅告知他选择的方法和如何使用选择图书的工具,还通过图书馆编辑的《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参考图书目录》和其他书目确定了所读书目;最后,图书馆员根据他的阅读目的和阅读能力,将有关图书适当地排成一定的次序,根据他实际阅读速度科学地、合理地分配时间,当他感觉阅读精力不够时,适当地帮助他修改原计划,以使他得到系统的收获。在他完成读书计划后,综合收获,可以向全厂职工宣传有关十月革命与中苏友好的图书。

4.2 读书计划的功能认知

读书计划能够提升阅读辅导质量,主要因为读书计划编排制定的系统合理性。每种读书计划以“引语”概括说明选题的目的与性质,所列书目下的说明旨在标出选列理由及书内有关选题的重点章节页数,用以吸引读者注意。读书计划涉及各个学科,包含各种专题,既有帮助读者进行学术入门的读书计划,也有配合当前政治运动、时事形势的读书计划。每种计划编入几本在选题范围内适宜精读的基本读物,按内容深浅、先后排列。同时结合新书出版情况与读者的实际需要,不断增补原有计划并编订新的选题。

读书计划还可以培养读者系统阅读,能够使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进行自修。读者选定读书计划后,按照所列书目,由浅入深地循序研读,这样就能初步克服过去阅读中漫无目的、漫无选择的缺点。捷尼西叶

夫曾经指出:“在各种书目参考资料帮助下,特别是在读书计划帮助下,图书馆员引导读者来系统地研究最重要的知识部门和各种现实问题。虽然,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教育过程,需要图书馆员有对待读者的巧妙办法,培养读者对于重大科学问题、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兴趣的工作。”^[20]有计划的阅读,在提高读者政治思想水平上起着极大的作用,当养成了有系统的、按照计划的阅读习惯后,读者就很愿意知道关于各种现实问题的科学书籍^[34]。

5 结语

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图书馆书目推荐工作的开展起初是结合着纪念性的展览会、报告会、讲演会而编制的,或者是为配合当时国家政治时事或重大节日的宣传而编制的,数量不多,随后在吸收借鉴苏联图书馆工作经验下,伴随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工作的逐步深入,书目推荐工作也趋于活跃。在实际工作中,其形式逐步固定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书目推荐,另一

种是读书计划。普通书目推荐的编制较为简单,所以更为普及,主要是为配合国家政治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同时也是图书工作者向读者推荐好书,指导阅读的重要武器。新中国成立初期,书目推荐的选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同时推荐书目很多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影响书目的推荐效果。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编制的推荐目录中文艺类推荐书目过多,缺乏书目合作协调机制。虽然有关书目协调机制的想法已经被提出,遗憾的是未有证据表明该机制的实施成效。读书计划相对来说在国内普及率不高,其特点主要在于注重与个别读者的深入沟通以及阅读辅导的全面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能力实施的公共图书馆不多,难以普及。但读书计划却是提升读者服务质量、培养读者系统阅读的有效方式,对于今天图书馆开展个性化阅读推广服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研究精力所限,部分期刊论文没有获得,也未能对建国初期各公共图书馆的档案进行一一查取,此为本项研究的不足,期待同行对此主题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分析。

参考文献:

- [1] 王慧. 谈公共图书馆阅读书目推荐工作[J]. 图书馆界, 2016(6): 85-87, 94.
- [2] 谭翔尹. 国内公共图书馆新书推荐服务探析[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8(4): 82-85.
- [3] 黄颖, 杨贺晴.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书目模式及效果调查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 36(3): 75-83, 101.
- [4] 徐蒙. 近十年来青少年推荐书目发展与特征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1(2): 11-15.
- [5] 陈红艳. 数字时代推荐书目发展特征及策略探析[J]. 图书馆建设, 2009(10): 49-52.
- [6] 韩璐. 基于数据挖掘的图书馆书目推荐服务的研究[D]. 唐山: 华北理工大学, 2017.
- [7] 韩永进. 中国图书馆史(现代卷)[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5.
- [8] 浙江省立图书馆. 附录六: 本馆研究辅导委员会1950年一至四月工作计划[J]. 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 1950(1): 15.
- [9] 浙江省立图书馆. 响应“抗美援朝”的扩大宣传[J]. 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 1950(6): 1-2.
-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书目工作”研究小组. 十年来书目工作的发展[J]. 图书馆学通讯, 1959(10): 22-27.
- [11] 浙江省立图书馆. 儿童节中心陈列报道[J]. 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 1950(1): 4.
- [12] 廖廷唐. 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推荐目录工作的评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57(3): 57-63.
- [13] 索克洛夫斯卡娅. 我们是如何对读者服务的[J]. 文物参考资料, 1950(8): 161-167.
- [14] 贺查也娃, 张先模. 辅导青年工人阅读[J]. 文物参考资料, 1953(z1): 32-34.
- [15] 佚名. 辅导阅读[J]. 文物参考资料, 1952(3): 47-49.
- [16] 索柯罗娃. 图书馆帮助青年工人提高技术水平[J]. 文物参考资料, 1953(5/6): 5-37.
- [17] 伊凡诺娃, 苏大梅. 关于编制介绍性的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J]. 文物参考资料, 1952(3): 69-72.
- [18] 金天游. 浙江省立图书馆专题目录编印前言[J]. 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 1952, 3(8): 12.
- [19] 格特曼诺娃, 谢健亚. 一个区图书馆的参考书目提要工作[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8): 103-105.

- [20] 陶振纲.介绍列宁图书馆的“帮助读者”——关于阅读计划和推荐书目[J].文物参考资料,1954(8):117-121.
- [21] 李枫,张琪玉.我们对于公共图书馆某些工作的意见[J].图书馆工作,1955(1):65.
- [22] 陈光汉.把编制书目提要的工作重视起来[J].文物参考资料,1953(2):78-82.
- [23] 杜定友.目录的体系[J].图书馆通讯,1953(9):33.
- [24] 王重民.关于试用两种简单推荐书目的讨论[J].图书馆通讯,1954(1):6.
- [25] 朱天俊.推荐书目的编制和使用[J].图书馆工作(北图),1956(6):76.
- [26] 阿利舍夫.苏联书目的性质和基本原则[J].图书馆员,1952(7):1.
- [27] 婚姻法学习和宣传参考资料[J].图书馆通讯,1953(1):40.
- [28] 李枫.图书馆如何加强对青年的阅读指导[J].图书馆工作(北图),1955(3):8.
- [29] 山东省文化干部训练班.莒南县图书馆是怎样在农村扩大图书流通和加强阅读辅导的[J].图书馆工作(北图),1956(1):24.
- [30] 蔡述传.广西省第一图书馆的辅导阅览工作[J].文物参考资料,1954(4):66-72.
- [31] 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1950年工作概况[J].文物参考资料,1951(12):33-36.
- [32] 陶振纲.山东省图书馆怎样辅导读者制订阅读计划[J].文物参考资料,1954(4):61-65.
- [33] 刘子亚.图书馆推广工作的开展[M].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51:58.
- [34] 康卡诺夫斯卡娅,维亚.区图书馆宣传书籍的经验[J].文物参考资料,1954(4):56-60.

作者简介:葛文娴,硕士,嘉兴市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2022-05-18

本文责编:王晓琳

(上接第72页)

- [4] 刘露,陈昱洁.网络时代青年群体的审美异化研究[J].大众文艺,2018(16):225-226.
- [5] CATHERINE R.Shelve Under of Toronto Public Library[J].Journal of Australia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2020,69(4):555-556.
- [6] SHARON T,JOHN N A.Imagining An Ideal Podcast Listener[J].Popular Communication,2019,17(4):333-347.
- [7] PERKS L G,JACOB S T,ANDREW C T.Podcast Users and Gratifications Scale Development[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9,63(4):617-634.
- [8] 柳帆,陈羲微.移动音频时代播客的音频出版转型探索[J].视听界,2021(2):53-57.
- [9] 敦文杰.美国图书馆播客服务模式研究及启示[J].图书馆学刊,2013(1):130-133.
- [10] 许苗苗.播客:声音里的情感共同体[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44-152.

作者简介:曾婕,湖南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读者服务。

收稿日期:2022-04-08

本文责编:孙晓清

· 文献学研究 ·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稿本及其价值考论*

曹天晓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民国佚名日记稿本, 因作者不明, 长期不为人所知。该日记从一位民国女青年的视角, 真实记录了其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的避难生活, 细腻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探索民族命运的艰难心路历程, 日记中还有对国民党政府不当抗战举措的批评、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等。通过考察日记中的相关细节, 可断定日记作者是汪文愷, 批点者是其父汪精卫。

关键词: 汪文愷; 汪精卫; 《佚名日记》; 抗日战争; 南京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A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Anonymous *Diary in Nanjing Library*

Abstract The Nanjing Library has an anonymous diary manuscrip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which has long been unknown because of its unknown author. The diary is a true record of the life of a young woma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ho took refuge in Nanj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nva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delicately portrays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a young intellectual explor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diary also includes criticism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inappropriate anti-war initia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China's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By examining the relevant details in the diar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diary was Wang Wenxing and the commentator was his father, Wang Jingwei.

Key words Wang Wenxing; Wang Jingwei; *anonymous diary*;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njing Library

1937年冬, 在侵华日军的铁蹄踏进南京之前, 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以及许多市民、学生纷纷逃出城外, 向偏僻乡村或者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后方转移。在辗转流徙的过程中, 一些逃难者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成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最鲜活的史料。但遗憾的是, 经过八十载沧桑岁月之后, 仅有少量逃难日记保存了下来, 得到整理发表的更是凤毛麟角。就笔者所见, 目前仅有小岫《小难民自述》^[1]、孙锦云《逃难日记》^[2]、周廉臣等人的《一位小学校长的逃亡日记》^[3]、顾蔗园《藕孔日记》^[4]以及陈达宇《流亡日记》^[5]五种得到了整理或影印出版。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以线装无格纸书写,

正文为硬笔字, 左行直书, 间有毛笔草书删改及批点, 全稿约计80筒子页, 近二万字, 其中包含四千多字他人批注。由于该稿本封面、内页均未署名, 亦无钤印, 正文也未提及任何具体人名, 故长期以“佚名日记”为名, 登记在南京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中^①, 目前未见有学者整理、利用或提及。

不同于前述几种逃难日记或为儿童视角, 或为男性视角, 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日记》的作者是一位生活优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因此该日记的写作视角完全不同于其他难民日记, 所思所想更加富有广度和深度、笔触也更加细腻。再者, 通过对日记中的蛛丝马迹进行仔细考证, 笔者发现该日记作者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8ZDA259)阶段性研究成果。

身份十分特殊,她就是近代中国最大汉奸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日记中的四千多字批注正是出自汪精卫亲笔,而日记的写作时间下限是汪精卫发表“艳电”正式叛国投日的八个月前。因此,无论将之视为一个普通知识青年的避难日记,还是作为汉奸汪精卫女儿的日记,此日记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1 佚名日记作者的身份

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佚名日记》稿本全文约二万字,封面、正文均未出现任何一个完整人名,只有爸爸、妈妈、甘先生、唐先生、屈先生这样的模糊称谓。日记内容多为心理独白,所载现实生活事件不多,因此要想确知作者的身份、性别、姓名不太容易。问题的突破口首先在以下这则日记中:

穿了一身男装,跟着琦哥一行人等,去听爸爸对(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演讲,每人听到“不战而焦土的结果人民只有死”,惨然长吁。隐隐满眼无告的民众,自杀、投河、饿死、给敌人残杀,妇孺不能幸免……演讲中说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战争情形,说明游击战的利弊、焦土战的意义,和乡教(政)人员今后应有的努力。大意如此,全文报载详细,已剪下收藏起来了。(1938年1月23日)^[6]

这则日记中提到,作者的父亲在1938年1月23这天为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做抗战形势演讲,可见其父亲必然是国民政府的中高级官员,并且当天演讲内容“全文报载详细”。

循此线索,笔者查到一篇题为《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的演讲稿,发表于1938年1月23日,署名汪精卫,收在《闽政与公余非常时期合刊》第16期。该文前半部分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是认识清楚敌人的力量。第二,是认识清楚国际的形势。第三,是认识清楚自己的力量。”后半部分则是指明奋斗的方向和消耗战的意义,作者特别强调“不战而焦土”于抗战有害:“我们更必须知道在展开游击战的地方,军队如鱼,人民如水。如果这地方成了焦土,则水已没有,鱼何能游?以上种种,皆可证明所谓焦土战,是战而至于焦土。”^[7]凡此,皆与《佚名日记》中所述演讲内容“说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战争情形,说明游击战的利弊、焦土战的意义,和乡政人员今后应有

的努力”若合符契。总之,该演讲稿的发表时间、演说对象、演讲内容、主要观点,均与《佚名日记》1938年1月23日所载旁听父亲演讲之事完全吻合,故可断定该日记作者就是《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这篇演讲稿的作者汪精卫的子女。

其次,日记中所载相关信息也可佐证作者父亲是汪精卫。如该日记1938年3月30日提到故乡为广州,而汪精卫生于广东三水县,该县曾隶属广州府。当天日记还提到“旧居西华二巷”,该址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以北、解放北路以西,东距中山纪念堂不到三百米。查《申报》1926年5月17日第9版《汪精卫胡汉民先后离粤》一文提到:“高语罕、陈公博、甘乃光等主张汪氏出席,汪氏亦以为然,故由某医院迁回西华二巷汪宅。”^[8]可见汪家确曾居住于西华二巷。

再次,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虽然只有模糊的称谓,但皆可与汪精卫的交际圈一一对应。如1937年12月23日日记中写道:“唐先生今天来吃晚饭,我们亦可以知得南京陷落的情形。据说:退兵时,士兵互相践踏,由海军部到挹江门,尸首(推)[堆]积五尺多高,江上浮满败兵,呼号求救之声不绝,悲不可言,惨不忍睹。”这天距南京陷落正好十天,作者当时已随家人避往汉口。在南京保卫战中败退的唐姓军官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唐生智(1890—1970年),其曾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日军陷城前夜渡江撤退,后辗转至汉口向蒋介石请罪^[9]。并且唐生智事后自述:“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10]正与《佚名日记》的记载相吻合。

在1938年4月2日日记中,作者写道:“记得廖伯伯曾经写过一首词,词中有两句:‘……宇宙间,惟爱长存,万事都随流水……’”这位会写词的“廖伯伯”,应该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1877—1925年),廖氏与汪精卫、胡汉民同为国民党元老,故汪精卫子女称之为“廖伯伯”。并且廖仲恺雅好填词,有《双清词草》传世,只是今存《廖仲恺集》中未收录日记中所载残句。除此之外,日记中提到的“甘先生”(1937年11月15日)、“屈先生”(1938年3月10日)分别可以对应甘乃光(1897—1956年)、屈映光(1881—1973年),二人皆曾与汪精卫共事;至于“十一姑丈”则是汪精卫的至交兼秘书曾仲鸣(1896—1939年),其在汪文惺日记中出现的次年便在越南河内被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

务误杀^[1]；日记中的“母亲”自然是陈璧君，“琦哥”则是陈璧君的堂侄陈国琦。

要之，上述证据充分表明，该《佚名日记》作者正是汪精卫的某个子女。而据公开资料，汪精卫有六个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余五人分别是：长子汪文婴（1913—2011年）、长女汪文愷（1914—2015年）、次女汪文彬（1920—2015年）、三女汪文恂（1922—2002年）、次子汪文悌（1928—），那么日记作者究竟是哪一位呢？

据该日记1938年3月16日所载：“这种追忆，又是五六年前在中大附中时的情形了……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过了这样的一年，便到南京去了。”由此可知，1938年时作者大约22~24岁，这一年汪文婴25岁，汪文愷24岁。其次，由前文所引1938年1月23日日记“穿了一身男装”可知，作者并非男性，而是女扮男装，再结合日记中透露出的细腻敏感的情思、柔弱多病的身体状况来看，作者的女性身份可以确定无疑，故当排除汪文婴。再次，日记中提到“十一月廿九日，无锡失守……还记得在教育学院念书的时候……”。而汪文愷正是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该校当时的校址位于无锡，而汪文婴则毕业于德国某大学，与日记所述情形不符。最后，日记作者多次提到自己体弱多病，如1938年2月26日日记云：“经过多少爱护扶持，渐渐生长起来，然而仍是常常生病。读一年书，便病三个多月，或是读几个月，便病一年。”1938年3月10日日记中提到“妈妈担心我体弱”。这与汪文愷的情况也十分吻合，汪文愷出生在法国，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有1.3千克，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1]，这也是她早年体弱多病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父亲身份以及年龄、性别、教育经历、身体状况等各方面来看，该日记作者必然是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愷。

2 日记批点者的身份

该《佚名日记》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正文以外还有批点文字。这些批点文字可分为三类：一是随文夹批，既有改正错别字、病句，亦有涉及内容的整句删改；二是天头、地脚的眉批和脚批，这类批点主要是评价日记的文章写法、补充纠正日记的思想内容、解释删改原因等，亦有少数是对尾批的补充说明；三是

日记篇末的尾批，此类批点仅分布于1938年1月2日以后，内容是阅读日记后的感想，篇幅较长者达1 300多字。批点内容总计达4 000多字，占日记稿本总字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文字均为毛笔草书，字迹相似，眉批中有不少是对随文夹批和尾批的补充解释，如1938年4月23日日记中有一条眉批云：“我不会写‘她’字。”这条眉批是对尾批中“他”字的解释。以此可知，三类批点文字均为同一人所书。

现代日记属于十分私密的文献，尤其女性日记更不可能轻易给外人看，因此批点者只可能是汪文愷的父亲汪精卫、母亲陈璧君或者未婚夫何孟恒（1916—2016年）、兄长汪文婴。首先可以排除何孟恒，因为据何孟恒回忆，1937年11月中旬，他与家人（即汪精卫一家）一起搭乘“永绥”舰从南京避至汉口，这与汪文愷日记的记载相符。但不久，何孟恒受到岳父汪精卫的鼓励，赴成都继续读书，“离开汉口西飞，已是次年的二月了”，直到七月份学期结束才又回到汉口^[12]。而汪文愷在1938年3月3日离开汉口，转至香港，3月16日左右曾短暂至广州，3月26日又回到汉口，她与何孟恒的活动轨迹并不重合。然而汪氏日记中有大量随文批校，尤其是1938年1月2日至4月23日的日记，几乎每篇后面都有尾批，从文字篇幅来看不像是后来补写，而是即时所评。何孟恒与汪文愷各在一方，因此不可能是日记的批点者。

从批点的字迹、内容、人物称谓来看，汪精卫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批点字迹为草书，体现出较高的书法水准。其次，从行文语气、措辞来看，批点文字处处体现长辈对晚辈的教育、鼓励、爱护之意。例如“此段议论正确”“这一段写得情景逼真”“明白透彻”“沉着坚定”“此是正论”“语简而意沉，真挚动人”“此句最好，如此方不灰心，方有勇气战胜一切”等。长辈语气至为明显者，如1938年1月11日日记眉批：“我所盼望的就是这些青年。”仅此一处便可排除汪文愷的兄长汪文婴、未婚夫何孟恒等平辈人。最后，批点文字对胡适的称谓不同寻常。如1938年1月2日日记尾批云“适之此文……”，通常而言，只有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或年长位高者才会如此称呼胡适，一般人大概会称“适之先生”、“胡适之”或“胡适”，汪精卫与胡适私交甚笃，汪的年龄、地位均高于胡，故可如此称呼，而陈璧君则不符合这些条件。

从日记关键信息的修改情况，也可以作出判断。

在1938年1月23日听父亲演讲一段,日记原本写作“乡政人员训练班”,批点者增字补充为“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后文误写作“乡教人员”,批点者又将“教”字改为“政”字。只有演讲者本人才会对演讲对象的名称如此清楚、态度如此严谨。而且该段日记有眉批:“战死是应尽的义务,给敌人残杀,是无可如何。不战而焦土,使人民无以为生,而辗转就死,则于民有害,于敌无损。”这段眉批文字是解释日记中复述的演讲内容“不战而焦土的结果人民只有死”,正与汪精卫《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这篇演讲稿中关于焦土战的评论文字相互补充,也只有演讲者本人才有“义务”和“能力”对别人复述的演讲内容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

此外,批点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观点与汪精卫所提倡的“冷静的理智”以及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立场完全吻合。批点中体现的政治观点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反对焦土抗战,尤其是“不战而焦土”。如1937年12月27日日记中,批点者批评政府“既已决定不战而退,则又何以烧尽日本人在青岛的产业”,以致激怒日本人在山东大肆屠杀人民以为报复,并在眉批中补充道:“拿破仑攻俄国时,俄将莫斯科烧尽,以困拿破仑,是有计画的。没有计画,便不能如此做法。”这一批评剑锋直指蒋介石,因为当时在青岛实施“焦土抗战”的沈鸿烈正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3]。再如一月二十三日听父亲演讲一段,批点文字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焦土抗战。二是反对国民政府将沦陷区人民一律视作“顺民”。同样在12月27日日记中,作者对沦陷区“顺民”表达理解之同情,批点者深以为然,并在眉批中写道:“‘顺民’有两种,一种是甘心降敌的,一种是因为没有抵抗力而受制于敌的。可怜大多数的人,是属于后者,应该设法联络,以期拯拔他们出来。”然后又在下文痛批国军丢弃人民:“俄国焚毁莫斯科时,先叫人民走开,然后军队走开,敌人入城之后,方才纵火,这是一定的次序,断没有军队先走,撇下人民的道理。”以上这些批点文字透露出一个共同倾向,即反对坚决彻底而单一的抗战政策,主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与汪精卫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事件后发表的《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所提倡的“冷静的理智”完全吻合^[14],也与汪精卫一贯反对蒋介石的政治立场相符。

3 汪文惺生平及日记内容

此日记作者汪文惺原名汪惺,字仲蕴,1914年12月28日出生于法国图卢兹(Toulouse),由于汪精卫夫妇当时急于回国,便将其与兄长汪婴一同托付给好友方君瑛、曾醒照料,因此兄妹二人取名“婴”“惺”。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警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当时十几岁的汪文惺正在江苏无锡的省立教育学院读书,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惩治卖国贼^[11]。1934年,汪文惺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生何孟恒订婚,1939年3月二人在越南河内完婚。就在二人新婚不久,便发生蒋介石派军统特务行刺汪精卫的事件。汪精卫投日之后,汪文惺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从未在汪伪政府担任任何职务,因此抗战胜利后,汪文惺未受审判。解放后,汪文惺夫妇二人移居香港,起初办花卉农场,后来何孟恒受聘于香港大学植物系,汪文惺则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并改名“汪楚芙”。1984年退休后,随女儿移居美国新泽西州,度过了安详的晚年。2015年9月13日,汪文惺在纽约病逝,享年101岁^[15]。

如果抛开“汪精卫女儿”这一身份枷锁,此日记内容可以概括为: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从南京城逃难出来的知识女青年辗转各地避难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该日记的时间起止为1937年11月15日至1938年4月23日。以1938年1月18日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从1937年11月15日到次年1月17日为第一部分,主要写现实避难经历和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作者在1937年11月21日离开南京,转移至武汉,期间不断听闻南京、无锡、杭州、济南、青岛等地的战况,以及政府的抗战措施、人民的流离失所、散兵土匪的掳掠人民,当然还有日军在南京、上海、济南等地对中国平民的屠戮。但这些现实事件的记载大多比较简略,日记中大部分文字是作者内心的所思所想。从1938年1月18日到1938年4月23日是日记的第二部分,这时作者已经渐渐远离前线战场,转移到了香港、广州等大后方城市。这段时间的日记主要记载作者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反思、改造社会的愿望、读书感想、自我勉励、回乡所思、香港与广州等地的抗战氛围等。最后一篇日记因读鲁迅小说《伤逝》深有触动,抄录该小说数千字,并

写有读后感。

不同于一般的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此日记更像是传统的作文日课,几乎每篇皆有叙述的中心,相当于一篇首尾完整的文章。批点中对此亦有揭示,如1938年1月2日日记尾批云:“此课系赅括胡适之所著《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同年1月19日日记眉批云:

“各课以此一课为做得最好,叙事既明洁,说理又清真也。”眉批和尾批中还有大量对文章写法的评语。在尾批之后往往有半页空白,这显然是因为作者每写一篇日记要先交给批点者评阅,评阅完后再继续写下一篇。但由于纸张背面(即偶数页)不便书写,于是便直接跳到下一页从正面(即奇数页)开始写,于是便出现了许多空白页。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该日记写作目的之一是为练习作文水平,因此几乎每写一篇便有长辈作批点,这也体现了民国时期以日记训练写作能力的教育方式^[16]。

4 《佚名日记》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佚名日记》的撰写者汪文惺具有较强的作文意识,所以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该日记记录了国军抗战情况与日军侵华暴行。如1937年12月23日日记中记录唐生智来访,并听其讲述南京保卫战撤退时的情形:“退兵时,士兵互相践踏,由海军部到挹江门,尸首堆积五尺多高,江上浮满败兵,呼号求救之声不绝,悲不可言,惨不忍睹。”1938年1月12日从报纸上得知“日军占领以后的兽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南京的难民区,上海的难民,给他们宰割,最近杭州……”由于作者不在抗战前线,日记中记载的多是从其他个人或报纸上听闻的消息,因此这方面内容的史料价值比较有限。

其次,该日记记录了后方城市抗战氛围。这部分内容由于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且不同于新闻报纸的官方叙事,因此尤其显得珍贵。如写汉口遭遇日军空袭前后的场景:

约十时半,忽然警报,我们一起到银行,街上的人万分挤拥。携男带幼,很多妇女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挽着几个小孩,头发乱蓬蓬的,仓仓惶惶,跟着人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老妇哭丧着脸,和儿孙一起,耳孙到是像看热闹,城隍出游一样的高兴彩烈,又多笑嘻嘻

的,非大人厉声责骂,满街满巷吵闹的声音,车马乱行,鸣笛叫得令人发火。(1938年1月11日)

正如批点所云:“这一段写得情景逼真。”在空袭到来前,男女老幼的表现各不相同,不谙世事的儿童将逃难场面当作是赶集,在哭丧的人群中兴高采烈,这种荒诞而又真实的场景,非亲身经历,则难以写出。

再如1938年3月3日,汪文惺随家人转移到香港,当时日军尚未逼近这片乐土,她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武汉的一番场景:“到了香港,满眼青翠欲滴的大树,和碧绿的草茵,蔚蓝色的青天耀着丽日,都是在汉口所没有的。一切新鲜活泼,似乎我也在大自然中跳跃了。无论香港如何的美丽,缺少了爱国的热忱,这热忱不能燃烧久居于所谓安乐窝——香港的人了。”

(1938年3月3日)身处香港这个“安乐窝”中,汪文惺却仍然惦念着沦陷区的同胞,始终无法开心起来。她对香港的“冷淡”氛围表示理解:“也许是生活太安逸的原故,和战区生活的同胞们太隔阂了,所以引不起强烈的情绪……若然香港的人们目击着战区中的同胞这样的妻离子散、血肉横飞,想再也不能曼舞高歌了吧!”

最后,《佚名日记》的发现对研究部分近代人物的生平与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汪文惺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虽然不多,但都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汪精卫、陈璧君、唐生智、曾仲鸣等,其日记对以上各人的行踪事迹有所补充。比如唐生智从南京撤退后曾到汉口拜访汪精卫,此前无论是关于汪精卫还是唐生智的文献史料中,均未记载这次见面的准确日期,汪文惺日记的发现则可补充相关历史信息。

当然,此日记涉及的历史人物中最重要的还是作者的父亲汪精卫。该日记稿本中有大量汪精卫的亲笔批点,计有眉批和脚批61条、尾批7条,共4 000多字。最长的一条尾批多达1 300余字。此外,日记中还有难以计数的随文批校,既有对误字病句的订正,也有对措辞、观点的修改。从中皆可考察汪精卫当时的思想状况。在日记记录的时期,汪精卫尚未变节投日,但从日记的批点中可以看出,他在此时已经流露出与主流抗战政策不同的想法,例如反对焦土抗战、反对将沦陷区人民视作叛国“顺民”等,这在前文已经有所分析。日记中有一处关于抗战决心的评点文字尤其值得注意。在一月十二日听闻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以后,汪文惺十分悲愤,当天日记中表达了坚持抗战、视死

如归的决心:

……每人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抱必死的决心,求最后的胜利,将散沙成为铁石,成为坚牢不破的壁垒,才能说全民抗战,才能说以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赴国难,挽救国家危亡,求民族的生存而奋斗。要这样,我敢说,中国不亡,中国是绝不能亡的国家!(1938年1月12日)

汪精卫对这则日记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对于汪文惺日记中其他表达政治观点的文字,汪精卫的批点多有措辞、语句方面的修改,而对这一则日记,除了对一个讹字“壁”的改正外,别无任何修改。只评论了四个字:“沉着坚定。”这四个字只是对日记文字的评

价,并未透露评论者自身的态度,这显然是一种谨慎而诚实的表达。由此可以推测,汪精卫至迟在1938年1月已经对坚持抗战失去了信念,因此才会有不久之后的卖国投敌行径。

总之,从日记中涉及的事件、人称等细节可以断定,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日记》稿本的作者是民国时期的知识青年汪文惺,其中的批点文字则是其父汪精卫所书。作为一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汪文惺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情感与细腻笔触,在日记中生动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知识青年探索民族命运的心路历程,并记录了避难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思,因此其日记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

注释:

- ①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南京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有《佚名日记》,但《南京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未著录该书。
- ② 本段引文正文夹注文字是日记稿本原有的随文批注,删除符亦为批注者所标。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稿本未标页码,下文凡引用《佚名日记》,均括注日记稿本中的日期。

参考文献:

- [1] 小岫.小难民自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2] 孙锦云.逃难日记[M]/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8.
- [3] 周廉臣,金小明.一位小学校长的逃亡日记[M]/刘瑞琳.温故:第13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5-166.
- [4] 顾蔗园.藕孔日记(外三种)[M].黄恂,编.香港:槐风书社,2019.
- [5] 陈达宇.流亡日记[M]/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藏抗战家书及流亡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
- [6] 佚名.佚名日记[M].稿本.南京图书馆藏.
- [7] 汪精卫.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J].闽政与公余非常时期合刊,1938(16):3-4.
- [8] 铜驼.汪精卫胡汉民先后离粤[M]/《申报》编写组.申报影印本:第22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405.
- [9] 谭崇恩.唐生智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39.
- [10] 马振犊,等.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43.
- [11] 高伐林.汪精卫的女儿女婿细述往事:河内遇刺,惊魂一夜[J].环球人物,2009(17):76-79.
- [12] 何孟恒.何孟恒回忆录:云烟散忆[M].台北:时报文化,2019:126-127.
- [13] 宋佳.试析沈鸿烈“焦土抗战”的实施对青岛的影响[J]/刘建国,唐运冠.温州史学论丛:第6辑.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7:267.
- [14] 张江裁.汪精卫先生复国行实录[M].南京:中华民国史料编刊会,1943:3-4.
- [15] 何孟恒.汪精卫生平与理念[M].台北:时报文化,2019:472.
- [16] 阿英.语体日记文作法[M].上海:南强书局,1931:19.

作者简介:曹天晓,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文献学、近代日记。

收稿日期:2022-01-21

本文责编:李芳

· 文献学研究 ·

旧山志补正《全宋文》《全元文》的版本价值*

——以明《罗浮志》为例

董存斌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罗浮志》是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作为一山之志,其中保存许多不见于他书的文献材料。《全宋文》《全元文》自编纂以来,成为文史研究者重要的资料库,然其所收文本仍存在一些缺憾。文章挖掘《罗浮志》文本的版本价值,以之补正《全宋文》《全元文》:一是补充二总集所收文章版本的缺漏;二是校正其中的讹误。

关键词:《罗浮志》;《全宋文》;《全元文》;总集

中图分类号: G256.22

文献标识码: A

The Edition Value of Ancient Mountain Records in Supplementing the Four Articles in *Quan Song Wen* and *Quan Yuan Wen*: Taking *Luo Fu Zhi* as an Example

Abstract *Luo Fu Zhi* is the earliest extant record of Luofu Mountain. As a document of a mountain, it preserves many documentary materials that are not found in other book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value of the editions of *Luo Fu Zhi*, and uses it to correct *Quan Song Wen* and *Quan Yuan Wen*: first is to supplement the omissions in the editions of the articles included in the two general collections; and the second is to correct the errors in them.

Key words *Luo Fu Zhi*; *Quan Song Wen*; *Quan Yuan Wen*; general collection

1 引言

明永乐年间东莞陈琏编撰的《罗浮志》^{[1]3-52}中有许多材料可补全集、总集之缺,如吕冠南据《罗浮志》补曾枣庄主编《全宋文》四篇:陈洵《广莫庵记》、郑虚舟《罗浮景泰禅师说法偈》、陈申《题东坡先生杂书后》、黎道静《罗浮山冲虚观化缘疏语》^[2];孙廷林据《罗浮志》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一篇:陈清溪《登山记》^[3]。以上二位先生皆是以《罗浮志》补《全宋文》《全元文》缺收之文,对山志进行了挖掘,皆有所得,亦可证明山志的价值所在。今人虽以《罗浮志》补遗,却未对其所收文本细加稽考。笔者近日点校《罗浮志》,发现此书一些文章与他书所载有异,

欲引他书校正山志之误,却发现有几篇文章当以《罗浮志》所收为优,可补《全宋文》《全元文》的文本脱误,今列于下,以资查考。

2 补正《全宋文》《全元文》

2.1 余靖《宫师颍川公留题罗浮山诗序》

《罗浮志》卷七载余靖《宫师颍川公留题罗浮山诗序》^{[1]28},其文如下:

道家品天下名山,称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又有十大洞天,而罗浮籍在十大洞天之一。其岫穴所通,远则峨眉,近则金坛,盖蓬莱之一岛,神仙之聚窟。岂独荣公侯之祀,擅登临之美而已哉?彼嵩少、终南、中条、太华,枕乎名利之场。故吟咏者日争,咀嚼含嗽,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2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贾声誉。而兹山磅礴海上，寂寥千载。自非安恬愉、乐幽静者，孰肯于名外摘词为不世之观乎？今宫师致政陈公，尝于咸平初，以太常丞领郡来此，帅其属而游焉。稚川炼药之区，景泰冥心之地，咸有留咏。观夫大人君子之存诚也。卷道而远迹，不羞于窘；遭时而调元，不谓之泰。所以托言寄意，安于道而已矣。故其解相印如脱屣，岂非素乐于闲旷者哉？博罗令黄君，以曳裾之旧而希其高。惜其粉字尘蠹，恐湮没而不纪。遂琢翠珉而刻之，以永其传。靖蹶履来游，会其镌刻，因书岁月于右。中阁地居上方，幽境绝胜。长老德坚复为宗门之秀，故立石于中阁云。宋康定二年岁次辛巳七月日前知英州余靖序。

按：《全宋文》据《武溪集》《古今游名山记》录其文“道家品天下名山……因书岁月于右”^{[4]册27:16-17}，后脱“中阁地居上方……余靖序”，共四十六字。《全宋文》所录文中亦有脱讹，“金坛”二字前脱六字“远则峨眉，近则”，“登临之美”后脱“而已哉”三字，“为不世之观”前脱一“词”字，“咸平初”后脱“以太常丞”四字，“闲旷”二字后脱一“者”字，此篇共脱六十一字，皆当补之。

《全宋文》所录文中讹误共三处^{[4]册27:16-17}，皆当依《罗浮志》本，以下一一辨之：

(1)《全宋文》：“其岫穴北通金坛。”据《罗浮志》作：“其岫穴所通，远则峨眉，近则金坛。”可知《全宋文》脱字甚多。又因其文脱漏，以致“其岫穴所通金坛”句意不通，只得以金坛在北，将“所”字改为“北”字，此为误改。故当以《罗浮志》所载为是。

(2)《全宋文》：“岂独荣公侯之祀，擅登临之美乎？”点校者后注：“原作‘已’，据傅校本改。”此二本皆失考。据《罗浮志》作：“岂独荣公侯之祀，擅登临之美而已哉？”可知《全宋文》所据底本与傅校本皆脱“而”和“哉”两字，《全宋文》所采底本作“已”是正确的，傅校本作“乎”是错误的，而点校者又从傅校本误改“已”为“乎”，故今当据《罗浮志》改。

(3)《全宋文》：“岂不素乐于闲旷哉？”据《罗浮志》作：“岂非素乐于闲旷者哉？”此文为颖川公诗序，“其解相印如脱屣”指的即是颖川公。后面一句《全宋文》先脱漏“者”字，后误改“非”为“不”，使得句意与原文不符，今据《罗浮志》改。

2.2 白玉蟾《罗浮山庆云记》

《罗浮志》卷八载白玉蟾《庆云记》^{[1]33-34}，其文如下：

孝宗即皇帝位，以淳熙元年十月十五日，命惠州守王宁奉诏，有醮于罗浮山，山即十大洞天之一，而朱明耀真之府也。先是，唐天成中，此洞天府忽出古剑，其上篆文已应太祖皇帝丁亥圣君出之讖。国朝以来，时遣中使致金龙玉简之敬，岁修国醮，著为甲令。是日也，御香荐上，藏事荐诚，步虚声闻，环珮作序，天容绀碧，风日清美，珍禽舞，驯虎悦，仙花瑶草，满洞芳妍，醮坛之西北隅，有五色光华出焉，上亘霄昊，是谓卿云，轮囷郁丽，华景缤纷，中有金龙，回翔蔚郁，天人交庆，实应太平。夫太平，无象也，然而瑞庆大来，亦于其人，不于其天。天意以之昭格，山川于焉出云，云物精稷，犹登台以课之，建官以纪之，秉笔以书之。自祥符初，泰山庆云现，今焉复应，猗欤盛哉！河清岳润，信有其时，奉醮漕臣，绘图上之，踰年有旨，命礼部凡遇郊恩，给降度牒，以批戴其年劳者，使修香火，永为典故。宝庆丁亥，道士邹师正该覃恩霈，州宦檄之知冲虚观事，兴怀休符，命为记文，而系之以铭曰：“太祖之潜龙也，古剑出焉；孝宗之飞龙也，庆云翔焉。剑所以化龙于地，云所以从龙于天。《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

按：《全宋文》据《琼琚白真人集》录有《罗浮山庆云记》，后注：“又见《罗浮志》卷八”^{[1]33-34}、康熙《罗浮山志外编》卷一一、乾隆《博罗县志》卷一三、《广东文征》卷六二。”^{[4]册296:259-260}《罗浮志》所录之文，与《全宋文》《罗浮山志会编》等本字数相差无几，而内容相去较远，与《全宋文》本有异二十余处，难断何本为优，《罗浮志》本或为未定之稿，未详其所本。《全宋文》凡例中说：“一般异文不出校”^{[4]册1:13}，故二本差异，不再补注。此文有两处可确定的错讹，今辨之如下：

(1)《全宋文》本：“步虚升闻。”《罗浮志》《罗浮山志会编》作：“步虚声闻。”步虚为道教科仪名词，指斋醮时道士唱经礼赞。李白《题随州紫阳先生壁》诗：“喘息飡妙气，步虚吟真声。”王琦注引《异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5]施肩吾《闻山中步虚声》诗：“何人步虚南峰顶，鹤唳九天霜月冷。”^[6]“步虚声闻”意为道士唱经礼赞声音，前人诗文中多有使用，而“步虚升闻”之意不可

解,故“声闻”误为“升闻”是音同致误,当以《罗浮志》为是。

(2)《全宋文》本:“建宫以纪之。”《罗浮志》《罗浮山志会编》《古今图书集成》本作“建官”。“建官”意为修筑宫观,“建官”则指设置专职道官。《罗浮志》载《度牒题名》对“庆云现”一事记载甚为详细,“乃淳熙甲午,守臣王宁,奉祀于山,而庆云起于祠所,五色轮囷,兹实太平之应,绘图奏上……赐冲虚观道士一员,专修祠事,猗欤休哉,所以报神之意厚矣。”^[142]都没有提到设立宫观之事,只有特赐一名道士员额,专门负责祭祀之事,当以“建官”为是。

2.3 唐古台《登山记》

《罗浮志》卷八载徐心远(代作)《登山记》^[137],其文如下:

罗浮第七洞天,乃穉川葛仙炼丹之所,余因分治惠阳,体覆灾伤,览轡峰前,获睹天南仙境,首登冲虚、明福二观,祝君皇万寿,郡有望儒徐心远,约之同行,如期而至梅花村。心远以老倦趺足不能从焉,余遂摄衣而上,由邛仙石历伏虎岩,盘礴于八仙石上,穷一日之力,蹶屣飞云之巅。是日也,宇宙澄清,沧海一碧,瓣香致敬。须臾,云生足下,雾霏天低,倏有双凫翔舞其上。日之夕矣,于是编竹为庐,席地一宿。次晓,披蓑带雨而下,木客长啸,彩禽来集,望石楼,漱水帘,憩梅屋,寻仙仗,观药槽,出松关,遇心远于斯。惠余以诗卷,披云一笑而回,从余者,书吏周伟、徐英,博罗县令刘亨,因书以记其会。时元贞乙未仲冬二十日,前行御史、金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唐古台书。

按:《全元文》据《博罗县志》卷一三,仅录有“余因分治惠阳”至“元贞乙未仲冬二十日”^{[7]218},前缺“罗浮第七洞天,乃穉川葛仙炼丹之所”十五字,后脱“前行御史、金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唐古台书”二十字。《全元文》据《博罗县志》所录的文本中亦多有脱漏,“惠阳”二字后脱“体覆灾伤,览轡峰前”八字,“仙境”后脱“首登冲虚、明福二观,祝君皇万寿,郡”十四字,“心远”二字后脱“以老倦趺足”五字,“飞云”前脱一“蹶”字,“于是”前脱“日之夕矣”四字,“惠余”前脱“于斯”二字,“诗”后脱一“卷”字,“元贞”前脱“从余者,书吏周伟、徐英,博罗县令刘亨,因书以记其会。时”二十二字,共计脱漏九十二字,今当据补。另有一处讹误:

“飞云”二字之前,《全元文》录为“履飞云之

巅”,《罗浮志》作“蹶屣飞云之巅”,据赵汝驭《罗浮山行记》:“山之麓,有门曰‘履云’,表飞云之履,始从足下也。”^[134]知罗浮山麓有“履云”的一地,就得名于古人着登山履攀登飞云顶自此出发,“蹶屣”当为叙述登飞云顶的语典。又有余靖《官师颖川公留题罗浮山诗序》:“靖蹶屣来游,会其醵刻,因书岁月于右。”^[128]也称“蹶屣”,可为佐证。因此,《全元文》所录脱“蹶”字,又因形近误“履”为“履”,当据《罗浮志》改。

在提供更完整的文本之外,关于这篇《登山记》的作者,《罗浮志》也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此文为徐心远代作,唐古台书写,其作者不是唐古台。我们以为《罗浮志》所载更准确,一是因为陈琏为明初人,近于其时;二是《罗浮志》所录文本为全篇,所提供的细节更加详细,故而此文作者当以徐心远为是。徐心远其人于史无载,迁客赵必象有《避地惠阳鼓峰用徐心远韵》,当即一人,可知心远确为当地望儒。

2.4 赵孟杰《醺山记》

《罗浮志》卷八载《醺山记》^[138],其文如下:

至大元年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颜可山,经历韩良,遵国家旧典,率僚案祀罗浮名山,上祝天子万寿,下祈民福。

自梅花村步飞云顶,四顾寂寥,山簇水萦,暮霞绽日,金壁交粲,白云如毡,下隔尘世。已而夜转星移,海曙晓出,金盘簸弄,锦彩摇曳,目不可极。乃自石楼而下,憩宝积,诣冲虚,命道录黄菊岩等藏祀。祀毕,阴云流布,么凤幽鸣,油然雨意,见者鼓舞,百姓悦孚,释子亦合掌赞叹,一时之盛举也。

捐俸协恭者,路达鲁、花赤、怀远府判、王屋山、推官郭深甫、知事辛德新、提控雷实齐、路教授聂俨山、应办路吏谢子安,偕行者,僧录谢大云、道判周樵隐、学正萧如春、教谕王谦翁、张履桥、利心村巡检罗子锦,同知舍人元吉侍、俨山既为青词,遂令博罗县尹赵橘隐记而为之书,时既望也。

按:《全元文》据《博罗县志》卷一三,仅录有“至大元年十月”至“一时之盛举也”^{[7]206},缺漏“捐俸协恭者……时既望也。”共计一百一十字。此为点校者失考于《罗浮志》,今当据补。其中《全元文》所载文字中亦有阙文两处:

(1)“率僚案祀罗浮名山”,《全元文》本“罗浮”后脱“名”字,录为“率僚案祀罗浮山”,虽仅一字

之缺,亦当据补。

(2)“百姓悦孚,释子亦合掌赞叹”,《全元文》本脱“释子亦合掌赞叹”七字,当据补。

《全元文》据《博罗县志》:“已而夜转星移,海曙日出”,《罗浮志》作:“已而夜转星移,海曙晓出”,这种异文难以判断应遵从何本。将《博罗县志》所收文本与《罗浮志》对校,可以发现《博罗县志》所收文本为节本,与《罗浮志》所收全本内容相差很多,如《博罗县志》收王胄《狮子庵记》只有不到四百字^{[8]卷13},《罗浮志》收王胄《狮子庵记》有近八百字,其中内容多有简省。像这样的异文在《全元文》中有多处,异文本身并不影响原文的意思,因此在没有校本的情况下很难发现。《全元文》所据的底本《博罗县志》即是删节本,《罗浮志》所收皆是全本;《罗浮志》成书在明永乐年间,远早于乾隆年间的《博罗县志》。因此我们认为在《全元文》中,《罗浮志》与《博罗县志》本所载有异者,皆当以《罗浮志》为优。

3 结语

在今天这样的学术大发展的时代,不断有最新总集编纂出版,为文学和史学研究者广泛征引和运用。文献资料的准确性是文史研究的前提,总集往往由于其卷秩浩繁,其中不免有个别疑误,选择善本对总集进行补正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工作。我国现存近万种旧方志是总集补正工作的渊藪,地方志中保存有大量文学和史学材料,文学研究者在利用地方志的过程中,往往都是以寻找新材料为目的,而忽略了地方志中文学作品的版本价值。以《罗浮志》为例,今人虽以《罗浮志》补遗,却未对其所收文本细加稽考,在看到《全宋文》等总集已收录某篇之后,就不再对文本进行细致考查。如果忽略其版本价值,地方志的研究就必然会流于表面。《罗浮志》是一本不足四万字的小书,却可以补正《全宋文》等总集所收文本的缺陷,因此地方志价值的挖掘应当以细致的整理为前提。有学者提倡:“对方志辑佚,应该具体到每个州(路、府),由熟悉地方历史文献的学者单独辑佚,能最低限度减少错漏。”^[9]不仅辑佚方志应当如此,对于地方志的利用也应该建立在整理的基础之上,从具体整理工作中发掘地方志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陈琏.罗浮志[M]//胡道静,等.藏外道书:第1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
- [2] 吕冠南.《全宋文》补辑四篇[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33(4):73-74.
- [3] 孙廷林.《全元文》补遗三篇[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5):41-43.
- [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5] 李白.李太白全集:卷29[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1145.
- [6] 彭定求.全唐诗:第八册:卷494[M].北京:中华书局,1999:5637.
- [7] 李修生.全元文:第36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8] 陈裔虞.博罗县志:卷13[M].刻本,1763(清乾隆2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9] 吴榕青.《永乐大典·潮州府》卷外潮州旧志辑校[J].中国地方志,2021(5):50-61.

作者简介:董存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宗教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2-01-06

本文责编:李芳